

X250.6

31
2.10

革命史資料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文史資料出版社

一九八三·北京



021223

革命史资料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限国内发行)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5号)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印书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81年1月第一版·1983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¹/₃₂ 印张, 7¹¹/₁₆ 字数, 203, 000

印数, 1—13, 000册 定价, 0.85元

统一书号, 11324·108

目 录

- 特殊使命**.....云广英(1)
- 八年苦斗**.....张如屏(13)
- 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宜宾特支**.....陈 林(61)
- 南京怒潮**.....汪季琦、王 枫(69)
- 静斋风暴**.....张仲碧(82)
- 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军分校**.....周见非(97)
- 革命熔炉——抗大**.....刘祖靖(108)
- 抗大各期概况——教育方针、教学
 原则——教学方法——各种制度——
 教员队伍的建设——政治工作
- 抗大二分校的回忆**.....高克恭(141)
- 争取任丘伪军起义的经过**.....杨建新(147)
- 在黑雾中战斗**.....张持平(158)
- 皖南事变的枪声**.....石 平(171)
- 第一个中共广西省委**.....黎晓沧(177)

风雪征途

- 东北抗联第十一军西征记……卢连峰(187)
晋夫烈士永生……乔畅章(193)
难忘的鄂东南兵工厂……王只谷(203)
精兵简政度过难关……赵恒远(211)

书信·日记

- 战争中的九个新年……王紫峰(215)

综合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下)

- ……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220)

特殊使命

云 广 英

(全国政协常委)

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一方面同陕北红军团结合作，对敌作战；另一方面对被蒋介石所歧视、压制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进行统战工作，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敌为友。这对于抗日力量的扩大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我参加长征期间，在干部团工作。到达瓦窑堡后，组织上分配我到红军大学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是杨尚昆同志，副主任是莫文骅同志，我担任政治部组织科长。经过一年时间的长征，经受了艰难困苦，许多干部战士都身体不好。当时陕北地区的党、政、军、民对胜利到陕北来的中央红军非常关心爱护，在物质生活上给予积极支援，使同志们很快恢复健康。一九三六年六月间，我们听到华南发生“两广事变”，即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并向全国发出“立即北上抗日”的通电，但详情却不得而知。

大约过了半个月时间，有一天，李克农同志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来找我谈话。他说：“六月一日两广发生事变，广西的李宗仁和广东的陈济棠等联合搞‘反蒋抗日’活动，并发出通电。这无疑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派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必要和有利的。中央准备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的名义向他们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你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你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冬你又到广西右江参加红七军，你对两广地方情况比较熟悉，我认为你出去活动是合适的。你的意见怎样？”我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完全服从党的决定去工作，不过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希望给我多多指示，使我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李克农同志又说：“过几天再谈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你同意去就好了”。

过了三天，李克农同志又到政治部来同我谈话，他说：“中央领导同志今天开会，明确了你往两广去的工作任务，现在你同我到中央办公厅去。”李克农同志同我到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叶剑英、张闻天等同志均已在座。周恩来同志对当时形势作了分析，明确地指出我的工作任务。最后又指示我说：“你到南方后，在香港或广州、南宁地区时，如遇到宣侠父先生，你可以同他谈工作问题，也请他谈当地的抗日斗争等情况，他是进步的人士，他会帮助你进行工作的。关于你到南方后与中央如何联系，由李克农同志同你详谈。”当我和李克农同志离开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握着我的手说：“你这次出去工作很好！”我回来后的第二天，李克农同志来指示我到两广后与中央的联系事

宜。他与我约定电报的密码、呼号和波长等。并说要发出电报时，先译成密码，然后托两广当局电台代发，只要把通电报的呼号和波长告诉他们，那就可以通电报了。

过了几天，准备工作做好了，中央另派白坚同志陪同我到天津，再转南方。于是我们离开瓦窑堡往延安（当时称肤施，是东北军的驻地）。由张学良部队的王副官带我们乘军用车通过延安到西安。到西安后，王副官带我们到西北军政治部负责人申伯纯先生的接待室住着。这个接待室只能住几个人，是申接待他私人客人住用的，似乎是秘密的接待地方。我们这次到西安来，得到许多方便，无疑是统战工作的成果。

在西安住了几天，我和白坚同志买了一些化装用的服装用具，准备好后，就乘火车往天津。到天津后住在一家俄国人开的中等旅店，由白坚同志出去找北方局同志取得联系。过了两天，王世英同志来看我们。我过去没有与王世英同志接触过，这次经过白坚同志介绍才认识。他很热情地同我握手交谈。我就把我去两广的任务告诉他。他把了解“两广事变”的情况对我陈述。他说：“‘两广事变’的真相，我们这里了解也不太清楚，但是他们同蒋介石闹矛盾是无疑的，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同我们联合‘迫蒋抗日’是很必要的。听说事变后，广东的陈济棠部队中的军长余汉谋已投靠蒋介石。因此，目前在广东的局势较混乱，陈可能已离开广州往香港了。广西方面没有什么变动，可以往广西南宁去找李宗仁等进行统战工作。”我同意王世英同志的意见。王世英同志另指定一家旅店要我们去住，说到那里去住较方便。我和白坚同志迁到那家小旅店去住的第二天，王世英同志又来看我们。他个别同我说：“经过调查了解，陈济棠已经逃离广州去香港，

你不要去广州，到香港转途到广西南宁去找李宗仁等好了。李宗仁在天津有秘密电台，他们与我们有统战工作上的关系，为了你找李宗仁等的方便，我们与他们商谈过，可以由他们发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告知你不久就要到南宁，这样去会见李宗仁等就不会那么麻烦了。不过你要改名为林秀先。这事已同他们谈好了，……”。王世英同志还同我约定，以后我回天津时联系的方法暗号。过了两天，我个人就由天津经上海赴香港。在香港住了几天，偶然遇到我族兄云旭斋，他在澳门经小商，经常到香港来做买卖。他把广东情况向我谈了。我一个人就往广西，当我到南宁上岸时，就有几个桂系警察来严密的检查，并指定我到南宁某旅店去住宿。我想他们是防止蒋介石派人到来搞破坏活动的吧。检查完后，我到指定的旅店以林秀先名字住下。当天晚上，我写好一封会见李宗仁的信，信写好后放在床的蓆子下面。大抵是十点钟左右，有两个警察来查房。他们进入我住的房后，询问我的姓名，从哪里来的。我回答后，他们到处搜查，验查行李后，就翻蓆子，发现我写的信，即询这信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又对他们说：“我准备明天去找你们的李总司令，希望你们带我去好吗？”他们说：“总司令部离这里不远，你自己去好了。”谈完后他们就走了。第二天的早餐后，我就拿着给李宗仁的信出去，我发现有两个警察跟在我的后面走。我到李总部的传达室，即将给李宗仁的信交去。不多久，大抵是一个参谋或副官请我到李宗仁总部的办公厅。我进去时，李宗仁正在厅间，他身着军服，穿着一双黑色的长统皮鞋，站立在厅的中间。还有两个卫兵立在厅的一旁。李宗仁同我握手并微笑着说：“我早已知道林先生要来，今天得到会面，很好！”他请我坐下后，立即挥手要两个卫兵退出去。接着就向我们毛主

席、朱总司令问好。我对他表示感谢。在同他交谈时，没有别人参加。我当时不了解“两广事变”的真实情况和他们的意图。所以只对他讲如下几点：第一，说明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国本部进攻，他们无疑是要占领全中国。最近“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趋势，严重地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和民族的危亡。目前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坚决抗日，反对内战，反对对日寇妥协投降，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党很早就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相信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斗争，这个任务一定能够实现的。第二，我们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政策，因为他长期以来不顾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对日寇不抵抗，对国内打内战，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我们认为他们这种顽固反动的主张和行动，是难以容忍的，其恶果是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们红军离开南方北上到西北，其目的是以积极的行动来抗日，推动全国抗日斗争的发展。而蒋介石则派大兵来阻止我们，围攻我们，这无非是帮日寇侵略中国的大忙，大失民心！第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这个武器来组织和团结全国人民大众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汉奸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进行坚决斗争。我们认为只有走这一条道路才是正确的，才能战胜日寇，才能解救中国。除此别无他途可走。如果国民党当局还搞

所谓什么“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继续打内战，对日寇妥协投降，其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我们反侵略的力量，大大方便于日寇的入侵，致使中国灭亡。我们党中央这次派我到广西来，就是为着商谈关于合作抗日的问题。我认为只有全国各方面愿意和决心抗日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促进全面抗战高潮的到来，那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寇，取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我谈这些问题时，李宗仁没有插话，但多次点头说对。最后他说：“林先生所讲的话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完全赞成。我们正在进行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我们互相配合。”他又说：“我最近工作比较忙些，我过后通知王公度主任同林先生联系，有什么事情希望与他交谈，……。”他送我出会客厅的门前。我回旅店时，途中没有警察跟踪我了。过了两天，王公度到我住的旅店来看我。只谈了半小时他就走了。他把他居住的地址告诉我，并说过后请我去谈。当时他对我是欢迎的。但他对“两广事变”的情况不多谈。

又过了一天，宣侠父同志来看我，他表示很高兴。他告诉我香港党的组织已派胡鄂公等到南宁来，对广西当局进行统战工作。他本人是陪同胡等来的。他把“两广事变”的经过告诉了我。他说，陈济棠因为部下军长余汉谋投蒋后，广东方面较混乱，已去香港，我们不要到广州去活动。我把我出来的任务告诉他，要他以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我对他说：“我已经会见过李宗仁。李很注意听我的讲话，并表示赞同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我想他们是乐意与我们合作进行‘迫蒋抗日’的。”

你认为怎么样？”宣说：“广东的陈济棠部队已经分裂，李宗仁现在比较孤立，他们是会愿意同我们党合作的。胡鄂公本人与李济深会谈过，关系尚好。李济深表示很乐意同中共合作，通过统战关系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他在华南国民党地方势力派中的威信较高，但是没有实力。他与李、白关系是好的。”宣侠父同志又对我说：“胡鄂公等很想来看您，您是否可以同他们谈谈？”我立即回答：

“他俩是香港党组织上派来工作的，我很想他们来谈谈，多了解些情况更好。请你通知他们，明天上午到我这里来谈好了。”第二天上午，宣同志与胡到我住的地方来。我告诉胡说：“我是党中央派来两广对李宗仁、陈济棠等进行统战工作的。请你们多帮助我了解两广的情况，因为我离开南方七年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不熟悉。党中央对这次‘两广事变’的真实情况也不太清楚，当然早已看到两广地方实力派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长期以来对地方实力派和进步的民主党派是歧视和压制的。两广当局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当然是进步的表现。他们实行‘抗日救国’的主张，我们当然是赞成的，是应与他们合作的。我出来工作的任务，是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争取他们同我们一道进行抗日的斗争。我们从多方面进行统战工作，对团结更多抗日力量来‘迫蒋抗日’是有利的。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我对胡谈这些问题，他没有发表异议。过了一天，胡派宣侠父同志来对我说：“李济深是拥护我们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的。你是否可以去看他，同他谈谈？”我回答宣侠父同志，请你通知他：“后天上午我去看他好了”。早在一九三二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初期，李济深先生同我们党有统战关系。侠父同志告诉我：“他

现住在宜园。这是广西当局接待各地来的代表的宾馆。你自己去找他好了。”我按照约定时间找到了李济深。我到他的会客厅后，他热情地同我握手，并立即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问好。我答：“很好！谢谢你的关怀。”我同他谈了约一小时，其内容与对李宗仁所谈的基本一样，他没有多说话，只表示说：“中共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正确。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来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进行斗争，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我们民族的危亡。蒋介石个人独裁，对日妥协投降，不顾民族之存亡。我是一贯反对他们的。‘两广事件’的发生原因就在于此。”他说这几句简单的话，表现出他是愿意同我党我军合作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的。我对他说：“李先生的主张很好，我很赞成。我们党很早就提出在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把日寇打出去，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我想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都是赞成的。”谈到此我就同他握手告别了。

我同李济深会谈后的第五天，胡鄂公来看我。他说：“李济深很进步，李宗仁等也很尊重他。我们对李宗仁要谈的什么问题，最好经过他去对李宗仁谈效果更好。林同志以后要对李宗仁谈什么问题可告诉我，由我同李济深谈好转告李宗仁，你意见如何？”我说：“中央是派我直接与李宗仁等商谈问题的，不应通过别人来做间接的会谈。我认为你提的意见不妥当。这样做会使李宗仁对我们不满意。”我讲后，胡表现得很不满意而告别了。过了两天，胡又来找我谈，他不让宣侠父来。胡对我说：“今天要对林同志谈些重要的问题。在这里谈不方便，是否可以出去到公园里谈谈？”我说：“好。”于是，我们就同到南宁公园中去。一九二九年秋，我在南

宁时也常常到这个公园散步，这地方我比较熟悉，就同到一块人少来往的地方去谈。这天胡鄂公的神情似乎不太正常，又表示出对我很关心的样子。他开口就说：“林同志这次来搞统战工作很好，可是广西当局对你是否中共中央派来的有些怀疑。在这情况下，我们的意见是林同志能否先回西北，把党中央指示你出来的工作任务交给我们来办。你如果不快离开广西，万一发生意外那就不好了……”我听了，认定他是有意搞鬼，以制造谣言和威吓的恶劣手段来骗我走，使他能假用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名义进行活动，这无疑是对统战工作极为不利的。因此我就毫不客气而又严肃地批评他一番。我说：“我出来经天津时，是我们的同志同李宗仁设在天津的秘密机关负责人商谈好了，并由他们先发密电给李宗仁等告知我要到南宁来，当李宗仁会见我时，他就说早已知道林先生要来的。他们对我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党中央是派我来工作的，我没有完成任务之前是不会离开广西的。你们没有权利代替我来进行活动。你所提的意见是非常错误的。至于我会遭受什么意外，我是不怕的，如果害怕什么意外，我就不会经过遥远的敌占区来此了。我在这里进行工作，你们只能帮助了解些情况，不许插手干预。不然的话，你们过后就不要同我联系。”经过批评，他无话可说，我就走了。

过后，我搞好一份密码向党中央报告的电报，亲自拿去要王公度代发，并把呼号和波长都告诉他。他满口答应一定会代发。这份电报的内容主要是，报告我已经会见李宗仁和李济深。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赞成我党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愿意同我们合作进行抗日救国。陈济棠已下台，逃居香港。广西方面仍继续搞“反蒋抗日”活动。他们反蒋是真，但是否真正抗日不

太清楚。在我未到南宁之前，香港党组织已派胡鄂公、宣侠父等来桂进行统战工作活动。胡在工作上对我没有帮助，反而造谣说李宗仁等对我有怀疑，要我先回西北，把任务交他们去办，我坚决反对。他们可能是假冒中央派来的代表的名义骗李宗仁等的。这事情如何处理，请指示。这份电报交王公度代发后，约一星期之久，王来告诉我：“至今还联系不上，什么原因不清楚……”这时，我很焦急，拟赴天津找王世英同志。凑巧得很，过两天王世英同志来到南宁同我会晤。王同志说：我担心你是否已安全到来南宁，所以特来看你，并了解两广的情况。我便告诉他来到南宁后的经过和进行工作的情况。同时我把胡鄂公胡闹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他。世英同志说，究竟是什么人派他们出来的，我也不清楚。我说，宣侠父表现较好，可是受他们控制也无能为力。王世英同志说，不要理睬他们好了。他们绝对不是中央派出来的。我说，最近他们都不敢到我处了。谈了一小时多，王世英同志就走了。过了三天，世英同志又来同我谈。他说，最近广西情况还没有新的变化，我准备赴香港后回天津。我说我留下继续工作，并要他回到天津后把广西的情况和胡鄂公胡闹的行为报告中央。世英同志不几天就回天津了。

八月中旬，我听到蒋军已派大兵来包围广西，南宁市面上也有些混乱，有些商民逃离南宁。广西的纸币大跌价，听说不少人都争先恐后地把广西纸币去换港币。也听说蒋介石收买广西的空军，有一些空军人员和飞机跑了。有一天，王公度来到我处，说：“有些事情要同林先生商谈一下，是否可以？”我说“可以”。他说：“最近蒋介石已派兵来威胁我们，无非是迫我们停止‘抗日救亡’活动。目前情况比较紧迫，如何对付他们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林先生对此有什么意见？……”我思考了一下，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党的方针是“迫蒋抗日”。如果南方打起内战来，对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是不利的。因此，我就对他说：“中国不断打内战，我们党多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其目的是为着坚决反对日寇的侵略，维护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而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大打内战。这是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动政策。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还是以和平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为上策。不过在谈判中，必须以迫蒋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为前提，并立即把蒋军围攻广西的武装全部撤走，这是主要的条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我想和平解决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加强各方面抗日力量的团结，‘迫蒋抗日’也是可能的。请你把我个人的意见转告你们李总司令。”王公度说：“林先生提的意见很好，我一定向李总司令报告……”我俩简单谈了这一切，他对我表示感谢就走了。大抵过了十几天，蒋方与广西当局经过和平谈判，在九月上旬得到和平解决了，但是谈判的具体内容我不太清楚。和平解决后，南宁的社会秩序逐渐转为安定。

蒋、桂两军经过和平解决问题后，九月中旬，我就离开南宁赴天津。当离开南宁之前两天，久不来见我的胡鄂公到我住处来。胡一见我就说：“广西当局与蒋军经过和平谈判已取得和平解决。李济深先生写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他托我携来给林同志亲自带去，转呈给毛主席”。胡把信给我看。这封信只有三百个字左右，基本内容是表示对我们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诚意地同我们合作进行抗日救国运动。最后提出今后在军事行动上同我红军密切配合。我看完这信后对胡说：“我同意把李济深的信带去

呈给毛主席，这是不难办到的”。我当时认为把李济深给毛主席的信藏在身上是不妥当的，万一被敌人查出来，就麻烦了。我决心把这封信的内容念熟，就把它烧掉，到延安后写出来呈给毛主席就是了。

九月中旬，我离开南宁后经香港赴澳门。我族兄云旭斋已通知我妻陈英和小女孩泊娟到澳门住着。陈英同志一九三〇年参加红七军后，因为怀孕，组织上决定她不要随军到江西中央苏区，不得已回乡务农。她坚决要偕我到红军中工作。我同意。就偕她离开澳门经上海到天津。到天津后的第三天，我找到了王世英同志。他留我们在天津逗留几天。他要我亲自带呈给党中央的密件。办妥后，我们就离开天津乘火车到西安。到西安住了一段时间，才经过申伯纯先生的关系找到张纯清（即张文彬）同志。纯清同志当面告诉我说：“叶剑英同志现在西安。你是否快点去看他？”我很高兴地回答：“我出来工作已经几个月的时间，我往南方工作的情况必须快点向中央汇报。请你对他谈好，约定地点和时间，我就去看他好了”。我把北方局送给中央的密件交给张纯清同志，由他转呈中央。过了两天，我偕张纯清同志去看叶剑英同志。见面时他就欢笑地对我说：“你这次出去工作，现在顺利地回来，很好！”我就详细地把去广西进行统战工作经过的情况向他汇报。最后又把李济深给毛主席的信全文写出来呈给他阅，并请他转呈给毛主席。叶帅说：“你的记忆力很好，这信由我转呈给毛主席好了”。

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八年苦斗

张 如 屏

(全国政协常委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安徽中部的寿县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革命斗争形势的影响下，一些幸存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揩干了身上的血迹，又重新站了起来。在无数血的代价和斗争实践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皖西的工农武装割据以及皖北、皖西北白区里革命的游击战争活动，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

一九二九年底，我在广州南石头监狱经受了两年多的折磨，终因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经老同盟会会员李雨村保释出

狱，临出狱前，狱中支部书记郭成荣找我谈了话，在离开广州、路经香港、最后到达上海的路上，我的联系人、途中临时党小组长高国玖告诉我：“狱中党组织安排你到东北工作或去苏联学习”。到上海后，刚同党中央与我们的联络人吕共器见了一面，第二天吕就被敌人逮捕了。联络从此中断，上海又无其他栖身之地，不得已，我们只好暂回故乡，听候党中央的指示。

一九三〇年初，我回到了离别三年多的故乡——安徽寿县杨家庙。第一个急需办的事情，就是筹集经费。可是，家里没有钱，只好将田地当掉一部分，换来了二百元大洋。正当我准备动身去上海找党中央时，却得了伤寒，卧床不起。只得把钱交给一同从广州监狱出来的戴关宇，让他先去联系。送走戴关宇不久，寿县中心县委书记曹鼎来告诉我：“我们知道你从黄埔军校回来后，立既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请求把你留下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只表示听候中央指示，服从组织安排。中心县委的报告，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于是，曹鼎就把我编入董庄子党支部，从此，我又投入了新的战斗，开始了在安徽的革命生涯。

在安徽，土地革命战争的烈火，首先是在六安，霍山一带燃烧起来的。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继黄麻起义之后，皖西金寨县爆发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同年十一月，六（安）霍（山）地区又爆发了总起义，即六霍起义。这两次起义，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安徽的反动统治基础，创建了皖西根据地和工农武装，为白色恐怖的皖西北树立了一面红旗。

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正式成立。为了统一红军的领导，特委将分属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块根据地的红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军长由中央

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派许继慎担任。政委是曹大骏。后又改为第一军第一、二、三师。一师师长记不清是谁。二师师长是金寨县白沙河楼房村的周维炯。三师师长张惠堂，政委鲍益三。

三月份，我的病刚刚痊愈。因六霍地区缺少军事干部，而寿县党的组织成立较久，从黄埔、武汉等军校回来的人比较多。在六霍中心县委的请求下，曹鼎把我推荐出来，被派往三师一〇八团担任党代表。该团有三个营，实有四百余人，武器较好，钢枪占多数。政治工作做得好。地方上一些表现好的党员，只要连排长一看上了，就被吸收到部队里来。所以，从武器到组织以及全团战斗力都是很强的。

在这期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和消灭当地民愤大的地主、土豪劣绅与还乡团。同时，我们还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了青山战斗。青山，是六安东部的一个大镇，以产茶而著名。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就驻在该镇的茶场。青山战斗，虽没有全歼敌人，但给自己增添了武器装备。不久，攻打金家寨的战斗开始了。

金家寨，即今天的金寨县。它地处大别山北麓，除县城以北有少数丘陵外，其余地区皆是山岭纵横，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首次攻打金家寨，正是梅雨季节，泥泞路滑，行动困难，我病倒了。一天，师政委鲍益三看到我这个样子，就明确告诉我：“你去军医院治疗，同时担任医院党代表。”之后，又亲自派人用他的马，把我送到由三师代管的军医院所在地燕子河。

到了军医院后，我认识了郝正理院长，他是霍山人，又是职业医生。过了几天，我的身体略有好转，就率领担架队，参加了攻打金家寨的战斗。这次战斗，我们集中了较多的兵力，猛打猛攻，一举克复金寨县城。但没有料到，卫立煌纠集部队，趁我立

足未稳之际，进逼县城。不得已，我们只好将进驻县城的所有部队撤了出来。他们大肆宣传这次战斗，将金寨易名为立煌县。全国解放后，金寨县名才得以恢复。

到了九月份，六霍中心县委书记夏唯宁（真名舒结贤，霍山人）把我调到由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暴动指挥部。六霍是老苏区，又有红军的存在，条件比较好，但斗争仍是非常艰苦的。一九三〇年六月，在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影响下，由于各地盲目暴动，使得很多完整的组织暴露了，有的甚至被搞垮了。时间不到三个月，皖西人民三年浴血开创的苏区，几乎全部沦入敌手。敌人的疯狂报复，人民的惨重损失，使夏唯宁清醒过来。九月份，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他用事实批判了“左”倾错误的危害性。回皖之后，他决心重整旗鼓，开始新的战斗。所以，我从医院出来，刚到指挥部，他就指示组织部长尤迟带我到寿县、合肥一带开展工作。

我们来到六安东乡时，东乡县委书记周焕文闻讯而来，找到尤迟。当时，他正率领一个赤卫师，转战六安一带，战斗频繁，损失很大，师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为了加强赤卫师的领导，他要求将我留下来，顶替他的党代表职务。经尤迟批准，我就前往赤卫师所在地——龙门冲，担负起新的战斗任务。

赤卫师是六安地区的一支农民武装。全师二、三百人，除了十几支步枪，全是大刀长矛，武器装备很差。但是，战士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为切身利益而战，革命意志坚决，斗争精神旺盛。当时，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我主力红军奉命离开苏区，开赴湖北平汉线。于是，皖西卫立煌、刘振华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反动地方民团，乘虚而起，向六霍苏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我们赤

卫师坚持战斗，屡挫敌人的强大攻势，终因敌我悬殊太大，在龙门冲一带的山丛中，被敌包围了。

龙门冲，地处六安县南，四周少有村庄。我们被困在山上，干粮吃完了，就在山坡上弄来一点稻谷，稍微煮一下，就半生不熟地吃下去。因为山下面有敌人，煮久了，怕暴露目标。吃不饱时，就找一些野山梨、树皮和草根来充饥。由于战斗不断，饱一顿。饿一顿。吃下去这些植物和夹生米后，消化不良，肚子发胀，大便也拉不下来。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敌人妄想我们要投降的，就派人在下面喊话。但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坚定顽强，宁愿饿死，也不摇白旗，足足坚持了十多天。后来，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我们终于胜利突围出来了。

十月间，由于主力红军接连取得攻克霍山县城等重大胜利，鄂豫皖三省的革命形势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白区的党组织，在更广大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党的指示，在周焕文的安排下，我化装成药材商人，被秘密护送回寿县曹鼎家里。后由曹鼎把我安排到大井寺党支部，任务是发展杨家庙的党组织。

当时，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寿县是白区。在军阀刘振华的统治下，暗无天日。杨家庙镇上，设有团防局，大地主张焕亭担任团长。杨家庙、李山集和吴山庙等几个较大集镇的地方反动武装又纠合在一起，在近百里的土地上，组成了联庄会，由张焕亭任会长。联庄会上面，是伪下塘区政府，设有保安中队。区政府上面，是伪寿县县政府和专署，设有保安大队。县城里还驻着刘振华的正规部队。后来，卫立煌和东北军的部队，也开进了安徽。军阀的横征暴敛，地主的残酷剥削，土匪的胡作非为，加上

连年水旱灾害，民不聊生，惨象遍地。当时，流行的歌曲很多，其中有这样几句歌词：“穷人真可怜，衣服破了无得穿。管家人吃鱼肉呀，冬天炭火来取暖，穷人受饿挨冻真可怜！”，“南瓜芦子汤，不问好坏往肚里装，要吃个鸡蛋，如吃人参汤。”……可见，寿县人民的生活，是何等凄惨！

当时的一些党员，大部分是以前和平时期发展的，其中又以青年知识分子占多数。大革命的失败，革命低潮的到来，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分化瓦解，有些党员动摇变节，最后走向了反动。但是，我们的党，革命的火种，依然深深地刻在人民群众的心上。幸存的大多数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坚持着斗争。如曹广化、曹鼎等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就为重建党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短短的几个月，经过大量的工作，先后在杨家庙等地建立了五六个党支部，发展新党员五十余名。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了杨家庙区委，由雇工出身的马家礼担任书记。张广庆、陶存贞等人任委员。从这些新发展的党员来看，绝大多数经过了考验，对革命有一定的贡献。

一九三一年初，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以红一军为基础，根据中央的指示，合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消息传来，我们极受鼓舞。但是，眼前的处境仍很艰难。当时，敌人只要查出红线之类的东西，就被怀疑为共产党而遭到逮捕。为了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我们不得不采取分散和隐蔽的方式，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中进行活动。为了沟通各县党组织的联络，曹鼎特地指定我家为寿县和合肥两个中心县委的秘密联络点。我是寿县党的联络员。合肥中心县委的联络员是朱延楷。这时，我没有任何职业，只有靠白天下地干活或沿路拾粪为掩护。不久，我被调到中

心县委，担任常委和巡视员。

震惊皖北的瓦埠暴动

鄂豫皖苏区的工农武装割据，给皖北人民树立了榜样。随着斗争的需要，我们县委也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开展武装斗争上面来。过去，斗争的形式，往往从经济斗争着手。事实深深地告诉我们，要进行革命，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开展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瓦埠暴动，就是武装斗争的直接形式。

瓦埠，位于寿县东南乡的瓦埠湖畔。瓦埠湖，为安徽省较大湖泊之一，物产丰富，尤以银鱼著名。然而，这里又是多灾地区，“三年干，三年淹，三年蝗虫遮满天。”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为灾难无时不有。一九三〇年，是一个大旱之年，庄稼颗粒无收。次年春天饥荒严重，哀鸿遍野。相反，地主家的粮食堆积如山，有些粮仓里足有两三尺厚的稻谷白白地霉烂掉。我们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决心领导群众进行扒粮斗争，目标是瓦埠镇附近方家楼子的大地主，这个计划当即报请中央。

中央接到报告后，即派柯庆施到寿县，在上莫寺小学召开会议，分析形势。会上，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传达了中央有关武装暴动的指示。此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只强调全国性的所谓“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否认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

三月二十七日，柯庆施将暴动工作布置就绪后就走了。紧接着，中央又派巡视员高中林来寿县，召开寿、凤（台）、阜（阳）三县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立三错误路线问题”的决定，

讨论了立三路线的危险性，指出过去只注意武装斗争而未把武装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偏向以及如何扭转这个偏向等问题。会上，宣布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并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曹鼎任书记、委员有杨盟山、魏化祥、薛睿等，计划先夺伪区长路奎汉和地主豪绅的武装，最后发动群众扒粮。当时，考虑到武器多、战斗力强的杨家庙地主武装，会议责成我负责牵制和扰乱张焕亭的民团和联庄会，不让他们来援救瓦埠之敌。会议中途，由于情况紧急，我必须尽快赶回去准备。离开会场前，曹鼎特地嘱咐我：“杨家庙的敌人，是很厉害的。要牵制住他们，不让他们到瓦埠来，这个任务很重啊”。我说：“请放心。我是黄埔出来的，军事知识虽不多，但我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回到杨家庙，我就搞了两支枪，按照上级的要求，加紧布置。

三月二十九日（农历二月十一）深夜，队伍从四面八方云集泰山庙。但是，由于军事负责人薛睿的贪生怕死，迟迟不按原订计划行动，给了叛徒方策以可乘之机，致使路奎汉逃跑了。在分析研究了情况后，高中林当即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同时，成立“皖北红军游击大队”，撤掉薛睿的职务，由方和平（又名刘犊子）任大队长，宋天觉任大队副，曹鼎任政委，魏化祥为参谋长。下设三个中队，戚连雨、杨守先、曹广海等分别担任中队干部。

次日，游击大队高举红旗，红军战士肩佩红带子，一齐涌进方家楼，活捉了当地出名的地主豪绅。接着，又把附近村子的地主豪绅抓了起来。过去，这些人总认为我们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现在，看到这些浩浩荡荡、英姿威武的红军战士，吓得魂不附体，哀求不已。有的地主豪绅，虽未被抓，却亦闻风丧

胆，纷纷前来缴械。被抓的地主豪绅，为了保住粮食，就派代表来向我们提要求，被我们拒绝了。当时，战士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一九三一二一三，誓死拼命夺枪杆，地主吓得门栓上，开窗拱手枪交俺”。这次暴动，共缴长枪一百余支，短枪三十余支。

三月三十一日早晨，方家楼周围八十余里的人民群众，闻风而动，纷纷前来参加扒粮，顿时所有通向方家楼的大小道路上，到处是大车拉、小车推，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方家楼里，用篾子泥巴糊成的仓库，过去是遍地林立，现在是一扫无余。不到一天时间，共扒粮二百多石。其中，一些过路的大小商人，也趁机加入了扒粮队伍，搞了不少烟草和一些可以交换之物。当时的情景，真是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轰动和震惊了整个皖北。但是，由于事前缺乏周密的计划，加上经验不足，又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对下一步的行动，没有作出周密的安排。到了四月一日，反动武装从四面八方向我们猛扑过来。自发前来扒粮的群众，仓惶而走，纷纷跑散。暴动队伍系临时组织又缺乏一定的军事素质，战斗力差；同时，瓦埠镇三面环水，没有回旋余地。面临着凶恶的敌人，尽管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为时已晚，中队长戚连雨等人壮烈牺牲。

瓦埠暴动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向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瓦埠暴动恰好吸引和拖住了部分敌人，从而声援了苏区红军击退敌人的围剿。暴动期间，我们颁发了《宣言》，张贴了暴动负责人名单，号召人民群众：要生活下去，就得进行扒粮，就得跟共产党干革命，同地主豪绅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同时，瓦埠暴动，也锻炼了一批干部，如曹广海、曹云露、韩发明、颜理坤、颜理国等，这些人过去是地下党员，瓦

爆以后他们的身份也就公开了。

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认识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同时亦体会到教条主义、盲动主义的严重危害。为了保存革命的武装和骨干力量，我们及时地把夺得的枪枝弹药埋藏起来，已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尽快转移和隐蔽起来。对新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以培养，为今后造就更多更好的战士。

重建正阳关特区

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斗争复杂反复，考验着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个人。瓦埠爆动失败后，我们相继潜伏下来了。当时，有些人认为我们是“造反人物”，他们既不骂我们是土匪，流氓，也不诬指我们是坏人，而是“干大事”的。一些地主豪绅，私下里议论说：“过去，总觉得秀才造反，成不了大气候。现在看来，这些秀才们，说干就干，胆大包天，厉害得很，不能小看了”。

在革命和反革命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特别是瓦暴失败，蒋介石又加紧了对鄂豫皖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反动阶级对皖北党组织实行残酷镇压的艰难岁月里，我们随时都可能牺牲。有一天，我正住在六叔张政修家，张焕亭的一个名叫阮怀有的保丁，偷偷跑来告诉我：“董曙东鼓动张焕亭，说张如屏在家乡活动很厉害，想聚众造反，现在不把他搞掉，他将来就要搞掉你。张焕亭经董曙东一说，已带领人马来抓你，要杀害你。你赶快走吧，越快越好”。阮还告诉我哪条路能走、哪条路不能走。听到这一消息，我还来不及考虑，就被张政修、张明修等人推出。我刚从后门出来，张焕亭的人马就从前门进来了。当天，我来到曹鼎家里，将情况向他汇报。曹一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不再使我遭

到张焕亭、董曙东等人的暗算，就把我调往凤台、阜阳、颍上、太和、霍邱、固始、新蔡、息县、亳县等地（上述各县，时属寿县中心县委领导），以中心县委巡视员的身份，去做巡视工作。

这段时期里，环境异常恶劣，没有活动经费，就在自己家里想办法。白天行路，饿了就吃点高粱大豆做的干粮。渴了就喝小河或塘里的水。晚上就住在群众家里。不论是刮风下雨，也不管是烈日当头，只要是革命需要，什么也不怕，只晓得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去奔波。一天，曹鼎找到我，严厉地责备说：“你不能这样蛮干。万一牺牲了，怎么办？”我说“没关系”。确实，当时嘴里是这样说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叫累，也不相信困难有多严重，只觉得工作太多，恨不得自己多长几条腿、多生几双手，多为革命做工作。

不久，我们接到了中央来信。信中指出：寿县是处于环绕鄂豫皖苏区的区域之一，发动游击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同时，指出了发展和建立革命武装对于领导群众斗争与支持苏区的重大意义。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总结了瓦暴的经验和教训，决定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就在这时，国民党南京浦口教导连，在连长杜平（地下党员）的率领下全连举行起义，途经南京、蚌埠、怀远等地，最后来到寿县。县委当即将瓦暴后分散的武装人员集合起来，与杜平领导的教导连合编成为寿县游击队。这支武装建成后，很快开展活动，发动了轰动皖北的扒粮斗争。但是，我百余人的游击队被绝对优势的敌人包围在凤台的黄泥坝，最后弹尽粮绝，中央代表李英、寿县中心县委书记曹鼎等七十余人（杜平当时有病住我家，未随队）壮烈牺牲，幸存者只有二十余人。曹鼎是一位忠贞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

员。他的牺牲对正处在极端艰难之中的皖北革命事业是个重大的损失。

“九一八”事变后，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党的变化，革命群众的斗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了。皖北的革命斗争形势，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一九三二年五月，红二十五军攻打正阳关一仗，更使皖北的敌人，惊恐万状。红二十五军离开正阳关后，国民党的徐庭瑤部就开到了正阳关，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的报复，正阳关党的组织和各种进步组织，几乎损失殆尽。这时，我正在凤台县。中心县委任命我为正阳关特区书记。我很快从凤台赶到正阳关，着手恢复和建立特区组织。

红二十五军离开正阳关后，正阳关党的地下联络站负责人、长淮特委书记、寿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曹广化也随主力红军走了。一些群众害怕地主武装的报复，便组织游击队数百人，跟随红二十五军到了苏区。

一九三二年十月九日，中央给寿县中心县委下达的指示信中指出：“寿县党的工作布置，必须集中力量到几个中心区域去。首先是正阳关的工作的建立与加强城区的改造。”“对于外县的工作，我们最主要的应该是帮助凤台、颍上、阜阳三县工作的恢复与健强”。

根据中央的指示，按照组织上的交待，我来到正阳关之后，先住在高国玖家。（高与我在南石头监狱同仓，又是我们出狱后临时党小组长），通过组织关系找到了吴秃子家。曹广化过去在正阳关工作时曾将长淮特委的秘密机关设在吴家，公开身份是开设饺子馆，联络暗号是灶门朝外（一般灶门是朝屋里）。同时，还把梅家药房作为联络点，梅药公司的小老板是梅伯英。我先后到小

饺子馆和梅药公司这两个接头的地方后，为了尽快打开局面，一方面，我接替了曹广化的工作，公开身份是会计，做面食，以此为掩护；另一方面，稳准快地利用各种关系，争取有影响的人的支持。当时，梅伯英就掩护我。说起来，正阳关有个特区，其实，区委只我一个人，什么都得亲自动手。要想开个会，组织成员无法齐全。过了一段时间，特区正式成立，下设两个党支部，原有的和新发展的党员，约十余人。不久，听说高国玖的姐姐回来了，因高的姐姐是托派，为避免暴露，经组织批准后，我便离开了正阳关，重新回到凤台，在祝家墩朱祝三家住下来。

重建武装 除恶反霸

一九三二年冬，由于工作需要，我由凤台返回寿县。为了慎重起见，我直接住在中心县委所在地——小甸集，晚上就在老百姓家里休息。

黄泥坝的残酷战斗，曹鼎的壮烈牺牲，使寿县武装组织，受到了重大的损失，红军战士所剩无几，中心县委责成我集中精力重建武装。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先后在杨家庙、小甸集、王竹滩子、大井寺等地成立了游击小组。各游击小组长由孙瑞训、曹广海、曹云露、韩发明等人分别担任。在此基础上，我们把瓦暴后埋藏的枪支取出来，又将这几个游击小组联合起来，组成了小型精干的游击队。在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这支为数不多的武装队伍，活动于瓦埠湖畔，出没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场合，为民除害，为党除恶，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势力，大长了革命人民的斗志。

这支小型武装建立以后，首先面临的敌手，就是那些既谙熟

地理、又深知风土人情的地头蛇。他们的存在，对我们无疑是个极大的威胁。因此，我们打击的目标，首先就选择这些鱼肉人民最甚、“剿共”最狂、民愤最大的反动头子。我当时是县委常委和军委主席，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斗争，中心县委书记仇西华和我商量，决定以我为首，由军委委员、县委委员孙瑞训、军委委员曹广海和曹云露等，率领各游击小组，对上述各敌，分而歼之。

击毙姚霭卿

瓦暴后，寿县地区的远近敌人，闻风丧胆，不寒而栗。伪县政府在恐慌之际，连忙将隐贤集的官僚恶霸姚霭卿推了出来，让他充当“铲共团”团长。姚在北伐战争时，当过三十三军营长。三十三军改编后，他在家暗藏了枪枝五十余支。大革命失败后，他组织了反动的武装保安分队，出任寿县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大队长。三二年间，他又去隐贤集设立伪团防局，自任局长，疯狂推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漏网一个”的大屠杀政策。同时，他积极勾结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主武装，不断侵挠我大别山苏区边境，还与六安、霍邱等县的反动武装相勾结，将很多忠实的农民和革命群众残酷杀害。因此，沛河两岸的人民群众视他为吃人的野兽。他也深知红军游击队的厉害，平时总是深居岗哨林立的团防局里，很少出来。我们军委几个领导人，对此作了反复研究，决定利用正月十五闹元宵之际，以玩狮子和花鼓灯为名，深入虎穴消灭他。

一九三三年农历正月十五，正是当地玩狮子和闹花鼓灯的传统节日。清晨，我游击队员们，有的藏身狮腹，有的手提花鼓灯，有的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来到隐贤集。演出的地点，我们

有意识地设在离团防局较近的北头。玩狮子、玩花鼓灯，这本是我们当地人的拿手好戏。现在，为了消灭姚霭卿，战士们的劲头更足了，所以，表演非常精彩，不仅博得了广大观众的一阵阵掌声，而且连团防局的伪兵们，也纷纷走向表演场地，拍手叫好。

等伪兵们差不多都出来观看演出了，夹在观众群里的孙瑞训等人，就向身边的战士们发出了行动的暗号，慢慢向伪兵们靠了过去。不一会，观众里发生了争吵，打起架来。混乱中，正看得来劲的几个伪兵，被假装打架的游击队员狠狠揍了几拳。要在平时，这些伪兵早就动手了。而眼前的表演太精彩了，又正在兴头上。孙瑞训等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生怕伪兵们不理采，就连忙抓住一个被打的伪兵，火上加油地大喊大叫：“这还了得，连姚局长的部下都挨揍了。”“啊，太不象话了。”站在一旁的曹广海立即跟着喊：“走，到团防局去，我去向姚局长作证。”说完就拉着另一个被打的伪兵和扭打的游击队员，向团防局走去。其余的游击队员们，见第一步计划已实现，连忙放下手中的玩具，故意愤愤不平，大吵大闹地涌向团防局。

这时，正躺在厢房里抽鸦片的姚霭卿，听到大厅里人声嘈杂，乱作一团，气得暴跳如雷，一骨碌跳下床，冲进大厅里，大声训斥道：“什么事啊？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哎！”

姚匪话音未落，只见这些争吵的、扭打的、作证的、玩狮子的、提花鼓灯的，全都掏出了武器。伪兵们还没来得及弄清眼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姚霭卿等应着枪声倒在了地上，结束了他们作恶多端的狗命。

这一仗，我们击毙了姚霭卿，缴获敌人长短枪近二十支，子弹二百余发，受到了中央《红军捷报》的表扬。

席间擒敌首

姚霭卿的毙命，给皖北的反动阶级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伪县政府又把盘踞在寿县南乡的一个大恶霸毕少山推了出来。

毕少山，曾任国民党军队的旅长，霸有万亩土地。他的凶残歹毒，比起姚霭卿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同行中，他又以“剿共能手”著称。自被委任为“剿共”司令后，他以开荒集为据点，每到一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群众称他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并为他编了一首歌谣：“匪首毕少山，杀人不眨眼，日里要捐税，夜里去强奸，谁人捐税交不上，黄土坑里把命完。”为了显示他反革命计谋，日夜带着队伍，到处设立“盘查哨”，路途封锁极其严密，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给我们党的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为此，我们决定消灭这个猖獗狡诈的匪首。

七月的一天，我侦察员探知毕匪将于九日前往开荒集，调解张、范两家老财纠纷。又经过详细分析和了解，情报属实。

九日清晨，曹广海化装成大地主，七八个队员为随从，来到开荒集的范家馆。事后，我们又挑选了五十名精干游击队员，化装开往开荒集。又让侦察员挑了一担颍州瓜，作为给毕匪的“见面礼”。

按照周密布置，曹广海等人刚踏进范家馆门口，跑堂的（我地下内线）立即迎了上来：“毕司令刚来，我带你们去。”于是，在内线的带领下，曹广海等人来到了一个偏僻的院落里，由侦察员挑着西瓜打头阵。侦察员进门后，曹广海等人跟着就往里走，但被持枪的哨兵拦住了。哨兵看到曹一身大地主打扮，又听

说有要事找毕司令，不敢拦阻，但坚持要看证件。曹一边跟敌哨兵周旋，一边注意房内的动静。为了麻痹哨兵，他假装从口袋里掏证件，看到侦察员已拿了一个西瓜送到毕匪面前时，就势拔出手枪，出其不意地打掉哨兵。枪声一响，战士们迅速冲了进去。正在猜拳吆喝的毕少山和那些为非作歹的恶棍们情知不妙，慌作一团。毕匪一脚登开窗子，刚要纵身往外跳，被我侦察员拦腰一夹，狠狠掼在地下。几乎是同时，外面的游击队员听到枪响后，亦相继搜缴了开荒集上资本家和地主豪绅的枪枝。

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毕匪的左轮枪一支，长枪二十余支。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当众结束了毕少山的狗命。

赌场除叛徒

董曙东一九二七年曾混入党内。瓦暴后，他由动摇而叛变，公开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谬论，不久便卖身投靠了张焕亭，当上了反动的联庄会长。三三年间，我们先后消灭了姚霭卿、毕少山后，他惊慌失措，就和张焕亭、胡南滨等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组织了“剿共团”，盘踞在杨家庙、枣林铺一带，捕杀我革命者和家属，并准备勾结伪保安团，妄图彻底消灭杨家庙地区党的地下组织。鉴于他的反革命罪行和生活规律，我和孙瑞训等人根据中心县委的决定，利用二月十九日枣林铺烧香会这个有利时机，以智取的办法除掉他。因为这一天，这帮恶棍必然要去聚赌的。

二月十九日，天刚拂晓，孙瑞训、曹广海、曹云露等十二人，有的化装成赶庙会的，有的挑着赌桌，有的担着箩筐，陆续来到了枣林铺。大约八九点钟的光景，董曙东、胡南滨和一些豪绅恶棍（张焕亭因故未来），在乡丁的簇拥下，来到了赌场。

枣林铺一年一度的烧香会，非常热闹，人来人往，磕头唱喏的，虔诚祷告的，相互交谈的，访亲寻友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为了不伤害这些来往行人，我们事先让曹广海带领几个人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摆了一张赌桌。不一会，董曙东等在我游击队员的引诱下，包围了曹广海的赌场。不容曹广海开口，董曙东就破口大骂起来。那些豪绅恶棍也狗仗人势，用手指着曹广海的脸大骂训斥。站在一旁的孙瑞训，看看时机成熟了，迅速发出了行动的信号，战士们一见，掏出枪枝呼呼地放了起来，叛徒董曙东和几个恶棍应声倒地，昔日为虎作伥的胡南滨，虽然未被打着，却骇倒在地、一命呜呼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连除三害，军威大振。东至淮南、南抵六安、西接霍邱，北达凤台，纵横二百余里，扒粮、抗粮、抗捐、抗税等革命斗争方兴未艾，胜利一个接一个。我们的队伍，亦由小到大，日有所增。对此，中央多次予以表扬。然而，正当我们进一步开展具有一定规模的游击活动时，张国焘却葬送了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撤退。由于苏区只留下少量的红军在坚持斗争，皖北的反动武装与国民党军队纠合在一起，对付革命力量。因此，我们的斗争活动，又面临新的困难。

一九三四年春，党中央派人来要我们把队伍拉起来，创建新苏区，援助老苏区。当时，我正在太和整顿组织。中心县委派人把我找回来，谈了中心县委的计划：成立皖北游击大队。大队长孙瑞训，大队副曹广海，政委是我。大队下设组织、宣传两个机构，由曹云露、马实分别任委员。杨银声为大队宣传员。大队下设三个中队，颜理坤、颜理国、韩发明、韩祖恭等分别为中队干部。但这只是中心县委的抽象计划，具体如何搞，中心县委责成

我和孙瑞训、曹广海、曹云露商量。经过研究、决定先打一仗、要求这一仗必须打好，然后再把大队的旗帜打出来。这一仗的目标是吕小圩子，因为这里住着一个钱财枪枝都有的地主吕学遵。吕的大儿子是邮政局长，小儿子管家，又是个武艺娴熟的打手，吕本人是个中医。我们决定利用他行医这一有利条件，由曹广海化装成“病人”，我为“病人”的亲属，我们一行五人先打进去，其余的战士埋伏在圩外的高粱地里，相机行事。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到了晚上，我们将圩门打开，让老百姓前来开仓取粮。这次战斗，我无一伤亡，共缴长枪十余支，短枪五支，还搞了一些银洋和票子，连夜胜利撤出。

从吕小圩子撤出后不久，我们来到了石家集和保义集之间的洪家油坊，跟反动武装打了一整天，最后攻了进去，枪决了四个反动豪绅。没料到第二天天刚发白时，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开始，我们还误以为是地方民团和土匪武装，就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双方接上火后，战斗很激烈。我率领部分战士，从围墙的缺口处冲过去，准备给敌人来个下马威。刚冲了几步，就被敌人的子弹打倒在地，两个战士把我架回墙里。跟在我后面的杨跟声被激怒了，他迅速摸到敌人的火力点附近，一阵猛打，消灭了敌人，夺取了一挺轻机枪。队伍又退了回来。

战斗在进行着，我方的损失，越来越大。天亮后，才发现交战的敌手是国民党东北军。于是，我们决定：利用围墙这个有利条件，不让敌人进村，坚持到天黑以后突围。交战中，经过土方法抢救，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同时，孙瑞训伤势太重，不能说话，我就和曹广海、曹云露商量突围办法。后来，由曹云露带了两个战士，摸掉了敌哨兵，出其不意地突围出来了。

从打吕小圩子到洪家油场激战，我们虽然受了一些损失，但没有一个战士牺牲。从此，我们皖北游击大队，在战斗中正式成立了。

伏击路奎汉

我们的活动，引起了寿县伪专署和伪政府的极大恐慌。除了一日多次电告伪肃反专员席楚霖和蒋介石“惨案迭起，党国元老屡遭杀害”、要求“尽快除尽土共”外，又挑选了一个反共老手——伪瓦埠区区长路奎汉，让他充任“剿共大队长”。

阴险狡猾、心狠手毒的路奎汉坐镇在我根据地瓦埠、双庙、上莫寺、小甸集一带，在方圆数十里的大小道路上，增设了密如蛛网的“盘查哨”，就连三五户的小村，都布置了联庄会和“剿共团”的反动武装。一时间，白色恐怖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路匪的反革命行径不仅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而且给当地的人民群众也制造了数不清的灾难。另外，他诡计多端，变化无常，行踪不定，每到一处，总是小心翼翼，前有先头开路，后有卫队跟随，要消灭他，就必须摸清他的活动规律。

七月二十五日，我们得知路匪的确切消息后，经过广泛讨论决定：由我率一部分战士，以拾粪为掩护，埋伏在邢家岗左侧，迎头痛击；由曹广海率一部分战士，以理水为掩护，埋伏在王家岗，拦腰截击；由曹云露率一部分战士以割草为掩护，埋伏在曹家岗，从后堵截，形成三角形包围圈，使路匪成为瓮中之鳖。

次日，我们各自按照预定计划，陆续来到指定的伏击地点，静候这条毒蛇。直到太阳偏西时，酒足饭饱的路匪才带着几十个“剿共”队员，骑着一匹大白马出现在我们伏击圈内。我让过先头，朝路匪迎了上去。路匪一见，连忙拔出手枪，说时迟，那时

快，未等他动手，我手中的枪就响了起来。猝起的枪声虽然没打着他，却把他骇下马来。这个外强中干的家伙顿时吓瘫在地。跟在路匪身边的匪兵，一边还枪，一边架起路匪就往西边跑。然而，我等待已久的战士们眼看路匪急急如丧家之犬的样子，更加坚定了消灭他的信心。

前后夹击，两面围堵，吓得路匪魂不附体。最后，拼命钻进了孤独无援的死胡同——吕家围子的高楼上，企图负隅顽抗。路匪的顽固，更加激怒了我全体战士。曹广海登上屋顶，指挥火攻。顿时，烟雾弥漫，火光冲天。路匪被焚烧难熬，妄想突围，刚冲出高楼口，就被我活捉了。出于阶级义愤，加上缺少子弹，战士们就用刨头，把他活活刨死，又把他的头割下来示众。

这场战斗，我们投入了一百余人的队伍，无一伤亡。

从击毙姚霭卿始，到路奎汉灭亡止，规模和声势虽无瓦暴那么大，但我们经过艰苦斗争，建立了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开创了皖北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二

从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我们继续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进行着游击战争。皖西北特委和皖西北游击师的相继成立，使这一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时期。

撤出皖北 转向合肥

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是寿县党组织和游击队最活跃的时期，除恶反霸斗争取得许多重大胜利，从而引起了皖北敌人的

极大仇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在寿县县党部一些成员的再三要求下，派出大批正规军到寿县，并派出所谓“肃反专员”张化石（原中共安徽省委委员，后叛变）到寿县上莫寺、小甸集一带活动，企图消灭我们。斗争形势又尖锐起来。

面对恶劣的环境，我们与中心县委书记仇西华以及杨守先等同志共同研究对策。会上，我和曹广海、曹云露一致认为，目前的形势对于我们继续留在寿县是很不利的。一则，敌人的兵力占着绝对优势；再则，我们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主力红军的支持；三则，皖北地势较平坦，没有回旋余地，不利于打游击。因此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但仇西华怕部队一走，敌人来搞清洗，群众受苦，党组织也存在不住，不同意撤离寿县。最后，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只有保住部队，斗争才能继续下去，如果留在寿县，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杨守先态度不明朗，但看到我和曹广海、曹云露等坚决要走，也表示同意。我们还建议仇西华到颖上、阜阳一带开展活动。

部队往哪里去呢？当时，我们听说合肥有一支红军游击队，在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文率领下，战绩卓著，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商定把队伍拉到合肥，与合肥游击队会合。那时候，皖北游击队共有三、四百人。为了纯洁部队，提高战斗力，我们把一些不纯分子，以及革命意志不坚定和家乡观念严重的人清理下来，把精选的一百二十多人编成三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又叫便衣队），除特务队以外，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

经过整顿，部队开到杨家庙东边的孙家圩子。第二天晚上，由合肥中心县委联络员朱延楷带领，向合肥进发。后通过合肥中心县委秘密交通员彭家银，与合肥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找到了刘

文。

刘文非常高兴，激动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从刘文的谈话中我们得知，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合肥游击大队受到惨重损失，大队长颜文斗壮烈牺牲，功勋卓著的合肥游击大队，只剩下孙仲德、奚业胜等五、六个人和几条枪。我们队伍一到合肥，群众奔走相告，斗争情绪又高涨起来。

接着，我们和刘文商定，以皖北游击大队为基础，将皖北、合肥两个游击大队合并，成立皖西北游击大队，由曹广海任大队长，孙仲德任大队副，我任政治委员，曹云露任组织委员，马实任宣传委员。同时，拟定下列意见：

将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皖西北中心县委，由刘文担任书记，我为委员，曹广海、曹云露列席。然后成立皖西北特委。

决议形成后第二天，即迅速派交通员前往上海，向中央局请示报告。

部队驻扎的彭家圩子离中派河很近，估计在中派河活动的敌三河区区长王庚年得到消息后，会很快来进攻。所以，游击大队必须尽快转移。经过研究，决定开往舒城。舒城山峦起伏，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有利于开展游击活动。于是，我们连夜派人到舒城，找到舒城老党员，合肥中心县委委员张麻子（绰号），决定第二天由他带领部队向舒城进军。

然而，由于彭家圩子一个富农的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我们。可是游击大队刚进行过整顿和精选，战斗力很强，打了差不多一天，我们只有一人受伤，而敌人却死伤不少。当天晚上，我

们突破包围，离开了彭家圩子。

重阳节，我们来到春秋山。山上庙里住着十几个和尚，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入。因此，我们麻痹大意，防范不严。结果一个和尚偷偷溜下山去向舒城县的敌人告了密。舒城保安队和东北军的正规部队，连夜赶往春秋山，把春秋山围了个水泄不通。天亮后，我哨兵才发现敌情。这时，敌人开始以优势兵力向上发起进攻。

我们采取边打边走的战术，一个中队打前锋，一个中队打后卫，逐步向西南方向撤退。刚冲到山脚下，又遇上装备精良的东北军的堵截，情况非常紧急。这时，大队长曹广海的腿部又受了重伤。我们派两名战士背上曹广海，集中兵力，突破重围，硬冲到白花岭。

弹药越来越少，我们的战士就以石头当武器，最后，勇敢地与敌人进行搏斗，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包围。我们让战士抓紧时间休息，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

这时，曹广海被安排在白花岭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家里。我来到他身边安慰他。他很激动，然后，慢慢解下身上的光洋袋子，双手交给我，又摸着他的手枪，艰难地对我说：“你们走吧，看来我是不行了。你们带着部队走吧，只要有部队，就会有一切……”他正说着，一颗流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英勇善战的皖西北游击大队长曹广海同志，就这样牺牲了。

我们怀着沉痛悲愤的心情，安葬了广海同志的遗体。并决定由孙仲德代理大队长。

天黑以后，我们派人侦察敌人的兵力部署，发现东、南、西

三个方向敌人兵力强大，只有北面较为薄弱，敌人的指挥机关又设在这里，敌人可能估计我们不会从这里走。

到了半夜，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直捣敌指挥部。等敌人弄明白我们的意图，组织兵力围击我们时，我们早已急驰到舒城北乡了。

春秋山这场恶仗，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失，牺牲了曹广海、颜理国、韩发明、田道生、曹云峙等一大批骨干，一百二十多人的皖西北游击大队，只剩下四十余人，其中不少人还带着伤。

后来，部队开到合肥西乡缺牙山。我们就派人找到合肥的刘文、舒城的张麻子、庐江的张胡子等皖西北中心县委委员，以及地下工作者胡志满、顾鸿等人，研究下一步的工作。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根据当时形势，目标不宜过大。于是决定：把全部人员分散开，由张胡子和顾鸿带一部分人去庐江；刘文带一部分人去庐江、无为一带；我带一部分人去舒城南、北乡；曹云露带一部分人留守合肥西乡，必要时，也去南乡和东乡。同时，将春秋山的战斗情况，向党中央汇报，请求中央指示。

缺牙山会议以后，我和便衣队队长、地下党员胡志满在舒城南北乡一带开展活动，常常隐蔽在胡志满家中。白天，敌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情况很紧张，我们每次在胡家，总是志满的十四、五岁的侄儿在山包上放哨。他年纪虽小，身体弱，但很机灵，每次放哨，他总是拿着一把镰刀，从早到晚守在山口，履行着叔父交给他的任务。不久，志满的行动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几次抓他，都没有抓到，便放火烧了他的家。于是志满就把家安在山坡上的一个小石披厦里，把侄儿宇发托付给我。从此，宇发（现名陈郁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初，上海中央局派李德保到缺牙山来传达中央指示。

根据指示精神，正式成立了皖西北特委，刘文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李德保任宣传部长，王大姐（真名已忘记）任妇女部长，张麻子任农运部长，杨银声为青年团书记。根据中央“部队要继续发展扩大，打通与老苏区的联系，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建立新苏区”，和“部队命名为皖西北游击师，师干部由特委自行任命”等指示，确定了游击师的主要领导：师长孙仲德、政委张如屏，参谋长曹云露。

根据游击师的人数，只设三个连。连长和指导员分别由杨银声、奚业胜、韩祖恭、任继年、冯照炉、杨三驼子（绰号）、薛汉章等担任。全师约一百人，长短枪百余支。我们随即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员枪支集中到缺牙山，决定先打一仗，而且要首战告捷，从而把皖西北游击师的旗帜树起来。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把战斗的目标选择在附近的肥西众兴镇。众兴镇上有一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民团，又拥有一些枪支弹药。另外，一连连长任继年的哥哥任继周是该镇草市场的掌秤的。任继周的老婆长得比较漂亮，为民团团长霸占，任继周一心要报此仇，但又力不从心。于是，我们事先做任继周的工作，希望他做内应。任听后自告奋勇与我们合作。我们先将部分游击队员化装成老百姓，住在任继周家里，第二天拂晓，出其不意地向民团发起进攻，里应外合，一举将三十多名团丁全部缴械，活捉了民团团长。在群众纷纷要求下，我们枪决了这个恶霸。

这次战斗，除了缴获全部掠夺来的资财外，还得了三十多条枪枝。

袭击众兴镇民团的胜利，正式宣布了皖西北游击师的成立。部队撤回缺牙山以后，将胡志满领导的便衣队改编为手枪连。

根据当时游击战争的需要，为了扩大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游击师拨出一部分武器装备给胡志满。他在这个基础上，又组建了一支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

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师的影响，壮大革命力量，特委决定把党的骨干分子分散到各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扒粮斗争。具体分工是：刘文带一部分人到庐江、无为一带，张如屏等到舒城南、北乡，顾鸿等到庐江，孙仲德、曹云露、马实等留在合肥西乡，必要时可到东乡。

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在群众中挑选了一批忠实可靠、革命立场坚决的人，作为斗争的骨干，或发展为秘密党员。在此期间，我们先后在庐江、巢县、无为、舒城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十几个党支部。

随着形势的需要和条件的逐渐成熟，党的中心任务开始转移到扒粮斗争上。

扒粮斗争是由各地党组织在秘密条件下发动和组织的，具体方法是，确定扒粮对象，串联贫苦农民。时机成熟后，约定时间和集合地点。群众集合后，游击队员和当地赤卫队员分别担任前导和后卫，武装保卫扒粮斗争。扒粮队伍的组织，一般以支部为主，党员带头，队伍以村庄为单位，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出发前宣布纪律。例如，进入地主家中，除了拿粮食等物以外，不得乱翻乱搜，不得讲话喧闹，事后要严守秘密；扒粮时，所有人员都要戴上马虎帽；工具要用好，免得半路损坏漏了粮食被人发现；沿途不准走水田埂和水塘边，若遇雪天，要有人在后

边扫除脚印；各自在自己家门拴、门框上加油，以免出入门时有响声；吃饭时，要有人问，就说是在亲戚朋友家借的等。

为了迷惑敌人，到东乡扒粮，就在西乡打枪，在南乡扒粮，就在北乡路上撒些粮食。

当时，皖西北灾荒严重，穷人没有粮食吃，一些没有扒粮的人拿着口袋，四处打听，要求参加扒粮，白天找不到，晚上就在路边等。参加过扒粮的人往往得意地向没有参加过的人称：“我是在组织的”。有时碰到地主，他们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围在一起，故意大声议论：“‘土匪’真有意思，光要粮食，其他什么都不要，也不打人，真是怪事。”

根据特委指示，游击师除掩护群众开展扒粮斗争以外，还要化整为零，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卫群众斗争果实，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

面对声势越来越大的扒粮活动，地主豪绅又怕又恨，他们上下勾结，企图与我们较量。我皖西北特委决定再次把兵力集中起来；有力地打击敌人，在斗争中求得我军的生存、发展和壮大。

首先，我们决定拿最顽固的敌人开刀，在卫家圩子打个伏击战。为了引蛇出动，我们的特务连利用夜色掩护来到卫家圩子附近。孙仲德带一部分人进村把一些不可靠分子控制起来，参加伏击的队伍选择好有利地形隐蔽起来，并严密封锁消息。

第二天上午，十几个身穿灰军装、腰插盒子枪的人来到卫家圩子村口，一看大门紧闭，便破口大骂，哨兵一看是国民党第十路军的服装，连忙放下吊桥，迎他们进村。十几个人来到卫家正房，一个白胖、手捧“二八嘘”水烟袋的老家伙殷勤地迎上来，尚未站定，十几个人突然唰地一声掏出枪来，一齐对准这个老东

西：“你不是以防万一吗？我们就是孙胖子的队伍”。

当时，我们游击队三个主要领导人各自有一个绰号，师长孙仲德膀粗腰圆，故名大胖子，我身材矮小，外号张矮子，参谋长曹云露视力不好，人称瞎子。皖西北的老百姓听到这三个绰号就异常高兴；地主豪绅听到这三个绰号，如同挖了他家的祖坟一样难受，甚至哄吓家中小孩，也用这个绰号。当下，这个平日为非作歹，飞扬跋扈的“卫老爷”，一听是孙大胖子的队伍，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头点得象鸡啄米。我们的战士向他“借”刚买来的全部枪枝弹药，同时，要他杀猪为我们“解馋”。

这个外貌斯文，心如蛇蝎的家伙一一答应，一面却偷偷派狗腿子跑出去搬救兵。这个诡计多端，自以为可以置我们于死地的家伙，哪里想到正好中了我们的计，引来更多的敌人，投入我们的天罗地网。当闻风而至的敌人全部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时，我游击队利用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敌人被我们打得昏头转向，乱成一团，急忙向卫家圩子突围，我们的战士脱下伪装，迎击敌人。敌人前后受击，溃不成军，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不得不放下武器，向我投降。

这次伏击，我们以微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当合肥援敌闻讯而来，我们早已带着大批战利品，押着俘虏，浩浩荡荡地转移了。

紧接着，我们又消灭了“五虎将”。所谓“五虎将”，乃指合肥五十里铺汪大祥的五个儿子——汪必元、汪必海等五兄弟。这五个家伙武艺娴熟，枪法准确。他们和镇上的联保主任宣贯白互相勾结，无恶不作，不可一世。当时，寿县有个大土匪，名叫张大鼻子，此人武艺高强，形踪诡秘，连桐城、庐江的县长都被

他俘虏过。可是他却惧怕汪家“五虎将”。

我们选好时机，由孙仲德率领部队前往五十里铺。刚接上火，我们的人就被“五虎将”之一汪必恒抓住。孙仲德一见，迅速扑了上去，将汪必恒打翻在地，但很快又被汪压在下边。此时，另一只“虎”赶来，准备向孙仲德开枪，但见二人纠缠在一起，汪又骑在孙的上边，不敢随便打。恰在这时，曹云露赶到，将那个举枪待发的敌人击毙。然后飞身来到孙仲德身边准备帮忙，孙仲德大喊：“我在下面，他在上面，快开枪吧”！曹云露瞅准机会，对着汪必恒就是两枪，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嚎叫着在地上作临死前的挣扎。接着曹云露又打倒一只“虎”。

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由于连续消灭了三“虎”，战士们斗志更旺，一鼓作气，穷追猛打，迅速向联保主任宣贯白发起进攻，很快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并活捉了宣贯白，打死了另两只“虎”，大获全胜。后来，战士们把这次战斗编成小故事传扬，流传甚广。

这次战斗，虽然我们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是彻底消灭了宣贯白和大地主汪大祥以及臭名昭著的汪家“五虎将”。对于皖西北人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在开展扒粮斗争和积极出击，消灭敌人的同时，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率领部队转战皖西北一带，尽力打通与老苏区的联系。

一九三五年三、四月间，部队向岳西县主簿园和黄麦园一带进发。这一带，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的疯狂破坏，很多村庄被烧掉，群众被集中到几个大村庄里，生活极为困难。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家住黄麦园，辣椒当油盐”。“家住大山头，寸木作灯油”。我们来以前，没有想到问题这么严

重。当我们在深山老林里找到八十二师手枪团政委徐成基时，看到他们的部队不但人少，武器装备比我们游击师差得多。他们看到我们的情况，就向我们提出来，要到皖西北地区活动一个时期，一则，摆脱敌人对红军的封锁围剿，再则也可以解决他们的给养问题。经过协商，我们同意了，并主动提出来配合他们的行动。

游击师和手枪团汇合以后，我因患了疟疾，身体虚弱，为了不給部队添麻烦，我就和刘文一道前往合肥南乡，游击师由孙仲德率领，和手枪团一起开往合肥西乡。

这段时间，两支部队组成的队伍，活跃在合肥一带，出没在民团、地主豪绅及一些反动武装统治的地区，先后攻打了肥西烧脉岗和肥南以及三河西的几个集镇，缴获了很多物资和枪枝药弹，八十二师手枪团得到了补充。

戴家桥位于庐江县中部，交通方便，又是庐江县县长汪培实的老家，这里既有一定的兵力，又有资财，游击师到这里开展活动以后，曾于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打过一次戴家桥，但没有成功。十二月二日，曹云露率领游击师的部分人员以及胡志满领导的舒城游击队，共一百余人，于深夜抓住叛徒姜必声和县长汪培实的叔叔汪新亚。三日早晨，正准备向戴家桥守敌发起进攻，不期和庐江县常备队寻找红军的二百多人遭遇。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我们不得不撤离。

晚上，部队来到庐江东北方向的一个湖边，开了一个小规模的斗争汪新亚、姜必声的会议，会后，将叛徒姜必声当场处决。汪新亚因为是所谓“塘坝委员”，欺凌和鱼肉百姓，民愤太大，群众用钉耙将他砸死。

这一仗，虽然没有打下戴家桥，但由于处死了姜必声和汪新

亚，为地方党组织清除了一条毒蛇，为人民免除了“塘坝委员”这一层剥削。从此，再没有塘坝委员这个名称了。

过去扒粮活动一般都在夜晚进行。现在攻打集镇都在白天，打完仗即开仓放粮，部队得到扩大和补充后就撤离，浩浩荡荡，土豪劣绅看了十分害怕。舒城、合肥、庐江、无为、巢县等地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过去，一个村子只有几户是“赤化”的，现在，有的村全部“赤化”，村与村联成一片。游击队员大白天可以背着枪走村串巷。村与村的党组织也互相联系，地方上的游击小组也得到发展壮大。舒城胡志满领导的游击队由开始时的几个人发展到游击师的便衣队，合肥西乡的桂金廷领导的游击小组也有了十几枝长短枪，庐江的张胡子游击小组也有了可观的装备，皖西北游击师已由最初的百余人发展到四、五百人，我们军威也由此大振起来。

由于我们武装力量的逐渐壮大，特别是大别山区革命斗争形势有了很大发展，造成了对敌人的极大威胁，蒋介石更是如坐针毡，亲自领导对我大别山根据地进行疯狂的进攻。国民党安徽省长刘振华在被蒋介石斥责“剿共”不力以后，也集中十一路军，寻找我游击师作战，千方百计消灭我们。皖西北特委根据这一严重局势，决定将部队分散以保存实力。孙仲德带一连和半个手枪连进入大别山整顿，剩下的人就地坚持斗争。后来考虑到八十二师伤亡过大，装备又差，又决定分一个连去充实八十二师。

孙仲德走后，留下的部队由谁来领导呢？当时，我、曹云露和奚业胜都受了伤，马实自告奋勇，要求带领部队，怕我们不放心，还立了“军令状”。刘文、曹云露和我商量。我认为，马实在春秋山战斗中表现也还勇敢，部队可以交给他带。于是，就这

样定了下来。随后，曹云露去合肥西乡治腿伤。我经肥东党支部介绍，化装成大地主，住进巢县卧牛山的普仁医院。院长魏慕华是天主教徒。

不久，刘文突然派人找我，要我赶快回去。当时，我的伤还没有好，和魏慕华也建立了友谊，他坚持不让走，我只得以家中有要紧事为借口，非走不可。魏慕华挽留不住，就给我雇了一顶轿子送我走。第二天，在合肥南乡见到刘文。原来，马实把队伍带到烧麦岗一带，路上杀了猪贩子的两头猪吃，猪贩子告诉了敌人。合肥的保安队、三河区王庚年的地主武装很快追了上来。本来，敌我兵力相当，但是敌人一包围，马实慌了手脚。当时几个连长建议坚持打到夜里再突围，但他不听大家的意见，坚持白天突围。突围后，由于马实指挥不力，部队昏头转向来到中派河。敌人在这里布置了很强的兵力。部队过不了河，他又下令就地硬拼。结果，二个半连全部垮掉，三百多人淹死的淹死，打死的打死，只有少数人跑掉和被群众掩护下来。好端端一支队伍几乎损失殆尽。马实本人也负了伤。他给刘文写了个条子：“我的脚负伤，被群众隐藏起来，现在需要回寿县治疗。”等刘文几天后收到他的条子派人去找他，他已经跑了。刘文要我回来收拾残局，重新把部队搞起来。

我就把陆续归队和当地的一些游击小组成员，组成一个连，长短枪共七、八十支。随后就拉到大别山区，与孙仲德汇合。

我们初到山区的时候，敌人的兵力还比较薄弱，我们活动还比较方便。但因我们初到这里，尚未和当地人民群众取得联系，加上红四方面军离开以后，遭到了敌人残酷打击和迫害，群众怕和我们接近。我们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山区，即潜山、英山、霍山、

金寨一带。不久，我们和八十二师汇合。当地有个黄茅园，有一片竹林，敌人派一个连在那里修碉堡工事。我们发现后，和八十二师手枪团政委徐成基商量，想吃掉这个连。次日拂晓，我游击队主攻，手枪团打援，向敌人发起出其不意的进攻，缴获了全部武器。我们为了支援主力红军，主动把重机枪和一部分长枪送给手枪团，只留一挺轻机枪。后来，高敬亭得知后，执意要将轻机枪也拿去。同时，他又派了一个团政委当我游击师的副师长。这个人来后，就着手酝酿将游击师在大别山区活动的部队编入高敬亭的部队。此外，这个人动不动就骂人，引起了战士们不安和不满，加上大别山环境逐步恶化，部队活动和吃穿都十分困难。不久，一连一排长任继周又叛变。杀死副师长，带着他的一排人逃走。战士们看到杀死了副师长，部队又在大路上走，感到情况不妙，就跑了一些人，最后，他只能带走一部分新战士。当任继年、陈郁发从梦中惊醒，得知此事时，急忙集合队伍追赶。后来，任继年把集合起来的二十几个人带到孙仲德那里。最后，我们经过研究，决定把部队拉回舒城、合肥一带。不久，又和刘文汇合。

这两起事变，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损失，四、五百人的队伍，减少到一百二十多人。舒城、合肥、庐江、巢县、无为一带的游击斗争，又由高潮转入低潮，我们面临的局势，又变得严重起来。

消灭叛徒任继周

我们从大别山区撤出不久，队伍刚刚在舒城南乡住下，便衣队长胡志满前来报告，说叛徒任继周带着一部分特务，住在一个庙里，准备进山搜索我们，现正在那里吃酒打牌，还准备回合肥

西乡去接老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顿时怒火填胸，当即决定除掉他。

这天晚上，时值严冬腊月，北风呼啸，浓云密布，雪花飞扬。但为了不失战机，我和曹云露带领队伍，经过紧张而艰苦的雪夜急行军，赶到叛徒住地，很快将这个庙堂包围起来。与此同时，为了不使敌人给叛徒以援救的机会，事前我们又派人卡住了附近的一座碉堡。一切准备就绪后，向叛徒发起进攻的枪声打响了。顿时，庙堂周围，枪声就象鼎沸的开水一样，向庙堂里射击起来。

突如其来的密集枪声，骇醒了酒酣之敌，顿时叽哩哇拉，叫苦不迭，乱作一团。这时，我们就停止射击，向庙堂里喊话，说明我们来，目的是为了消灭任继周，其余的缴枪不杀。然而，顽固的敌人，并没有听从我们的劝告，反而操枪向我们射击起来，一个正在挖墙洞的战士被子弹击中，当即牺牲了。旧恨新仇，立刻激起了战士们的冲天怒火，一些战士在曹云露的率领下，从村里搬来了干柴，浇上煤油，因为这个庙堂顶是由丝毛草盖成的，庙内的敌人见了，知道不好，又见我们打死了几个敌人，就把叛徒任继周推了出来。这时，愤怒的枪口，仇恨的子弹，就象雨点般的朝这个叛徒飞过去。任继周冲出大门没几步，就在这愤枪怒弹之中，躺在污秽的血泊里，结束了狗命。就连他的手枪，也印上了许多弹痕。但由于环境所迫，我们不敢恋战，就很快撤走了。

特委扩大会议

为了避免敌人的疯狂“围剿”，以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在肥西把剩余的部队集合起来，立即向舒城北乡一带转移。正在这

时，我们收集到新的情报。原来，我们从合肥转移出来后，合肥西乡的卫家地主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清剿，把特委宣传部长李德保、妇女部长王大姐以及宋德渊三人一起抓走了，并押往合肥。由于合肥西乡反动武装的残酷迫害，南北乡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特委当即在庐江小围子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现存的队伍彻底分散：一，把长枪全部埋藏起来；二，战士尽可能全部动员回家；三，剩余的干部和战士总数二十余人，全部离开舒城、六安、合肥一带，分散到庐江、无为、巢湖等敌人兵力单薄的地带活动，并尽可能找一些职业性的工作为掩护；四，鉴于我和巢县普仁教会医院院长魏慕华和医生袁冠英的私人关系，为了兼顾巢湖、芜湖以及同上海党中央的联系，决定将特委机关设在该医院所在地的大街上。考虑到新的环境需要，决定我带着爱人陶静冰和长女张佳良坐镇特委机关。

会议结束前夕，鉴于目前的严重局势以及现存的特委和师部一些骨干分子的情况，为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战斗，又出于条件的限制，我们就采取了古老的结拜兄弟的办法。当时的排行是从各自年龄的大小来定：刘文为老大，孙仲德为老二，张如屏为老三，曹云露为老四，奚业胜、杨银生、顾鸿、陈郁发等以此类推。接着，各个表态：“为了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在党旗下，进行了集体宣誓：“忠于党，忠于革命，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叛党，不出卖同志”。

与此同时，其他的同志也相继找到了适合各自特点的职业性工作。如刘文，因他的同学是陶行知创办的教育救国会成员，由这个同学的介绍，刘文认识了巢县黄麓师范附近的钟庙小学校长

黄志成，刘文带着杨银声来到这里，既教书、也学习文化。此时，刘文身体很不好，病得很厉害。张世祥、冯照庐、韩祖慕三人，通过张世祥在浙江长兴县煤矿开电车的表弟，在那里开了个“三友实业商店”。孙仲德带着五六个人，购买了一条大船，还特地把船做了个夹底，以供收藏枪枝弹药，活动在安庆——芜湖一带的长江水面上，以贩大米为掩护来从事革命活动。曹云露带着另一部分人与名为保甲长的地下工作者顾鸿一起，在庐江一带活动。孙仲德和曹云露等人，曾先后在白沙洲、黑沙洲、庐江、巢县边界发动群众分粮筹款，继续进行秘密的武装斗争，消灭那些危害很大的叛徒和反动分子，使得反动派对我们的活动不得不有所顾忌和不敢肆意妄为。

因为斗争由高潮转入地下，我们活动的危险性也就很难预测。例如，在巢县的特委机关，姓朱的地主婆对我们的行动很怀疑，但又无从了解，就经常偷偷在我五岁的女儿清良身上打主意，一旦来了人，她就探听消息。为了防止意外，我们专门设置了外交通与内交通，接头先经外交通，再经内交通，然后才能找到特委。担任内外交通，必须是绝对可靠的。彭家银担任了外交通。当时，我的任务，就是经常与各地同志取得联系。但出于工作的需要，有时也经常到各地走走。

一九三六年夏天，刘文因劳累过度，肺病不见好转，吐血不止。我把他接到巢县的特委机关，并住进教会医院。有一天，他对我说：“老张，我们派出的交通，至今未回。据另一交通报告，去年上海局被破坏，薛汉章带着五六个人来，把彭家银带走了。我们要马上通知各地同志，尽量不和薛见面”。原来，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寿县人）于年初就叛变投敌了。当时，我们并不知

道，还派出薛汉章到上海去工作。他一到上海见到李竹声，也就跟着叛变了。为了配合敌人对我皖西北党组织和游击师的围剿，他就带了六七个特务回安徽，企图捕杀我们，结果外交通彭家银被捕。彭直到牺牲，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不愧为党的一名忠诚的战士，革命的好同志。

鉴于这危险处境，刘文说：“我们共产党人，失去了组织关系，该怎么生活呢？”他向我提出，要我和他一起到上海去找党中央。我说：“我虽在上海呆过，但未接上正式关系，不认识人”。他说：“我在上海做过事，认识几个人。现在是有危险，但失去中央指示，就象航海失去指南针一样。再危险也要去，不去也没有办法”。那时，上海有个秘密组织——即教育救国讲习班，每年暑假就开课。我俩就以该班成员的名义，与其他成员一块到了上海北校场，但我们未和他们住在一起，而是在法租界住下来。有天晚上我俩出去走走，恰遇江苏省团委书记老朱，刘曾和他在一起卖过车票。老朱见到我们，连忙把我们拉到一边，轻轻告诉我们说：“上海局势很紧张，特务叛徒追查厉害，你们赶快走。你们要找中央，最好到陕北去。中央红军已经到了陕北，去也有危险，但比在上海危险小些。”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很高兴，就连忙把他拉到我们住处，要他给我们讲讲形势。当时我们船只也正好在上海，第二天早上，我们请他跟我一起上船，沿长江而上，来到孙仲德负责的白沙洲，又迅速派出交通，把各处的人全部找来，在船上听取了他关于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的讲话。大家听了后，觉得很新鲜，非常受鼓舞。

送走老朱后，我们就在马石桥开了一次特委会，决定派人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皖西北部队和党组织发展等情况，并请求中央

给予支持和指示。派谁去呢？刘文有病，又要抓全局工作；要我去吧，特委机关和各地的组织工作离不开；曹云露的部队具体工作又少不了，最后还是决定派孙仲德去。因为他曾干过商团，又懂得行帮的情况，他去，把握要大一些，路上的麻烦可能要少些，况且，他又自告奋勇。确定之后，孙仲德就化装成皮货商。正在准备中，“西安事变”爆发了，只好暂停下来。

借台演讲 宣传抗日

环境的恶劣，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由于老朱的讲话给我们带来了党中央的消息，使我们对斗争更加充满了信心。不久，我们从庐江到无为，正碰上农村唱大戏（农民凑钱搭台请戏班子下乡来演戏），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次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的宣传。事先，刘文、孙仲德等我们一行十来个人，全部化装成学生，来到无为县六峰山（原名蒋家山）。

唱戏的台子，设在六峰山的一个山口处。当我们一行来到戏场时，人们见到我们的装束，以为我们是学生，又见我们给了三块“袁大头”，可能是个负责人，满脸堆笑，高兴得不得了。这时，我们同他商量，想借他的戏台子用一用。他一听，以为我们要唱戏，就更加高兴。因为，本来就给了他钱，现在这些学生跟他在一个舞台上演戏，又能替他们装潢门面。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就准备让曹云露讲，但我们寿县人到这里，被当地人称为“淮北侉子”，只好由孙仲德来讲，因孙是合肥人，他的绰号孙大胖子，在皖西北一带，是妇孺皆知、无人不晓的。所以，他来讲合适。

孙仲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即席演讲，给群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从而使他们明白了许多道理，深深感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同时，又为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投降罪恶行径所激怒。当孙仲德的话讲完后，因为来看戏的老百姓很多，我们就把老朱带来的一些传单和我们写的标语口号散发了，并亮出了红军游击师的旗号。这时，很多群众得知真相时，一下子就站出来好几百人，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跟我们走，表示国难当头，人人有责。我们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一方面向群众作解释，另一方面，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我们从这些人中秘密吸收和发展了一部分。

奔 向 延 安

一九三七年夏，孙仲德化装出发，一路上靠帮人打短工、做零活、历尽艰难险阻，才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由办事处派车把他送往延安。到延安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前来看望他，在详细听取了孙仲德关于大别山苏区和皖西北地区政治、军事、民运工作的汇报后，柯告诉孙：“中央组织部决定刘文、张如屏、孙仲德、曹云露等尽量到延安上抗大，并派宋天觉回安徽接替工作。”不久，宋天觉奉命回到安徽，在白沙洲与我们见了面，传达了中央的有关指示。根据中央关于将保存下来的一批精干力量分批送往延安培养学习、特委工作由宋天觉负责的指示，特委决定由刘文带曹云露、杨银声、奚业胜、顾鸿第一批先走。因为工作需要，我要带宋到各地走走，熟悉情况，然后再将特委工作移交宋。因此，我和陈郁发、韩祖慕为第二批。

六月，刘文等人经芜湖、南京乘津浦、陇海线到达西安八路

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后，刘文又生病，就被送到医院治疗。曹云露等一行四人，经甘泉到达延安。

八月间，特委工作移交完毕，我带着陈郁发、韩祖慕动身前往延安。在途中，韩祖慕问我：“张政委，你过去说革命是长期的，现在该不要长期了吧？”我说：“还是要长期的。现在是抗日战争，社会主义还未到，长着哩。”听我这么一说，他害怕起来。结果，到了蚌埠，趁我们上车的时候，他跑回家去，向国民党自首去了。张世祥等从浙江返回，留在庐江坚持斗争。月底，我和陈郁发到了延安。孙仲德和我分到抗大三期一大队学习。杨银声、奚业胜、顾鸿到三期四大队学习。曹云露和陈郁发分到中央党校学习。

我们在皖西北坚持游击战争而幸存的七位同志到了延安后，简直象进入了另一个新的世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过去，我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武装斗争，历尽了艰难困苦，天天见到的，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手，就是敌人的白色恐怖，甚至连阳光的温暖也很少享受。现在，不仅空气新鲜，而且更重要的是看到一整套党、政、军、民、学的领导机构及来自五湖四海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新型同志关系，亲眼看到了我们党有这么大的力量，有这么坚强的党中央领导，有这么多优秀的中华儿女和虽然艰苦、但充满着朝气蓬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一切的一切，使我们感到了无比的幸福、精神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使我们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

在这愉快的日子里，为了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水平，为今后任重而道远的革命事业多掌握本领，我们以新的精神面貌，开始了新的紧张的学习生活。

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号召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目的，积极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大约是十二月二十几号，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把我和曹云露找去，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说：“中央决定你们俩回安徽去领导抗日”。当时，我和曹共同认为：“现在对安徽的情况不了解，我们两人回去，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最好把来延安学习的几个人全派回去。当然，中央要我俩先回去，我们没意见。”王说：“你俩作个先锋，到那边去看看，确实需要，我们再考虑。你们的工作，到中原局，有朱理治考虑。你们到开封后，他会派人来接头的。”接着，向我们交待了具体的地点。就这样，我们怀着惜别延安和迎接新的战斗生活的心情踏上了新的征途。

到中原局所在地的开封秘密接头处的第二天，正好是阳历年，中原局书记朱理治就正式向我们下达了任务：“中央已批准你们回安徽。回去之后，要尽快把安徽省工作委员会成立起来，工委书记由曹云露担任，张如屏担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宋天觉任宣传部长。这是中原局的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了的。”我提出：“安徽许多组织被破坏，不少人自首过，对其如何安排，能否使用？”朱当即作了肯定而明确地回答：“回去后要大胆使用，细心考察，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自首分子也不是个个都不好，只要不是当叛徒的。总之，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要迅

速地、大胆地把抗日工作开展起来。”

一九三八年元月，我们秘密地回到了寿县杨家庙。面临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另一方面是阶级矛盾，我们要领导人民群众和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还得更警惕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当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进驻凤阳，直接威胁着合肥和寿县。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已撤到六安，寿县专员公署和县政府都跑散了。安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省主席是李宗仁。国民党军的廖磊部驻扎合肥，李品仙的一七四师驻在下圻集。军官出身的石寅生想领导民众抗日，在寿县组织了安徽省第一路人民抗日自卫军，但受到了李品仙的排斥，很快就被以改编为名解散掉了。在被迫宣布解散自卫军时，这位爱国老人十分愤慨地对部下说：“诸位如愿意抗日，就自找出路。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也要去参加新四军抗日。”

在杨家庙，历来反共的张焕亭，在抗日问题上处于徘徊观望之中。另外一些人，如张旭煦等人，则实际秘密为日本人搞情报，充当了汉奸。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真心爱国的人们抗日的要求是迫切的。尤其是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群情振奋，包括那些上层人物的子女，情绪十分激昂，但他们苦于没有坚强的领导，一直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正在这时，人们听说我们是共产党中央派回来领导抗日的，于是把所有希望全部寄托在我们的身上。顿时，“亲日派，投降家，不打鬼子杀自家。反对共产党，进攻抗日军，出卖国家罪不轻。”“不反共，不投降，我们的敌人是东洋”等抗日歌声，响彻皖北大地。

回到杨家庙的第二天，我住在由张政修开设的“张同泰”杂货铺里。很多人纷纷向我们打听延安的情形和抗日的形势。当他们了

解了我党抗日的主张和方针政策时非常高兴，说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一定会胜利。找上门来的人，络绎不绝，越谈越起劲。曾在革命低潮时期动摇和自首过的人也找上门来了。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我们既认真做好这些人的工作，鼓励他们在新的斗争中接受考验，还注意在上层人物中做团结争取工作。当时，皖北形势很紧，人心很乱。杨家庙国民党专员胡紫寿曾三番五次动员张焕亭，要他把队伍拉走，但张有严重的地方观念，处在犹豫徘徊中。当他听说我们是回来领导大家抗日的，想探听一下我们的底细，也找上门来。他说：“过去，我对你们不好，这是我的过错，你也不要见怪……”没等他把话说完，我就告诉他：“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算了，不要再讲了。如果要计较和见怪的话，我就不会见你了。”接着，向他宣传了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并表示欢迎他和我们一起共同抗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张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决心不走了。他不走，公开支持我们，这对我们的抗日工作有利。张化石、胡紫寿等顽固分子也就不敢妄动我们。

总之，当时的抗日情绪，尤其是我们党在皖北人民心目中享有绝对的威信，所以，这就为我们开展并领导抗战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胜利的保证。

组 建 省 工 委

一九三八年元月，为了迅速把安徽省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们在杨家庙“张同泰”杂货铺里召开了一个抗日积极分子会议，由我首先宣布了中原局关于成立安徽省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并将工委主要负责人名单予以公布，宣告安徽工委

正式成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曹云露、宋天觉、曹少修、史泗群、马实、董吉贤、方和平等人。之后，在传达党中央有关抗日问题指示的基础上，研究了如何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等问题，最后责成我立即筹备和组织抗日武装。

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后，我们在上莫寺召开了一个三百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宣传我党中央的抗日方针和政策，并通过这次大会，成立了寿县东南乡抗日救援会，动员大家团结一致打日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把武器弹药献出来。消息传布出去，广大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不到几天工夫，我们就收集到了大约两百条枪，张焕亭也主动把民团武装交给我们统一指挥。这样，我们就公开成立了受工委直接领导的“皖北抗日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由吕子让，赵筹等人分别担任中队长。

我们的活动由秘密逐渐公开，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不仅不准这支武装在寿县活动，相反还发出了秘密通告。有一天，“通天教主”、老同盟会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李雨村派他的儿子李小村来找我。李小村来后，先给我看了一张上面写着“巨匪张如屏、曹云露等由延安窜回寿县杨家庙一带活动，望各军警严密注意”的国民党寿县专员公署的通告，然后告诉我，这张通告是戴九峰转给他父亲李雨村，李雨村看后让他来告诉我，并向我转达了他父亲李雨村的看法：“你给张如屏讲，听他回来了，我不能去看他，望他见谅。在杨家庙一带活动，如果反动派一反手，他在那里吃不消。我的意见，他最好到前线去。日寇已占领了凤阳，就到凤阳去。不知他们愿去否？如愿去，可能好办一些，我可给他们与戴九峰接上关系。戴九峰来信给我讲，国民党省政

府委他个光杆司令，叫他到凤阳去当县长，他不满，想和你们共同抗日。”戴九峰是个知识分子，想争权，又没胆量，很爱面子，住在寿县，不敢回去，但心里也想打回去。

于是，我就同曹、宋商量，并把李雨村的建议简单地说了一遍，曹表示同意，认为到凤阳去比较自由些。在杨家庙虽有张焕亭的人，但姓董的、姓胡的、特别是胡紫寿的力量不小，而且还有张化石的力量，他们时时还想在暗中搞我们，在群众中散布谎言，制造对我们的不信任和怀疑。根据这些情况，为了抗日的大局，尽可能不与他们发生磨擦，以实际行动去教育、团结广大民众一道抗日。意见统一后，决定把队伍拉到凤阳。并将此告知李小村，请他回去转告李雨村。

根据党中央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指示，在李雨村的安排下，我到寿县与戴九峰谈判，明确向他提出：“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他人不得指挥。但支持你当县长。你有义务协助我们筹办粮草经费。我们的部队来去由我们党决定，你不能干涉。”经过谈判，按上述条件，达成了协议。同时，双方约定了出发时间，戴先行一步，去预定的地点等候我们。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们正式把皖北抗日游击支队易名为凤阳抗日游击大队，编制照旧。曹云露因其它工作不能参加，由我带领。出发前，专门成立了由我、曹少修、董吉贤、史泗群等五人组成的核心小组。

夜 攻 凤 阳 城

凤阳人民对高喊抗日而不战自退的国民党军队的可耻行径非常气愤，看到我们的队伍来了，非常高兴。纷纷为我们送情报、

供物资，并要求我们尽快攻打凤阳城。我们的抗日战士士气也很高。核心小组分析研究了情况，识为驻凤阳县城的只是日军的少数先头部队，主要是伪军守城，我们可以寻机突击一下，打打日寇所谓“皇军神圣不可战胜”的威风。

五月一日深夜，我们挑选了二十人的精干小组，由几个当地群众引路，从下水道潜入了城内，随即缴了南门伪军的枪械，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打开了南门。我迅速下达命令：吕子让领着一中队留在城外接应，监视敌人，不让从后面包围，并做好接应准备。我率领二、三中队，迅速奔入城内，一举消灭了城内伪军绥靖队，逮捕了维持会长，之后，就和日军接上了火，一直打到中午没有打下来。因为日军很狡猾，龟缩在指挥部里不出来。为了尽快解决战斗，我带领几个战士冲到指挥所附近。正在这时，日军发现了我们的意图，转过枪口向我发起了猛烈射击，我的右手腕和左肩先后被击伤，部队一时无人指挥，不得不命令从南门撤退。吕子让担任掩护任务，阻击从蚌埠来增援的敌军，在激烈的战斗中，吕子让打得很勇敢，不幸光荣牺牲。

凤阳一战，由于队伍成立不久，缺乏应有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对敌我双方的力量缺乏全面的了解，估计不足；但是，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群众把我们当作亲人一样地欢迎，这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心情和对我党的信任。国民党的一七四师却无耻得很。明明是我们流血牺牲打的风阳，他们倒抢先登报，说是他们打的，大吹大擂了一番。这时，我长江局负责人董必武正住在六安，曹云露向他汇报了我的情况，董老当即指示曹回来接替我的工作，尽快把我送到武汉治疗。我被送到武汉后，

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向他检讨了打凤阳在军事上欠妥的错误。他鼓励和安慰我说：“打就打了嘛，一七四师还争功哩！你们作了你们应该做的抗日事业。对于一七四师的无耻行径，我们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议。”之后，他又对长江局组织部干部科长刘顺元说：“我们的人在嘛，这是活的证据嘛。他们在皖西北打击日寇，在那里树立了一面真正抗日的旗帜，为党赢得了荣誉，为党提高了威信，不愧是中华民族的抗战英雄”。

不久，武汉准备撤退，医院也要撤，周恩来同志亲自来医院找我，问我怎么办：“你是去延安，还是去重庆？或者是去新疆，从新疆到苏联去治疗？”我说：“我回延安为好。”他同意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奉周恩来同志指示，第二次奔赴延安。凤阳抗日游击大队这支武装继续由曹云露率领，在皖西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战争，直到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唐德光整理）

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宜宾特支

陈 林

(全国政协委员)

宜宾地处川南长江岸边，交通发达，是四川省内受共产党影响较早的地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地下党的组织，并进行了一些斗争。

人民的觉醒

宜宾是个比较富庶的地方。但在军阀统治下，遍地种鸦片，四乡土匪如麻，社会混乱不堪，人民深受灾殃，呈现一片凄凉景象。

宜宾是刘文辉割据的地盘。他为了搜刮钱财以肥私和扩大势力，任意征收各种捐税，什么“烟苗捐”、“过路捐”等等，名目繁多，无所不有。

所谓“烟苗捐”，就是他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烟，然后要上好几道捐。种植时按窝数收捐，不管烟苗长得如何，收获多少。收割时又要上一道捐。卖烟时要到他专门办的收购鸦片烟的行，不仅

价格压得低，而且又要交一道捐。经过这一道道的捐税，农民终年劳累，结果所得无几。而刘则以低价收购来的鸦片烟，经过加工装箱，运到上海去卖高价。单从鸦片烟这一项上，不知他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弄了多少钱财。由于他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烟，在他防区的川南一带差不多都种鸦片烟，很少种粮食。出现了“罌粟花开满山坡，庄稼禾苗无几棵”的景象！有人种鸦片烟，就有人抽鸦片烟，弄得一些人骨瘦如柴，倾家荡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鸦片烟给这一带地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过路税”，就是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四处有关卡，他派人把守收捐。凡是场口、关口、渡口，都有收税的兵丁。人们带货出门走路，经过几道卡子，就要上几道捐，在河里，船只通过也要上捐。造成关税重重，怨声载道。

刘文辉收刮这么多捐，主要是用以扩充实力，招兵买马，扩大地盘。一九二二年他打到宜宾时只是一个团长，不久就把部队扩充成为一个师，号称四川陆军第九师，自己就是师长了。

官逼民反，刘文辉的军阀统治，受到了农民反抗。虽然当时还没有共产党领导，但一些进步人士自发地起来反烟苗捐，其声势之大，是他没有估计到的。人民反“烟苗捐”的斗争，不仅给军阀统治以很大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人民觉悟的提高。这就为我们在哪里建立地下党组织及开展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中共宜宾特支的建立

一九二四年，我们党帮助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国共合作的年代里，

宜宾的陈宣三、江子能（都是老国民党员）于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在上海同恽代英同志接触联系。恽代英就介绍他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陈宣三、江子能回到重庆，参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亦称莲花池省党部。当时在大土地还有一个省党部，是国民党右派组织。两个省党部是对立的。大土地省党部没有什么力量，主要是莲花池省党部在起作用。莲花池省党部由李筱亭为主任委员，杨闇公为副主任委员，陈宣三为宣传部长。杨闇公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莲花池省党部兼职。这样，陈宣三同志就同杨闇公同志在一起工作了。陈宣三又同在重庆当中学教员、从事重庆地下党工作的童庸生建立了联系。陈宣三与在宜宾工作的老同学尹绍洲也有来往，向他宣传进步思想。以后，中共四川省委派童庸生到宜宾工作，童通过陈宣三的介绍，同尹绍洲联系，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并发展尹绍洲和郑亮承加入共产党，这是中共四川省委在宜宾所开展的工作。

在宜宾方面，未成立党组织之前，有一位刘愿庵同志（是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在军队里作秘书之类工作，有时到社会上活动。他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主张。他很能接近群众，许多人与他一见面就熟，谈得来，他到那里都有人围绕着他，听他的谈话。因此他结识了許多人。开始，他与尹绍洲和郑亮承有接触和来往。尹、郑都是知识分子，接受了他的宣传，同情共产主义。刘愿庵同志在宜宾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少工作，为宜宾的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后来听说他到成都、重庆等地活动，在重庆被反革命逮捕，牺牲了。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宜宾党组织的成立，但他为宜宾党的建立做的准备工作是不能忘怀的。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尹伯明和郑则龙由上海大学回来了，他们是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的。尹伯明是尹绍洲的儿子，郑则龙是郑亮承的儿子。他们回到宜宾后，把上海的革命形势向进步人士宣传。当童庸生同志作为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员被派到宜宾后，就同这些人联系，商量成立了中共宜宾地下党组织。那时宜宾只有四、五个党员，成立了宜宾特别支部，由尹绍洲同志为特支书记，直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同时建立了宜宾共青团组织，郑则龙为团委书记。

宜宾地下党组织建立后，就组织领导工人、农民、学生开展革命斗争。如当时党领导的打外国油轮（运煤油的船只），没收焚烧日货。都搞得轰轰烈烈。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宜宾特别支部逐步发展，力量不断壮大。在宜宾中学、宜宾女中都发展了党员。党的好女儿赵一曼同志当时是宜宾女中学生，是个活跃分子，就是那个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安边、百花、漆树等地都发展了共产党员，后来建立了党支部。

宜宾特支建立后开展的工作，影响很大，荣县、威远、屏山、云南的绥江等地都派有人来联系。宜宾地区的南溪、江安、筠连、洪县、庆符、长宁等县都发展了共产党员。这些党员在各县都做了不少工作。所以宜宾虽然是个特别支部，实际上成了宜宾地区的一个中心，领导了这个地区的运动。

反对种植鸦片烟，反对烟苗捐的斗争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我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五卅”运动后兼做上海总工会的工作，就在那时入的党。一九二六年的暑假，我也回到了宜宾，参加了宜宾特支的各项活动。十月间，

尹绍洲同志调到涪陵任郭汝栋的政治部主任，同志们公推我代理宜宾特支书记。

我接任特支书记后，主要还是抓反对军阀的斗争，对象就是刘文辉。那时正是大革命高潮，北伐军节节胜利，打下武汉，乘胜北向的时候。四川的大小军阀，大多见风使舵，表示愿参加革命，捞个好听的名声。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頌尧等都是如此。刘文辉不敢得罪左派县党部、表面敷衍。在这种情况下，同刘文辉作斗争，采取的策略是：以国民党县党部为基础，团结所有左派人士，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只反对刘文辉收烟苗捐，不涉及其他方面；利用刘文辉急于想参加国民革命军，不敢干扰我们的机会放手发动群众。

宜宾县左派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委员吕一峰（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尹伯明、郑佑之、郑则龙和我都是常务委员。

我们办了中山中学，由吕一峰当校长，因为他是老国民党员，留过美，在宜宾有一定的影响。中山中学办起来之后，组织学生到城乡宣传抗英抗日，坚决拒绝油船来宜宾，这些学生也积极参加，影响较大。江安中学反对他们的校长，举行罢课，派来代表同我们联系，我们就把他们的学生全部接收过来。同时，宜宾中学、宜宾女中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也建立了学生会组织，他们也积极参加各项运动。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宜宾学生联合会。学生会已完全在我们掌握中。我们还办了“五一”小学，以便安置一些跑来宜宾的失业青年，把他们也组织起来参加一些斗争，扩大革命队伍。“五一”小学校长是赵镜泉，前几年去世。

宜宾有些手工业，工人约三千人。他们生活贫困，有革命要求。我们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县工会，工会的主要领导人是

张占云（共产党员）。工会组织也在我们手中了。工会组织工人开展斗争，检查日货，反仇油斗争等都是工人纠察队出面去搞的。

我们通过这些组织，把宜宾的运动搞起来了。

刘文辉与我们是对立的，但他标榜革命，表面上说些同情我们的话。这就使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地展开。当时，宜宾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农民对种植鸦片烟和收烟苗捐强烈不满，民怨沸腾。我们抓住这个矛盾，掀起反对种植鸦片烟和烟苗捐的斗争。工会、学生会都积极行动，农民更是拍手欢迎，很快这个斗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运动。

人民反对烟苗捐运动，波及到刘文辉统治内部，促使他们分化。宜宾有个团防局长雷士奇，是个很反动的家伙，他忠实地为刘文辉效劳，镇压人民，两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但他下面还是有些比较好的人。比如喜捷乡这个地方的团练就不太信雷士奇的那一套，同情我们，就站到我们这边来反对烟苗捐。

反对烟苗捐运动，不仅在宜宾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还扩大到荣县、南溪等附近县城。凡是刘文辉管辖的防区，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反烟苗捐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月，我们曾把宜宾、荣县和南溪三个县的团练请到宜宾的观音场开了一个会，搞示威，有二、三千武装参加。我在大会上讲了话，主要是说大家要团结一致，坚决反对种植鸦片烟和收烟苗捐，群众一致拥护。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反对烟苗捐的浪潮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比一浪高。群众的斗争迫使刘文辉不能不作出让步。他本人不住宜宾，在宜宾的代理人是他的参谋长辛勉之。辛来同我们谈判，结果同意不收烟苗捐。反对烟苗捐的斗争就取得了胜利，人民拍手欢迎，我们的威信也大大提高。

白色恐怖笼罩宜宾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发生了打枪坝惨案，即“三·三一”惨案。这是军阀刘湘的部下王陵基直接搞的。在惨案中，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同志，组织部长阮均同志，《新蜀报》主编漆树芬同志等惨遭杀害。莲花池省党部的李筱亭、陈宣三等也站不住脚而出逃了。陈宣三到武汉，李筱亭到涪陵。这样，莲花池省党部就垮台了。

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破坏，莲花省党部垮台，直接影响到四川省的斗争。刘伯承同志的部队在泸州驻防，遭到四川各派军阀的围攻。刘文辉、刘湘、邓锡侯、赖心辉都来攻打泸州。刘伯承同志被迫离开四川到武汉。

反革命的魔爪又伸到宜宾。刘文辉的狰狞面目毕露无遗。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他们在宜宾城大肆逮捕共产党、进步学生、革命工人。学校遭解散，县党部被全部捣毁。全城布满岗哨，形势急转直下。充满生气的宜宾城笼罩着乌云。我们的同志四分五散，无法取得联系，也无法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了。我是宜宾的特支书记，是他们的捕杀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能露面了，暂时躲藏在一个同情者的家里，观察气候的变化。气氛越来越紧张，我意识到宜宾城已成为白色恐怖的中心，党组织已不能开展活动，只有把党的组织转移到农村去，再图发展。漆树有一个党支部，离城较远，靠近自流井。那里有个党员叫李蜀杰（又名李家勋），是我中学时同班的高材生，为人忠诚、细致。我考虑到把党的工作交给他是可靠的。我托人带一封信给他，要他接替工作，在乡下活动。

我在一个同情者的家里隐蔽了六天之后，由尹伯明的远房叔祖、当地袍哥大爷尹其三秘密护送离开了宜宾城。我离开宜宾直赴自流井，然后到重庆。重庆在“三·三一”惨案之后情况紧张，我马上又到涪陵。在那里呆留不久便到武汉去找党中央，时间已是一九二七年六月间。

我离开宜宾后，李蜀杰同志如何进行工作不得而知。后来听说，他曾到城里活动，不幸被城防司令覃筱楼逮捕，惨遭杀害。李蜀杰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事迹至今仍在宜宾人民之中传颂。

我离开四川省到武汉时汪精卫还未公开反共，七月中旬，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宁汉合流。党内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了。在紧要关头，党中央作出举行“八·一”南昌起义的决定，让我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去。我又踏上新的征途，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南京怒潮

汪季琦 王 枫

(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驻沈阳的军队突然攻占北大营，十九日晨占领了沈阳城。同时分兵进占安东、营口、长春等地。二十日东占吉林，南迫锦州，海军占领秦皇岛。不上五天，日军就差不多全部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河山。日本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开始实施了。

北大营的炮声惊醒了全国人民。关系祖国前途命运的抗日救国运动怒潮般地高涨起来。作为当时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南京的学生站在这一运动的前列。

我们当时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亲身参加了这次运动。许多情况，记忆犹新。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南京之后，大家都非常震惊。但是大家还来不及弄清真相，不知道是蒋介石下的绝对不许抵抗的命令，所以广大工人、学生、市民的矛头一是针对日本的侵略，二

是指向张学良，认为张学良是不抵抗的罪魁祸首。一般的想法是要求国民政府罢免张学良和其他不抵抗的军官，明令出兵抵抗。不仅大多数人民，而且连国民党的普通党员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九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南京各区党部召开了党员大会，准备次日举行反日游行。九月二十二日南京各大、中学校罢课，上街宣传抗日，要求国民政府下令出兵抗日。连中央大学朱家骅御用的学生自治会当时也发表了告同胞书。

蒋介石感到这样下去会失去控制，马上在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借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了南京市国民党党员紧急大会。那天，王枫看见有许多人进入大礼堂开会，并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就和少数其他同学走上礼堂的三楼，俯看下面的会场。只见蒋介石、戴季陶都在台上，戴说：“中央对抗日极端重视，但一切须听中央指示，切不可自由行动。”接着请蒋介石报告。蒋先按照一个稿子宣读，其中有：“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后来又离开讲稿，大声说：“三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收复失地，如果不收复，我蒋某人就亲自上前去堵炮眼。”说到这里，会场上有个军校的学生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不要言过其实吧！”顿时全场愕然，蒋介石怒不可遏地退到后台，会场哄乱起来，戴季陶在台上嘶声地喊：“出了叛徒！败类！把他抓出来！”当即有人捉住那个学生送到主席台。戴到后台把蒋请了出来，蒋抓起桌上一个玻璃杯摔个粉碎，跨步向前，打了那个军校学生两个耳光，狠狠地踢了两脚，命令他向孙中山总理像三鞠躬，就有人把那个人押走了，会议也就不欢而散。

九月二十四日，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成立大会由中央

大学经济系教授叶元龙任主席，中大学生袁其炯任记录。会上的基调是要求政府下令出兵抗日。

经过连日的上街宣传，九月二十八日，中大学生冒雨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那时，中央政治会议正在开会，得知学生来请愿，除了蒋介石外，全部都出来接见。还有人讲话，大意仍然是政府正在研究出兵抗日，大家要相信政府，要上下一致这一套。学生们很不满意，但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呼了一阵口号就列队往回走了。

队伍走过外交部时，有个同学喊了：“外交部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们要质询”。于是几十名同学涌进外交部，在部长办公室找到了外交部长王正廷，向他提出质询，发生激烈争议。王正廷态度傲慢。王明诚、吴有荣等同学怒打了王正廷。王的秘书把一瓶红墨水泼洒在王正廷的脸上身上，同学们以为打出了血，一放松，王正廷就跳出座位后面的窗户逃走了。在外面的同学大多数未涌进外交部，由汪楚宝（即汪季琦）同学把外交部的牌子摘了下来，摔在地下，站上去想踩断它。这时看到进入部内的同学纷纷出来，说已经打了王正廷，大家回去吧，同学们才杂乱地走回学校。

在几天之后，以上海来京同学为首，中大、金陵大学也有同学参加，到国民政府请愿。在上海同学到京的当天就在国民政府大门外竖立一杆，上悬铜钟一具，每天二十四小时派人轮流值班，不断地敲打铜钟，说是敲起警钟，要把国民政府敲醒，起来抗日。一、两天后就发起请愿，参加者约三千余人。在此落彼起的口号声中，上海同学派了几名代表进入国府二门以内办交涉，要求蒋介石出来答复群众的要求。过了很久，于右任出来，说是代表蒋介石接见大家，说国民政府一定下令出兵抗日，如果多少多少天内

还不出兵抗日，“你们在路上见到我，就打我好了。别人你们不认识，我于大胡子你们还不认识吗”？群众高呼要蒋介石亲自出来，纷纷叫于右任“滚下去”！于右任只得退了回去。又等了许久，听见由内而外的各层门岗一路喊“立正”之声，蒋介石终于不得不出来了。他站在一张桌子上，心神不定，语无伦次，一下叫“同胞们”，一下叫“同学们”，说抗日是政府的事，学生们应该回去安心读书。又说学生们应该相信政府一定会出兵抗日。学生们大声问：什么时候出兵？蒋说：三个月以内。学生们又高呼：“写下笔据，口说无凭！”蒋介石脸都涨紫了，站在桌上下不了台。群众拼命高呼：“写笔据！”“写笔据！”蒋介石终于由侍从扶下桌子，就在二门的警卫室里亲笔写了“三月以内，一定出兵”之类的签名笔据交给了上海同学的代表，同学们这才退出国府，纷纷离去。次日(或再次日)，上海来京请愿同学回上海。

这一阶段，学生运动主要形式是请愿。虽然激于义愤，打了王正廷，包围了蒋介石，逼他写下笔据，但主要还是请愿，想请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把希望寄托于国民政府。但学生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已经逐渐看出国民党几次答应一定出兵抗日是敷衍欺骗、是靠不住的。蒋介石幻想国际联盟出面裁决，来制止日本进一步侵略，而对已经丢掉的东北三省是不想再收复的。

在国民党当局方面，他们也感到欺骗搪塞维持不了几天。既然许了三个月出兵的愿，三个月以后不出兵，学生能答应吗？于是，他们采取由教授出面，用转移学生目标的办法来瓦解学生队伍。这时中大的何浩若被选出来担任这个角色，他挺身站出来了。

何浩若当时是中大经济系的教授，曾留学美国，先学军事，在西点军校毕业，以后又转学经济，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

未得重用，在中大教书。这次，他以左派爱国教授身份出现。在御用的学生会召开的一次学生大会上，何浩若主持了会议。他一登台就喊了口令：“全体起立！”大家都站了起来。他说：“我们为在艰难困苦中流血牺牲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烈士们默哀三分钟！”他一下子就掌握了会场的情绪。接下去他讲：政府正在研究、部署出兵抗日的大计，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呢？！仗是肯定要打了，仗打起来之后，不会限于东北几省，就是南京，日本兵也会打来的。光靠政府的军队是不够的，一定要全民皆兵。我们要从自己首先做起，我们要求政府派军事人才来对我们进行军事训练，要求给我们发枪。将来日本人打到南京，我们可以到城外去打游击。但是政府派人来进行军训，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派来的，我们不能坐等！我建议在进行军训以前，我们自己按照自愿原则组织起“十人团”，每十个人为一个“十人团”，可以练习爬山，野营和一些基本动作，将来打游击都有用。同学们，组织起来吧！游行请愿没有用，做点为日后打仗准备的实际锻炼要好得多。……”他这番话，当时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同学们纷纷议论，说：这才是主张抗日的进步教授呢！有人说：又热情，又有办法，是群众的领袖。会后，同学们马上就组织起十人团。汪楚宝也组织了土木系的同班同学夏行时（现全国政协委员）、严崇教（抗日战争中牺牲）、陈克诚（现为美籍华人、教授）等十人成立了一个十人团，曾在紫金山天堡城和清凉山两次野营，真的进行刻苦锻炼。全校最多时有四、五十个十人团。女生张萑英叫操跑步（张系英籍华人，当年是徐悲鸿学生），王枫等女生也组织起来了。

当时，汪楚宝已经参加了党，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参加者有

当时地下市委书记王善堂、市委组织部长吴春恒（也是中大学生）、中大支部书记杨晋豪和汪楚宝，大家分析形势，研究何浩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研究的结果，一致认为，自从何浩若提倡搞十人团以来，原来运动的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现在转向了，不但游行没有了，连上街宣传抗日的也极少了。大家忙着搞操练、搞野营，十个人一团，互不通气，各搞各的，甚至野营时有人搞偷营劫寨，弄得很不团结。学生抗日运动无形瓦解，国民党当局感到轻松，这究竟对谁有利呢？从而得出结论，何浩若的出台是国民党的阴谋——破坏学生运动的阴谋！于是，我们就停止了十人团的活动，别的同学也逐渐不搞十人团了。

十人团虽然停止了，可是十月八日国民党派了魏益三任中大军训负责人，由于同学不欢迎，改由何浩若任军训主任。来了许多教官，把学生编成五个营和两个独立连，开始军训。从中大开始，南京各大中学校都搞起了军训，称为学生义勇军。十一月一日，军训部颁发了义勇军训练办法。三日至五日派员到各校检阅。九日，各校义勇军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总检阅，参加的有中大等十九校五千余人，由杨治全主席报告检阅训练意义，训练总监部副总监周亚卫为首席检查官。国民党看到这个办法对付学生运动有效，在这个期间，训练总监招考了许多军事教官，派他们分赴上海、苏州、无锡各地，开展各大中学的军事训练。

在此期间，各校学生逐渐摆脱各自的御用学生会，成立了各校的抗日救国会，以后又成立了首都各校抗日救国会。这些抗日救国会虽然仍有御用学生会的头头参加并占多数，但地下党的学生党员和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掺入了这些组织，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杨晋豪、王枫、狄幽青（即狄超白）等同学都参加了中

大的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委员，成为骨干力量。十一月五日，全国学联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十六日，首都各校抗日救国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日本侵略军屈期不退之应付办法，并呼吁对平津防务要严加防范等。

这是运动的第二阶段。国民党当局利用军训控制住学生运动，使运动趋于平静冷落，而学生方面在积蓄力量，准备新的高潮。

十一月二十四日，各地学生联合到南京请愿。据当时报纸登载：上海各大中学生约三千人，暨南大学生四百余人，苏州九百六十余人，北平一百八十余人。实际上，以后如山东、徐州等地也有学生来京。各地学生这次再来南京，是因为蒋介石答应北上抗日的日期即将到期，所以集中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欢送蒋介石北上抗日大会，而且做了一些决议，如惩办张学良和通缉卷逃黑龙江省国款的万国宾；日军撤退以前反对国联调查团来华直接干涉；要求国民党中央敦促蒋介石即日北上抗日等。形势又紧张起来了。而且首都各校义勇军训练委员会开会议决：再派代表前往训练总监催发枪支，如不得要领，各校全体义勇军前往请求。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再次采取欺骗手段，一方面请中大教授出面发表告学生书，劝学生在严重时期不要互相责难，“应致力救国之知识准备，如现在之罢课废学，奔走请愿，非计之得”云云。另一方面，十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手书答复请愿学生，并进行欺骗，还发表了劝勉学生书，进行抚慰。于是这一次各地请愿的学生又离京返原地了。

十二月初，北平一批同学三百余人来到南京。他们这次不是来请愿，而是公开打着“南下示威团”的旗帜来示威的。五日上午，

这些同学手持红旗，高呼口号，由中大体育馆列队出发游行示威。他们的口号是：“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

“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沿途散发传单，在市民中起了很大的影响。当示威队伍走过成贤街浮桥的时候，突然被军警拦阻，逮捕了其中的一百八十五人，内有女生三十二人，其余同学折回中大。中大同学听到北京同学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鸣钟召开大会。大会由御用学生会主席骆继常主持。会上群情激昂，讨论如何营救北平同学，各种意见都有，甚至有人提出朱家骅（当时中大校长）是中央党部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去找朱家骅，要他负责释放北平同学，如果他不答应，我们就放火烧他的房子等等。大会主席骆继常仓惶失措，不知所措。汪楚宝站在凳子上高呼：“北平同学由于示威而被捕，我们应该继续举行示威”，大家轰然响应。骆继常更加骇怕，用别的话支吾。群众要求把汪楚宝的建议付表决，骆继常仍然支吾打岔。会场上爆发了“骆继常滚下来”的吼声，骆继常趁势就走下主席台，溜出了会场。群众又喊：“汪楚宝上去，主持大会！”汪楚宝走上主席台后，立即将继续示威的提案付之表决，全场一致通过。于是一方面到操场集合队伍，一方面派代表去校长室取校旗。中大的秘书长郭心崧制止同学取校旗，被愤怒的同学打伤。同学取得了校旗后，就列队出发。

由于传闻北平示威同学是首都卫戍司令部派人抓的，中大的示威队伍就径向首都卫戍司令部进发。示威队伍中女同学只有十几位，如王枫、胡济邦等。在进发途中，汪楚宝见到常纶同学走过来，就低声告诉他：“你入党的请求已经组织讨论通过，要我正式通知你”。这就是说，在示威途中，我们还发展了一名党员。

队伍到了卫戍司令部，口号此落彼起，市民围观的很多，声势更加壮大。卫戍司令部赶紧关闭大门，还没有来得及关紧，同学们一拥而上，推挤大门，双方相持约有二十分钟，终于因同学人数多，大门被推开了。在推门时，女同学中有几位很英勇地站在最前面。队伍拥进大门以后，院子里已架起了两挺机枪，许多士兵保卫着二门。领队人员请同学们就地坐下，大家就紧对着机关枪口坐在地下，高呼“立即释放北平示威同学”等口号。一个低级军官出来说：现在已经下班，负责人都不在，请你们先回去吧。大家口号声喊得更加激昂。过了许久，大概是他们打了电话，把比较负责的人找来，由旁门进入了卫戍司令部，就派人出来说：请你们推选代表进去商量。我们当即派了几名代表进去，半个多钟头仍不见代表出来，于是纷传代表们被扣押了。队伍中立即派出几批同学，一部分回中大动员没有出来的男女同学前来支援，一部分分赴金大和各中学动员支援。虽然时间已近夜晚，支援队伍还是一批一批地飞奔前来。许多市民送来了烧饼、馒头、包子来慰问同学，有的也坐在地下，和我们一起喊口号。

后来，代表们出来了。卫戍司令部的秘书长一同出来，并向同学们解释：“北平学生确实不是我们逮捕的，也没有关押在这里。他们是由军校的学生拘押在孝陵卫军校里看管起来。我们已向上峰请示，明天上午一定把北平学生全部释放，决不欺骗你们。”代表们也报告：“经过交涉，他们打电话请示上级，同意明天上午释放。现在已经很晚了，同学们可以回去，明天如果不放人，我们明天再来！”这样，同学们很有秩序地列队回校。第二天上午，北平学生果然被释放，回到中大体育馆住处。

事后，朱家骅因学生殴打了学校秘书长郭心崧和学生冲击了

卫戍司令部而引咎辞去校长职务。

在学生方面，经过十二月五日事件，更加看透了国民党的反动性，斗志普遍高涨起来。王枫、汪楚宝等都被选入南京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汪楚宝被推为主席。另外，北平陆续有学生南下。上海学生以交大的许邦和、乔魁贤等（均地下党员）为首以及张会源、袁轶群等，又大批来到南京。山东的济南和曲阜也有学生来京。声势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胆战心惊。

南京地下市委研究新的情况时，书记王善堂对汪楚宝说，你当了示威游行的总指挥，又当了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国民党会马上逮捕你。白天和群众在一起，不怕。夜里你要当心，最好不要住在宿舍里，另外找个地方睡觉。这样，汪楚宝就在化工系助教杨允植在校外租的一间小屋里住了三夜，白天仍去救国联合会开会（地址即在中大南高院对面的平房里）。

国民党怕学生运动事态扩大，指使中大贴出布告：奉令提前放寒假。同学为了打破这个阴谋，召开了学生大会，议决全体同学赴教育部质询提前放寒假理由，通电全国各校一致反对提前放假，请本校教授在罢课期间切勿离校并负责维护校务。赴教育部代表推出主席团（王枫被推为主席团之一）进入交涉，由高教司司长孙本文接见（孙当时兼任中大社会系主任，王枫是社会学系学生）。孙说了许多敷衍的话，就是不肯收回提前放假的命令，说：

“已发命令，不能收回。”最后他推称上厕所溜走，激起学生的更大的愤怒。王枫又找到总务司司长姜绍谟，姜对王枫说：我和你哥哥（指王昆仑）是多年的好朋友，你怎么带头来闹事！王枫义正词严地斥责他：你们命令提前放寒假，是破坏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如果你们坚持不肯收回命令，同学们打了进来，是不会客

气的！这时，外边同学大声呼口号：“反对教育部提前放寒假！”

“不收回命令决不罢休！”姜某吓得面无人色，只得代部发令，收回成命。事后，孙本文和姜绍谟都被撤职，而当局“提前放假”的阴谋，也就成为泡影。

这次事件之后，市委书记王善堂通知汪楚宝暂时离开南京一段时间为好，并说：上海同学来了不少，但沪宁沿线苏州、无锡、常州各地中学还在上课，你去各地动员他们支援南京的学生运动。汪即去苏州等地，在汪离开南京期间，发生了“一二·一七”惨案。

十二月十七日，各地在京学生举行联合大示威。出发前在校内列队时，纠察队员夏行时同学发现一个行迹可疑的人，当即揪住。此人从鞋内拿出若干钞票，请代为通知某处某号（实即陈立夫公馆），为夏行时严辞斥责，并把他送到南高院三楼关押起来。所以当时曾谣传：抓到陈立夫了，其实是陈立夫派来的特务。

示威队伍列队出发，各地学生共有五千余人，由纠察队维持秩序，声势浩大，秩序井然。大队先到了家桥中央党部示威，中央党部已将铁栅门紧闭，持枪军警密布门内，大门两侧低矮围墙里面也布满持枪装上刺刀的军警，防止学生爬墙入内。同学们不能入内，遂在门外高呼口号。王枫看见吴春恒用石头打碎了门两边柱上的大灯，并在柱子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标语；一部分同学用砖石将党部大门所缀党徽以及传达室、警卫室的玻璃窗打毁。相持约一小时，学生始整队离开。示威队伍走过珍珠桥《中央日报》馆门口时，群众因《中央日报》连日登载歪曲诬蔑学生救国运动文章，上海交大学生许邦和、张会源等愤怒地捣毁报馆的牌匾，二百余人冲进了报馆大门，有人

砸坏了印刷机，有的把铅字盘的铅字倒在附近的河里，有中大同学蒋洁将铅字分送同学。第一批动手的有几十人已经出来，第二批学生又冲了进去。这时，突然有一队手持上好刺刀的军队跑步向学生队伍冲来，在报馆内来不及出来的同学均被殴打拘捕。在持枪部队一片杀声下，学生队伍被冲散了。大部分同学避入附近商店、民宅，王枫避入一家木器作坊的后院，后逃至成贤街，偶遇王昆仑乘小汽车经过，把她掩护救走。上海文生氏英文专修学校学生杨同恒打伤后被推入珍珠桥河内淹死。同学们把尸体打捞起来，抬回中大，停灵中大体育馆。

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一二·一七”惨案。

次日天还未明，国民党调动了大批军队包围了中央大学，四面架起机枪，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校内，分批将外地同学押到下关车站，用专车押送回籍。山东同学人数少，两个士兵挟持一个学生押到车站。上海同学多，每四人一行，每隔三行插入军队一行，一路进行到车站。这些专车经过的中途车站都实行戒严，车站内除了持枪军警外，没有一个旅客，甚至连铁路的工作人员也都勒令离开。

十九日，国民政府通令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同日，中央大学宣布放假，汪楚宝知道“一二·一七”惨案赶回南京时，大部分同学已经离校回家了。至此，运动转入低潮。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大开学，王枫、汪楚宝随同学均回至学校。那时，安徽太和县委书记顾衡正派葛春霖来找南京市委，汇报太和准备暴动情况，计划于暴动成功后，拉出队伍到农村打游击。邻县阜阳已有党的组织，可以呼应，希望南京能派干部去蒙城建立据点，将来打游击时成犄角之势，可以有回旋余地。王善堂

就派汪楚宝和潘滨两人同去蒙城，与太和、阜阳建立。系联因此汪即离开南京。

朱家骅辞去中大校长后，晋升为教育部长，他派了教育部的政务次长段锡朋任中大校长。段锡朋到任的那一天，一下汽车，就被同学看见，反对他来接任校长。当时，王枫正挟着讲义走过校长办公室所在的南高院，看见以工学院同学为主的许多同学正在殴打段锡朋，段的灰绸大褂甩在电线杆上，段穿着白色对襟小褂狼狈逃出校便门，他的汽车早被捣毁。教育部就命令解散中大，全体学生经过甄别以后，才能考虑重新开学。中大既无校长，临时由文、理、法、教、农、工六院院长联席会议主持校务。朱家骅开了一份开除学生的名单，有三页之多。院长联席会议由首席院——文学院院长汪东主持，他不同意开除这么多学生，讨论结果，采取折衷办法：名列第一页的学生开除，第二页上的学生写悔过书可以留校，第三页上的学生记过一次。王枫是第二页上的第一名，坚决不同意写悔过书，说：“爱国无罪，何过可悔！”一天，王枫走过大操场，遇见工学院院长顾毓琇，顾是王的表兄，劝王马上去家乡无锡，并说晚上可住他家。王知道这是要逮捕同学的暗示，当即通知了胡济邦。当晚宪兵司令部果然派人到女生宿舍抓王、胡两人，未能得逞。男生宿舍有陈克诚等同学被捕去了。以后王枫在曹孟君家里化装逃至上海。这已是“九·一八”学生爱国运动的尾声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

静斋风暴

——记清华静斋“一二·九”部分参加者的回忆

张 仲 碧 整 理

这里记述的，仅是当年她们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些方面，而不是她们活动的全部。

从 静 斋 说 起

静斋是当年清华大学的女生宿舍。一九三五年，清华有女生约一百零八人，都住在这里。

它是一座三层楼房。正面对门有一片小树林，苍松翠柏，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它的背后有一湾池塘，荷叶覆盖着水面，夏天朵朵荷花散发出阵阵清香。女同学晚饭后到三楼顶上的大平台散步，眺望一下清华园的夜景，真是美极了。

然而一九三五年的秋夜，清华园却被罩上了一层阴云。夜晚，再到平台上举目望去，园内的生物馆、化学馆、稍远一点的科学馆……一反常态，灯火通明。“咣、咣、咣”沉重的铁锤钉木

箱的声音，分外清楚，难道学校当局，真的要奉命搬迁？面对这种情景，静斋的爱国志士，焦虑不安。美丽庄严的清华学府，决不能这样被抛弃！

学校虽照常上课，维持表面的平静，但是爱国青年的心是关不住的。眼见汉奸殷汝耕于近在咫尺的通县，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天津的汉奸公然上街游行，要求华北五省“独立”……。什么“自治”、“独立”？说穿了，就是华北继东北之后，公开归降日本罢了。而国民党政府却严禁人民的抗日活动，甚至不许报刊上出现“抗日”字样，还极力适应日寇的需要，拼凑“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委员长。

……

北平爱国青年、清华园的爱国青年、静斋的爱国女青年热血沸腾，再也不能忍受祖国的大好河山任人宰割！

北平的爱国青年，不只是愤慨和发表宣言，而且组织进步的秘密小团体，筹备各校学生联合的组织、酝酿、计划实际行动的那一天。

终于，清华学生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十二月九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了。

“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静斋的爱国志士，都主动接受北平学联的号召，和男同学一起走上大街，走在队伍的前列，激愤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喊出了全民族的共同心声。

在这两次大的游行示威中，年轻的爱国志士们，机智顽强、英勇不屈。当时誉满学生界的，是静斋的陆瑾，她不仅有鼓动人心的演讲口才，而且在关键时刻能勇敢地冲在前面。“一二·九”游行时，清华、燕大等城外的队伍受阻了，不能前进，是她站在高处，拿着话筒讲话，鼓舞同学们继续斗争；“一二·一六”清华的队伍行进到宣武门，城门又是紧闭。走在队伍前面的学生发现城门底下没有门槛，有一段空隙，陆瑾毅然从空隙中钻了进去，她站起身来拔掉门上横着的铁闩，一边用力拉那沉重的大门，一面高喊：“快冲！快往里冲啊……”喊声未尽，却被反动军警抓住了。她遭受军警的拳打脚踢，却不低头。后被游行队伍营救出来。

“一二·九”的号角，响遍全国。

后来，陆瑾受北平学联的委派，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并成为中国学联的领导人之一。

十六个人名单的事件

当时清华学生中分为两派：左派学生反蒋抗日，并逐渐团结了多数学生。右派学生拥蒋反共，两派斗争激烈。对立面人数虽不多，几个为首的却十分活跃，其中一个是在静斋的女生，也曾风云一时——暂称她“某女士”。十六个人的名单卡片正是从她的桌上发现的。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一九三六年二月的一天，静斋李孝芳无意中发现她的同房间“某女士”的书桌上放着一张卡片，上面绘着静斋住室平面图，标出十六个女同学的姓名和寝室。小李一看，十六人大都是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韦毓梅（孙兰）、陆

璿、魏蕻一（韦君宜）、纪毓秀、吴瀚、高景芝、郭见恩（郭建）、王作民、王次蘅、戴中宸（黄葳）、张厚英（张自清）、黄绍湘、鲁心真、许留芬、李立睿等等。李孝芳心里疑惑起来，这难道是“黑名单”？

她立刻去找她所信赖的韦毓梅，韦毓梅拿着卡片思索了一阵，骑车到二院找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她回来后找了几个女同学开会说：应当把此事公布于众，免得被动挨打。这时有人提出：“要是‘某女士’赖帐，硬不承认卡片是她的呢？”而且“万一不是她弄的，岂不冤枉了她？”

“问题提得好！”韦毓梅冷静地说。“要摸到真实情况，要迅速准确。”

怎样搞清情况呢？有人提出，利用静斋的“流通图书馆”来澄清这件事。“流通图书馆”是韦毓梅发动女同学举办的，大家拿出自己爱读的文学作品《死魂灵》、《饥饿》、《铁流》、《象牙之塔》、《莫斯科印象记》等等，以及政治、经济各种书籍几百本，很受女同学欢迎。它的一切保管、出借、开馆、闭馆都是静斋中积极分子做的。现在要利用它来查清“黑名单”，也就是通过一系列“出借”、“归还”、“再出借”等登记手续，把那张卡片从李孝芳屋里“无意中”流传到有关系的人手上，并在中午寝室人多之际，把“卡片”公开宣扬开来……

方案既定，一到中午，卡片上有名字的戴中宸拿着她从“流通图书馆”借的书去打听该书是谁归还的。一查是李孝芳。戴又转而去问李：“这张夹在书里的卡片是你的吗？”她们在李的房门外一问一答，“刚巧”郭见恩从这里经过，一看卡片，她的名字赫然在上。“谁搞的？搞什么名堂？”她大声责问起来，她那

咄咄逼人的言词引得午休的女同学闻声出来，只听见李孝芳在道歉：“卡片是我同屋同学的，我不注意当书签了……”这时“某女士”也闻声推门出来，一见这场面，伸手就来抢卡片，一边说：“快还我，是我的！”好了，她当众承认了。

在静斋另一间寝室里，好几个同学在写的写、抄的抄，一下子写出一大批“启事”，并立即张贴在清华园各处墙上。其中有李孝芳的“道歉”启事，是她向同寝室那位同学公开道歉的；有名单上十六人“要求学校当局保护人身安全”的启事；还有十六人邀请全校师生参观这张卡片的启事。韦毓梅还组织人把这张卡片装在镜框里，在严密守卫下，把镜框挂在静斋大门口展出。

霎时间，清华园内出现了许多“启事”，静斋门口人群川流不息。同时，名单上的十六人又三三两两轮流到校长办公室和家里请求保护……。闹得清华园尽人皆知。

静斋吹响了反逮捕的号角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是恐怖的一月。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都有大批学生相继被捕。

“黑名单”事件不久——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清晨天还未亮，张厚英已经起床温课，因为要补行长期罢课后的大考。她听到窗前一阵阵“嚓嚓”的急促脚步声，赶快关上灯向窗外一看，黑压压一大群穿着黑衣服的警察，正在包围静斋，原来他们来捕人了。

必须以尽快的速度把人们唤醒，离开住室。张厚英机智地唤醒了女生舍监，警察已到门口。这位同情学生的舍监——蒋恩钿，立即迎上前去。她平静而尊严地宣布：“清华校规，楼上住女

生，任何男性不准上楼，警察也不能例外”。

警长没提防这一着，楞了一下，只好打电话到城里叫派女警察前来。

这样赢得了短短的时间，楼上的学运骨干、积极分子，赶快准备，把有关材料烧的烧，藏的藏；有的准备被捕坐牢。

二月的黎明，门外奇寒，包围静斋的军警很快支持不住了，都挤在一楼楼道里，有的坐在楼梯口的台阶上。这时天已大亮了，楼上的女同学们在楼梯口上喊：

“让我们下楼吃饭，我们要考试”。

“你们这些学生，有福不享，住这样好的楼，还闹事。”警察在楼下喊。

“谁闹事？我们要抗日！你们也是中国人，你们就甘心当亡国奴吗？有良心的抓汉奸去，不抓爱国学生！”女同学们理直气壮地讲道理。

突然人们从窗口发现，大队男同学浩浩荡荡朝静斋奔来。女同学们一声“冲啊！”随着喊声，冲下楼梯，冲出大门，正好和男同学大队汇合，接着就向西校门奔去。蒋南翔被军警抓住带到西校门传达室，姚克广（姚依林）由城里回来也被扣在这里，清华学生纠察队队长方左英也被捕了；之前，一个烧锅炉的工人也被抓住。

军警抓人的暴行，激怒了广大师生，连那些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学生、教师也被激怒了！他们说：“堂堂高等学府，怎能容忍军警如此无理。”

在民先队员的带动下，几乎全校同学都来营救被捕的同学。同学们用木棍、石头、军训枪同军警搏斗。大家看到军警想把蒋

南翔、姚克广、方左英三人往汽车上推，准备带走，便一拥而上，奋力把他们夺了回来。另外一些同学，早把军警的汽车砸毁，卸去关键部件，汽车变成乌龟壳似的扒在地上，动弹不得了。

下午，海淀区警察分局局长舒某来找校长，同学们扣留了他，用他换回了被抓去的工友。反动派抓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二·二九”清华同学抵抗了军警一整天。

这天傍晚，清华党组织接到通知，反动派晚上要出动军警到清华来。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赤手空拳的学生要赶紧疏散，做好一切应急准备！他们切断电源，熄灭所有灯火，隐蔽起来。夜晚，五千军警开进了清华，内有机枪连。清华园一片漆黑，找不到学生的踪影。

在这恐怖之夜、生死关头，清华园出现了使人难忘的情景：一面是反动军警搜查、逮捕爱国学生，一面是正义的教职员工掩护学运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静斋的工友于国成——一位普普通通的人，他主动找静斋的吴瀚，要求替大家把书刊收藏起来；中文系主任兼清华图书馆馆长朱自清教授，热情接待韦毓梅带去的七个女同学。他喃喃地说：“真不象话，真不象话！”一边又替大家出主意：“万一他们到我这里搜查，你们就说是城里来的客人，打桥牌迟了，今夜不回城了。”这晚上，郭见恩、王作民、王次衡、吴瀚、戴中宸、张厚英、黄绍湘和其他许多同学，都得到教师们的掩护，有的钻进实验室，有的躲进工字厅的讲师、教员宿舍，有的藏在大图书馆。陆瑾藏在清华小学……直到拂晓时，军警才发现在新体育馆房顶上有瞭望的同学，于是他们开进体育馆，只见男女学生，静悄悄地席地而坐。这是他们为了掩护积极分子，集中坐在那里的。军警认不出要抓的人，只好胡

乱抓了二十几个同学，五花大绑地把他们带走了。而他们“黑名单”上的人，早已避开，一个也没被抓到。

这次英勇机智的“二·二九”反逮捕斗争，冲破了一个月来的白色恐怖，大大增强了北平各校学生反逮捕斗争的信心，也推动了清华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三·三一”的启示

相隔仅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抬棺游行，是继“一二·九”、“一二·一六”后北平学联发动的第三次大示威。静斋的爱国志士三十日晚得到通知。她们担心象前两次那样被关在城外，当晚就各自进城投宿，次日清晨赶赴北大三院参加郭清追悼会。郭清是北平河北中学学生，因参加爱国运动被捕，年方十七岁，受尽酷刑，于三月九日惨死狱中。为抗议国民党法西斯暴行，三月三十一日，北平各校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一千三百多人，在北大三院举行郭清追悼会，会后静斋的积极分子就跟随抬着空棺材的杨学诚等清华的男同学们，走在队伍的前列，上了大街。

走到街上，队伍已发展到三千多人。游行队伍走到南池子，突然遭到埋伏在那里的军警的袭击。他们挥舞皮鞭、棍棒、枪托，向赤手空拳的学生打来。把学生队伍打散后，就动手抓人。这时王次衡、吴瀚、王作民向南走出了重围。

郭见恩、邵景渊、何玉珍和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一位学运骨干李奇一起向北走，当即被拦截。正当她们被带走时，李奇猛然栽倒，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军警一阵乱。邵景渊趁乱脱身了。李奇仍躺在地上不动，郭见恩和军警展开了一场舌战。

郭：人都快病死了，让我找车送医院。

警：你们认识吗？

郭：不认识，也不能见死不救！

警：你们为郭清，值得吗？

郭：郭清才十七岁，一个爱国中学生，他没有罪！

警：你们为什么要打倒宋哲元？

郭：谁抗战，我们就拥护！坚决拥护二十九军抵抗日本侵略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你也是中国人啊，怎么不去打日本人，却来抓爱国学生？你愿当亡国奴！？

警：……

警察被问得哑口无言，答应何玉珍去找人力车，郭见恩在守着李奇。但走不多远，何玉珍被另一批军警抓走了。同情学生的市民，找来一辆人力车，郭见恩把李奇护送到女子文理学院。刚一到达，李奇突然跳下车来，大声说：“呸！我没有病，是假装的！”她这突如其来的动作，一下子把大家逗笑了。

这次游行，被反动派捕走五十多人。其中清华的学生十七名，十七人中有静斋的张厚英、何玉珍、赵芳瑛、徐驊宝四位女同学。

脱险的同学回到静斋。她们定下心来在观察、思考问题。

这次反动派好象是随手抓人，可仔细一看，抓的全是运动中的骨干，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参加这次游行的男女同学，都是学运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中间群众几乎没有动，前两次游行是要求抗日，反对成立汉奸政权，是广大同学的共同呼声，而这次与前有所不同……

此时，清华的抗日救亡运动处于艰苦的境地。

这年四月，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北平，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及时总结了“三·三一”这次行动是脱离广大群众的，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出“左”倾冒险主义是党的重要危险，并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还纠正了学联“无限期罢课”的决议。

七月间，彭真同志在清华学生宿舍平斋四百二十八室住了一周多。他是来建立北平市学委会的，同时向有关同志阐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并在党内、团内、民先队员中开展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教育。使党员和先进爱国志士理解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

经过艰苦、深入的各种形式的群众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逐渐深入人心。静斋的积极分子也深受教育，懂得了要想方设法做争取人的工作，懂得了抗日救亡运动人越多越好。

广泛团结群众

静斋的壁报一度冷冷清清，读者寥寥。如何办才好呢？“搞个墙报比赛吧！”王作民提出了建议。墙报仅是一种宣传形式，目的是通过“墙报比赛”把大家都发动和团结起来。

比赛，要有奖呀！

于是，她们把心爱的小摆饰、小玩意儿捐献出来，做为墙报比赛获奖者的奖品。

头奖奖品：一个竹根雕刻的古装美人，婷婷玉立，典雅喜人；

二奖奖品：一个弹着吉它的西洋女子，金发碧眼，红衫白

裤，婀娜风流……这些逗人喜爱的“奖品”在玻璃厨陈列、公布后，立刻有十多人报名参加比赛。经过抽签，决定一人主编一期。主编者积极组稿，尤其已露写作才华魏蕤一的稿件，谁都想“抢”到手，王作民、赵芳瑛等当然也是竞赛者的约稿对象。

参加竞赛的主编们好胜心强，力求把自己主办的一期打扮得吸引读者。那真是花团锦簇，百花竞放。评奖那天，连男同学都纷纷赶来，在票箱里投下一票又一票。比赛结果：高棣华同学获头等奖，竹雕的古装美人儿被她得去了。

还有成立女同学会——这是党布置的任务。要求把左的色彩很浓的妇教会罩上一层淡淡的外衣，使她变得温和一些。怎样把女同学找来呢？有人提出了：组织“中秋赏月”会，这样可以吸引一些同学参加！于是，大家自己掏钱买月饼，还写出一张大字布告：今儿晚九点钟，大伙儿赏月亮，吃月饼。晚上不到九时，女同学们三三两两来到了平台。有的哼着《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有的漫声交谈，有的细嚼慢咽……好一派佳节气氛！

“我们成立个女同学会好不好？我们女同学也要组织起来！”当大家兴味正浓的时候，一位同学提了出来。

“好”！“好”！四面响应。就这样把女同学会成立起来了，还选出邵景渊为主席。后来女同学会举办了不少活动。有一次，北大女同学会举办郊游，到清华来玩，由清华女同学会接待。女同学会举行了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李孝芳饰演女主角，荣千祥（荣高棠）饰演男主角。玩了一天，尽兴而归。

静斋的女同学和男同学合办的群众活动也相继出现。由傅国虎主持的“海燕歌咏团”，别具一格地聘请了两位中间立场的同学参加，女弹钢琴，男任指挥。经过这样的“艺术处理”，参加者

踊跃。静斋的女同学对“海燕”非常热心。清华园里“海燕向上，海燕抵抗……”的歌声，此起彼伏。

引人注目的是清华剧团聘请了热心的闻一多教授任导演，也聘请不太热心、而多才多艺的顾毓琇博士参加。剧团上演剧作家田汉的《回春之曲》时，需要一位漂亮的女生担任女主角。王作民便热情地动员静斋读生物系的许如琛担当，她毅然答应了。男主角由“海燕歌咏团”团长傅国虎担任，他的歌声相当动听。

演出前，贴出海报。导演、男女演员的名字都写上，特别写上“客串演员”许如琛任女主角……。这台戏搭配得可谓“珠联璧合”，未演出就轰动起来。演出时，清华大礼堂座无虚席。

学生中的各种活动，真象雨后春笋一般。年轻的大学生们，既有抗日救国的崇高热情，又有专心致志的具体专业。戴中宸、张厚英和男同学章宏道（章文晋）、胡光世等一起举办的“实用科学研究会”，有无线电组、防化组、救护组，还办了一个刊物。通过这些活动，更多的理工科同学和老师也团结、活跃起来……

通过一系列生动活泼的群众工作，清华园的抗日救亡的队伍日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日益发展。

到群众中去宣传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平学生又一次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这次示威与往常不同，当时驻扎在北平的二十九军也成了学生的统战工作对象，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向示威学生表示愿意抗日。这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和学生运动方针正确的必然结果。

民先队员们展开了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广泛的行动。开展了

慰问二十九军和参加二十九军的演习活动，并向士兵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有些角落、有些群众，尤其适合女同学去工作。静斋的民先队员争先恐后，选择工作地点和对象。

张厚英、戴中宸、陈舜瑶、彭克瑾等同学，自告奋勇到八家村教妇女识字班和清河毛织厂的识字班，教识字的同时，进行宣传抗日救亡和发动群众。当年清华园的四周全是农村，住的还有平绥路清华园站的铁路工人。他们的子女渴望上学，但是上不起学校，所以孩子们都赶到八家村的识字班来学习。

至于设在清华三院的清华学生会的民众学校，在高景芝校长的主持下，在这里任教的吴瀚、王次蘅、黄绍湘等，早已进行了抗日救亡宣传。这里的学生，后来不少成为救亡的积极分子。

被称为“小孩王”的吴瀚，还进行学生家访，发现有些工人的女孩子不能出来学习，她和王次蘅、黄绍湘又组织了清华洗衣工人的女孩子学习……。

七·七芦沟桥事变时，四位任教的同学也已毕业要走了。她们的学生赶绣了四个枕套送给老师。枕套上绣着四只高飞的大鸟，后面跟着四只恋恋不舍的小鸟展翅飞翔着。用拼音文字绣上“前程万里，继续前进。”这些学生中的郑健涛后来被发展入党，并带着她的伙伴们前进。

攻读外国文学的王作民。找到兰靛厂燕京大学教授夫人办的挑花厂做为工作的地点。她每周到这里来教女工识字，宣传抗日、教唱歌曲。而教授夫人却来教唱赞美诗，赞美上帝。

北平的冬天，风雪漫漫。王作民独自推着自行车，走在乡村的田埂上。雪花飘落在他身上，冰屑打湿他的鞋袜……可是当她

听到在女工中用她教唱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代替了教授夫人所教的赞美诗时，她感到风吹雪打又算得了什么呢！

怀 念 先 烈

如今，老战士们都两鬓染霜，她们回忆当年，静斋几位先烈的面影，映入她们的眼睑。她们深情而庄重地谈起阿平——韦毓梅，她沉着稳当，善于思考，善于联系同学。她担负着领导工作，却以一个普通学生的模样出现。她很会讲话，却从不在大会上发言，……她默默地工作着。

她组织魏素一、许留芬、王作民、鲁心贞、李立睿六位女同学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她领导小组学习。读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领导她们开时事讨论会，布置工作……后来她还请蒋南翔来参加这个小组的学习会。这个小组就是静斋的“民族武装自卫小组”。

韦毓梅还在静斋组织公开的时事讨论会，发动同学成立“流通图书馆”……

在许多艰苦细微的群众工作中，韦毓梅悄悄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学们称她为静斋的一颗革命火种，真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一九三六年夏天，她毕业了，回到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解放战争时，她在苏北淮安县担任县长工作；解放后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韦毓梅毕业走后，纪毓秀已经成长为清华园内“民先大队”的大队长了。

纪毓秀，一九三五年秋天抱着读书救国的宏愿来到北平，考取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学习。那时她是多么想好好读书啊！

可是当时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许多爱国青年都为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存亡在担忧、在着急、在奔波。纪毓秀坐不住了。

纪毓秀来清华后才三个多月，便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游行示威运动。在这两次行动中，她表现得顽强机智。

就在这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纪毓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担任过纠察队员、宣传队员、纠察队长，还担任过清华学生自治会的委员，是女同学中优秀的骨干之一，是一位深受同学爱戴的学生干部。

她很有组织才能，善于带领同学一起工作。

纪毓秀家中只有一位老母，老人一辈子盼望这个独生女学有所成就，而她为了革命毅然中断学业，于一九三六年底，在“绥绥”运动中，奔赴绥远前线。后来，到太原参加牺盟会的工作，并担任牺盟会的常委。由于环境的极端艰苦，和工作的过度劳累，她一九三九年病逝于抗日前线。

高景芝，这位东北的流亡学生，她热情、坚定，富于创造精神。一九三六年她已是共产党员了，在清华园她担任设在清华三院的清华学生会办的民众学校校长。她毕业后到上海培明女子中学任训育主任；到江西弋阳县办妇救会，敢于把进步文章登在她所主办的刊物上；又到国统区——桂林搞生活教育社；后来到了新四军……。解放后，作为全国青联的代表，参加过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后又当选为“八大”代表。

不幸的是，她也在十年“内乱”中被迫害致死。

老同志们惋惜、甚至心酸地呼唤着先烈们的名字说：如果她们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该有多好！

（根据郭建、黄藏、吴瀚、张自清、王作民同志提供的材料和其它资料）

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军分校

周 见 非

一、武汉分校的时代背景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由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国民政府随即迁至武汉。为革命需要，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和训练，多由共产党人主持。鉴于黄埔军校学生思想不统一，招考新生，特别慎重。后黄埔军校也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作为分校，新招的学生定为六期。分校教育长是张治中，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总教官恽代英。现将回忆当年我亲身经历的情景，分述于后。

二、招收新生

一九二六年，我到重庆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一进城就觉重庆气象一新，革命浪涛已使军阀统治下死气沉沉的山城翻腾起来了，满街贴有红色大标语，人山人海在街上游行，群众高呼“拥护莲花池省党部”，“拥护国民政府”，“拥护爱国军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我住在同乡同学的校舍里，

一问才知道国民党员中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石青阳等在重庆总土地另自成立一个省党部。还有国家主义派在重庆也很活跃。但他们在革命群众斗争之下都抬不起头来。我报考是在莲花池省党部由杨圃公主持成立的招生委员会，听说有三千多人报考，其中有不少的大学生、中学教员、军官等。考试结果，只收三百人，由武汉派来的招生主任陈维中率领东下。我一上船看见全是一批青年小伙子，还有女生多人。船开动了，男女同学无不心情舒畅，好像久经浑水呛得奄奄一息的鱼儿，突然游到清水塘中一样地快活，特别是女娃儿们，在封建社会里没有地位，她们打破了封建囚笼，投考军校，参加革命。从来就没有军事学校招过女生的，她们都以花木兰自比。当天船宿万县，同学们打扫了船顶的烟花，举行同乐会，胡兰畦、赵一曼等女同学唱歌跳舞，男同学也参加许多节目，“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却有无比欢乐。在船上除认识本组同学外，组外也认识肖天云、罗瑞卿等不少的人，女的有曹泽芝、赵一曼、胡兰畦、周开璧、陈德云等。到了武昌，分住在斗笠营旅馆，原在武昌的同学和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同乡纷纷前来看望，听他们谈北伐的经过，增加我们不少的见识。我们住在旅馆，学校突然通知还要举行复试，大家紧张起来了。复试下来，落榜一百五十人，落榜的发给路费回川。进学校后，有的同学私下告诉我，“这次招生非共产党员、团员、和真正的左派不收，船上都有人暗中考查”。

三、严肃、紧张、团结、活泼的学校生活

武汉分校的校址，在武昌城外两湖书院，一进大门，走过中堂，迎面一片碧绿的湖水，湖畔垂柳成行，行柳和长廊从左右围

绕到湖的顶端，连结正中一排大礼堂，成一个O字形。长廊的背后，是一列列的红砖楼房。进大门左面是大操场。学校教育长张治中，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总教官恽代英，总队长杨慕松，我们的大队长陈匡济，队长王锡钧。编队后，名虽照黄埔规定入伍期三个月，实际就是升学的待遇，不服任何勤务，加紧训练。每天早晨起床，跑步进武昌城，不许掉队，跑完长街，折回时唱歌，唱的是《国际歌》、《工农兵歌》、《少年先锋歌》、《打倒列强》等歌曲，歌声把睡梦的武昌城都唤醒了。出城再跑回南湖，来回二十余里，这是初步的身体锻炼。早餐后，又进行紧张的操课，进度很快。军事课程，讲了就实习。如射击一科，先从物理讲起，包括弹道、气候、光线和瞄准方法，接着进行三角架瞄准，周末举行打靶。不久的时间，把野外勤务、地形识别、测绘、阵中要务、战术都学了。政治课程：恽代英聘来的教官，都是有名的教授和对社会科学有专长的人，如像陈启修亦名陈豹隐教经济学，他是不发讲义的。他在台上讲，学生笔记下来，就是一篇有条不紊的讲义。当时他讲的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批判亚当斯密氏经济学的谬误。训导方面，恽代英采取从思想教育入手，使学生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从不强制、压服，差不多每周都要讲话。他的姿态、声调、内容，给我的印象很深，事隔五十几年，记忆犹新。他教导学生，先从道理说起，加以生动而幽默的措词，使犯错误的人乐于接受，改正错误，同时也教育了大家。经过他的训导，同学提高了认识。有时他也参加小组会议，除讨论问题之外，特别注重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最能使学生思想统一，团结一致。学生生活虽然在严肃紧张中，思想仍然是活泼的，在军事上要服从，政治上是平等的，如有意见，不管是谁都要提。如像有次第

三国际青年代表团来校参观，学校聚餐，大概是照国际礼仪，用奏乐来增加欢乐气氛，有一位同学看见，向校部提意见，“你们吃饭，要别人奏乐，这是什么阶级的生活方式？”又如有次我们队早餐后站队解散，有个同学站在后排，手里捏着两个馍馍，留着饿了再吃，被队长王锡钧发现了，认为站队不严肃，夺过馍馍，往地上一扔。小组会上有人提意见，“王队长纠正学生错误是对的，扔馍馍有错，这是工农的血汗呀！”王队长当面接受。

四、意外的反动事件

黄埔五期政治科和工炮科，共三个大队，是由广东开来武汉合校的，听说其中大多数思想是好的，也有共产党员，但仍有少数不纯份子。一天，全校整队过江到汉口参加大会，在“血花世界”解散休息，政治科四川人柏良，在大礼堂窗外看见总工会开会，听主席说“如果蒋介石肯叛革命，我们就要打倒他。”柏良纠集几个人，冲进会场，说他不该说打倒蒋介石，因而发生冲突，把主席台上两个工会负责人抓回学校了。我们回校后，当夜分别以队为单位开大会，责斥柏良的反动行为。最后作出了三项决议：一、要求校当局立即把柏良关起来，并开除出校。二、以队为单位推派代表二人先行到总工会道歉。三、全体同学明日欢送工会负责人到江边轮渡，再由代表接送过江。次晨，学生代表正巧被由汽艇登岸的邓演达碰见，邓便问你们到那里去？学生答说到总工会道歉。邓听后愤愤地说：“中央军校会干出这种丑事来吗？”掉头上车到学校去了。上午八时，全体同学高呼口号，欢送工会负责人到黄鹤楼，再由代表接送过江。柏良事件是意想不到的反动事件。恰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前，足见蒋介石早就派人来武汉

暗中活动了。

五、群情愤怒中开反蒋大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收买青红帮进攻工人纠察队，派兵骗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又在宝山路屠杀工人，以后并在南京另立中央，造成宁汉分裂。同学们关心革命前途，对此非常愤怒，召开了反蒋大会。大会上揭露蒋介石早先伪装革命的可耻行为，指出他在黄埔军校时向学生讲：“我蒋介石反革命的话，学生的枪口可以对准我”，“谁反对三大政策，无论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现北伐胜利了，他就投降帝国主义，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屠杀革命群众。大会上还绑出杨引之来斗争。杨是蒋介石派他到重庆，唆使刘湘军阀搞“三·三一”惨案，杀死杨闇公和几百革命群众的罪魁（杨引之是由重庆回南京，路过武汉时，在船上把他抓住的）。同学们高呼“枪决杨引之为三·三一惨案烈士复仇，”“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口号。

六、陈独秀公开演讲

头一天，队上同学秘密告诉我，要我注意周围有暗藏武器没有，我照做了，没有发现什么。次晨纪念周整队，队伍调列成方形，中间设一台，一声口令“坐下”，只见恽代英引一高身材，半秃头的人上台来，这人身着一件旧西装，敞开胸前的扣子。恽向我们介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跟你们讲话。”我一听陈独秀名字，就想起他是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的领导人物，我曾读过他的《独秀文存》，当时对我思想启发很大，今天他是共产党总书记，是从不公开露面的。能得听他演讲，感到非常幸运。我想，他一

定对国内外形势作很好的分析，以革命理论来指导革命行动。我们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的什么呢？题目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始终是合作的》，他举出三大理由：一是两党的革命目的相同；二是两党的革命对象相同；三是两党革命步骤相同。“所以武汉民众团体，一连发了二百六十封电报，欢迎汪先生回国主持武汉政府。”听讲下来，同学们暗中有议论，有同学说：“这是向汪精卫表态，不是向我们演讲！”我说：“难怪陈的大助手高语罕出版的青年白话书信上说‘拥抱着白日，仰护着青天’，像蒋介石那样，不要你抱，怎么办呢？”陈的演讲，同学们是失望的。

七、出征平乱，保卫大武汉

恽代英在一次报告中告诉我们，我军继续北伐，到河南作战，蒋介石乘我后方空虚，勾结川军杨森等部队进攻武汉，杨军已抵仙桃镇，需要同学们去战斗，保卫大武汉，保卫革命。大家听了下来，各自准备，不用的书籍衣服，送储藏室，学校宣布编为中央独立师，师长侯连瀛，政治大队和工炮科共三个大队编为一团，武汉招收的两个大队和女生队为二团，女生队作为宣传、救护队，女生不服，请求拿枪打战，学校因照顾体力和作战不便，经多方说服，才得解决。另外编学兵团为第三团，开到汉口上游金口布防。忽传夏斗寅受蒋介石收买叛变，反攻武昌，已抵武昌城外十余里的纸坊车站，叶挺只带第二团去抵禦，但众寡悬殊，调我们两个营附女生救护队和迫击炮一连开南线，听叶挺指挥。叶把二团向右移，把铁路正面的防守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当天晚上开出通湘门上火车。同学们大概是心情紧张，上车后鸦雀无声，只见月亮从铁道旁边的柳丝后面露出笑脸。忽然汽笛一声，火车开

动了，有人提议唱歌，于是前车后车，歌声不绝，车轮嗒嗒，有意替我们打拍子，要进站时，歌声才停止。一看站上有伤兵，但还没有闻到枪声。下车后，令就地睡下，抓紧休息。在白天晒热的月台，心头又想到要打战，睡不着。天微明，饭送来了，急忙吃了饭，排长在月台上砍开几箱子弹，要我们每人加五排。我们已经背了两百发子弹，再加背包、军毯、雨衣、杂囊、饭盒、水壶、刺刀和枪，已经感到负担很重了。排长说“枪打响，你们才知子弹的宝贵，快快加上，”只好每人再加五排，整队到前面洼地集合，只听传达上级命令，“第一营为前卫，迅速占领阵地，第二营为预备队。”我是一营二连，成单行持枪跑步通过铁路被敌突破的山口，一时枪声大作，敌人开始拂晓进攻了，子弹打在前后铁轨上咣咣的响，我们迅速左右散开，还没等卧下，前进号吹响了，一齐持枪在弹雨中向前跑百多米，在土埂卧下，抬头一看，敌人就在田沟那面，双方展开战斗。冲锋号响了，大家一齐上刺刀，喊着冲锋！杀！跳下坡去，发现半坡上有三具战士尸体，大概是昨日下午阵亡的。前面是一沟水田，在弹雨中，同学们各自成单行，端着枪冲上每条田埂，一面喊杀。敌人的机枪不是打高了，就是打矮了，子弹把田水都溅在身上脸上，幸未见倒下一人。还未冲到彼岸，敌兵已溃退，同学们缴得机枪一挺。右面的同学在铁路上打倒一个抬炮的，其余敌人扔下迫击炮逃走了。我在青松林里，发现一个敌兵，把枪口对准他，他站起来双手把枪奉给我，说些告饶话，我接过枪，把机机下了，仍交他背着，我问他们有多少人，他说前面是两个团，后面还有三个团。这时本班同学都追到前面去了，俘虏无处交，成为包袱，右面有一个叶挺二团的战士来，我把俘虏和枪全交给他，才赶上同学追

击敌人，一直追到土地堂车站。第二营增援前线去了，我们才坐下来休息一下。

八、叶挺到前线

在土地堂车站，敌军后队增援上来，凭高于我们的优越阵地，进行反攻，枪声，喊杀声最为激烈，班长说：“我们不等连长了，快增援上前，到左前方选好阵地瞄准敌人放枪。”突然，有少数同学看见铁路上抬下一尊迫击炮，发生了误会，跟着向后面走，只听有人大呼，“同学们，炮是抬下修理的，不要退呀！”仍然喊不住。正在这时，铁路上来了一群军官，在前头的拿着望远镜，看见一个往后退走的学生，便问，“你为什么要后退？”学生抬头一看，不敢再走，那官长拨出手枪，向天打了两枪，阵脚才稳住了。有同学告诉我那是叶挺。大家听说叶挺到了前线，非常兴奋，班长说：“我们向前冲。”我们冲出去时，眼见敌人在半山，我们成仰攻，正在为难之际，看见敌人在撤退，枪声也稀少了。听说叶挺指挥他的第二团，从右侧包抄上山，敌人腹背受伤，放弃阵地逃走。于是全线又追到山坡车站，敌人在山上掘贺胜桥一带山地做工事。我军占领山坡车站，街上铺门紧闭，女生宣传队出动宣传，通街铺门立即打开了，什么都可买，许多妇女、老年人出来看女兵，问长问短，亲如家人。我班听号音才归队。

九、乘胜夜袭贺胜桥

叶挺在北伐时，曾率军血战汀泗桥、贺胜桥，摧毁吴佩孚的主力，是北伐胜利的关键。他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今天趁敌人立脚未稳，命令连续作战，进行夜袭。晚饭后正想休息一下，

站外紧急集合号吹响了，整队后宣布我营夜袭贺胜桥，行动时不准说话、不准打电筒、不准抽烟、不准有响声，每人紧扎全身后，高跳三下，互相检查才出发。在黑夜里持着枪，伏着身，尖兵在前面侦察，时停时进，通过许多田坎、小道、洼地、林荫，走了个通夜，都没遇见敌人。探得敌人连夜向江西方面去了。我军次晨越过贺胜桥占领咸宁县、再进军蒲圻，沿途群众在铁路两旁摆设茶缸、稀饭、开水慰劳我们。同学们舀一碗水，就投下一把铜元，表示感谢。进城驻定后，武汉各民众团体的慰劳队，络绎不绝的来了，用火车运来许多慰劳品，单是我们班上领来的东西就堆满一屋角，诸如汗巾、面巾、饼干、罐头、汽水、水果、甘蔗之类。《中央日报》在副刊上连载同学谢冰莹（女）的从军日记（后来出版成书）。

十、击溃杨森川军

在蒲圻县驻三天，夏斗寅残部早已退往通城通山去了，但长江上游仙桃镇的杨森川军还稳着未动。我们奉命开嘉鱼县。行军路上，尘土飞扬，只好用面巾打湿，权当口罩。午间在林中休息吃饭。我有点头昏，仰卧在草坡上，女同学曹泽芝、周开璧跑来，打开救护包，倒好开水，要我服药，像亲姐妹那样关心。后来部队从嘉鱼继续开沔阳，夜袭丰口，把杨森军一个旅打得泗水过河。再进通海口，同学们欢呼，“快取荆州（江陵）了”。正在这时，学校电令速回武汉，并派小火轮到新堤来接。

十一、汪精卫报告分共

武汉的包围解除了，已经转危为安，我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回

到武汉，换了衣服就到医院，去看受伤的同学，受伤的同学说：

“我们的血白流了”，大家听了很吃惊。那料政局已经大变，湖南长沙许克祥屠杀农民。唐生智军回师武汉，事实上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到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了。以前我们常常参加中央扩大纪念周和纪念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徐谦、谭延闿、汪精卫、孙科等人。这次纪念周，只有汪精卫一个人，穿一件米色西装大翻领，孤零零地坐在主席台的一张藤椅上，装起一副可怜相。他讲话时说：“国共两党负责人，每天用四个钟头的时间，开国共联席会议，始终未能解决问题，有个外国人拿封第三国际发给中共的电报给我看，‘立即成立二十万红军，消灭国民党军队，立即成立苏维埃政府、取消国民政府’，因此我们不能不分共了，凡在政府中，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迅速离开……”。同学们听后，大为惊疑。街上立即贴出许多红色标语“反共产便是反革命”。汪精卫这个假左派，投机政客，完全暴露了。

十二、改编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七月十六日何键军占了汉阳，七月二十七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同我校教育长邓演达，取道郑州到苏联去了。唐生智军早就要来解决我们学校，我们一面仍加紧训练，一面提防，白天在校外乡间马路上去出操，夜间在校周围安步哨，最紧张的时候，借打野外为名，开上洪山，露宿一个星期，听说经叶剑英等调解，让广东开来的三个大队毕业，留我们武汉招的两个大队和直属队（直属队是在广州白色恐怖下，六期生中一部份共产党员和拥护三大政策的学生，跑来武汉，编为直属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叶剑英当团长，同二方面军回广东。八月一日周恩来在南昌领导起义了！我们因等船，八月三日才到九江，在船上什么都不知道，上岸喊开到公园集合，令架枪退后八步，立即四面机枪亮出来了，总指挥张发奎上台讲话说：“我到九江电令前敌指挥贺、叶等回九江开会，他们的回电，要我去南昌，我坐火车前往，在车上看见士兵向九江方面做工事，我要停车，副官回来说某营长不准停车，我叫营长来问，你奉谁的命令不停车？营长说，我奉党的命令不停车。我说，你奉那个党的命令不停车。他说，我奉共产党的命令不停车。我是国民党，我要下车，总指挥要下车，可以开个慢车。我从车上跳下来，卫士、军乐队都装到南昌去了，共产党在南昌暴动了，同学们的枪暂时放下，是共产党员，即速离开，否则我要抓人……”。张在讲话时，共产党同学传知，给他热烈的鼓掌。当时我很不解，以后才想起这是为要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徒手开出公园，住自来水公司，两天之内，自动的走一批人，我是两个共产党员约我一同买便衣走的。听说后来张发奎又发还枪枝，开到广州。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革命熔炉——抗大

刘 祖 靖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其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一九三六年四月，为了培养大批抗日军政干部，党中央决定继续把长征中的中国红军大学办下去，后于六月一日在陕北瓦窑堡创办了抗日红军军政大学。校长是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杨尚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十年内战转变为抗日战争。各地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要求学习抗日理论和抗日战略战术。党中央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和爱国青年的要求，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将学校迁到延安，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抗大总校之下先后成立了十二个分校，培养了十余万军政干部到八路军、新四军和敌战区去工作，为抗战胜利和我军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抗大对我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抗大学员迄今遍布全国各条战线，而且大都担任领导工作。抗大的教育方针、学校校风、教学原则等，是当时全国所有学校的楷模，迄今仍有指导意义。所以，抗大在我军发展史、在院校史中享有盛名。

抗大各期概况

抗大一共办了八期。第一期都是红军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第二期工农干部占多数，知识青年占少数；第三期知识青年比工农干部略多一些；第四、五期主要是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到延安来的知识青年；第六、七、八期，基本上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山西新军（决死队）来的工农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各期学员的觉悟程度、斗争经验、文化水平、工作能力、成分出身等均有差别。特别是外来学生更为复杂，所以八期各有特点。现将各期具体情况，缕述如下：

第一期——提高领导能力和文化程度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抗大第一期在陕北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党中央负责同志亲临参加。毛主席讲了话。他说，我党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了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此我们的干部须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

第一期学员编为三个科，共一千零六十三人，大多数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一、二科为中、高级干部，约二百八十余人。特别是一科，其中有三十二名高级干部，平均年龄二十七

岁，有八年战斗经验，平均每人三处伤疤。三科主要是红军中排连干部及部分老战士。由于校舍和物质条件困难，学校分住两地，一、二科住瓦窑堡，又称一校。三科住甘肃环县本钵寺，又称二校。七月，一、二科又移住保安。在保安同样也很困难。保安城本不小，由于汉回民族纠纷，城市破坏很大，人口不到四百人，房屋也只剩下一些石砌窑洞了。我们把城外山边在天然石壁上凿开的石洞作为校舍。这些石洞大的高宽各约三米，深约五米，小的高约二米，深两米多。什么家俱也没有，全体人员动手做石炕、石桌、石凳、石黑板。有人风趣地说：“我们穴居石器，回到上古时代了。”没有蔬菜，学员们就到山上挖野菜吃。虽然生活艰苦，但大家都很高兴。

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参观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后，在《西行漫记》一书中高度称赞“这个大学，大约是世界上唯一的‘最高学府’……”。斯诺所指的不是别的，而是发现学校里有世界上任何大学所没有的一些稀奇的事情。这里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图书、仪器，更没有头戴礼帽、身着西装革履的学员，有的是破庙、废窑、牛棚马厩改作的校舍，一群头戴八角五星帽，身着灰色军服，足穿草鞋，身经百战的战士。他们在这里探讨革命真理，谋求中国解放的道路。生活虽然极端艰苦，但大家都有着一股革命热情，以高度的自觉性学习军事政治理论，整理自己过去的战斗经验，以提高领导能力与指导战争的艺术。这些的确是世界上“唯一”的。

学校的教师，大都是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党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来学校讲课或作报告。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在抗大讲的。前者讲的

是抗日救国的必由之路，作为学校的基本政治教材；后者讲的是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作为学校的基本军事教材。一、二科学员，大多是红军中从团到军团的高级干部，指挥过千军万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根据毛主席讲的理论，对照自己过去的战斗指挥，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作“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以免成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

三科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其中还有文盲、半文盲。毛主席很重视文化水平的提高，他指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有局限性。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一种常常用得到的基础工具了。”因此，三科的教育计划是文化与军事政治并重。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迎接抗战，一期学员于同年年底毕业，回到部队，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去了。

第二期——迎接抗日战争到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第二期在延安开学，把抗日红军军政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期编四个大队，学员共二千七百六十二人。一、二、三大队主要是二、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其中有一部分高级干部。第四大队主要是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平津学生，占学员总数三分之一。这期还有一个女生区队。开学典礼时，毛主席来讲了话，他亲切地勉励大家，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

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侵略者。毛主席的教导对改造学员的思想，有很大启发。

抗大二期教员很少，而且有的同志很想上前方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不安心搞教育工作。毛主席知道后，亲自给抗大题词，勉励在校工作人员，“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并亲临学校讲话说，“教员是干部的干部”，是“老母鸡”，是非常光荣的事业。他给大家算了一笔帐，说，你们在队上当教员，每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当团长、当师长呢？那就是无数的队伍。要树立死在清凉山，葬在嘉岭山（二山均坐落在延安东门外，清凉山在延水之北，嘉岭山在延水之东）的决心。毛主席的题词和讲话，给大家以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从此，在校工作人员基本上安心工作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系统地分析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内容和根源，号召四方面军的干部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抗大全体教职学员通过学习和批判，进一步认识了张国焘错误路线对革命的危害性，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在后来长期斗争中，这些来自四方面军的干部对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清算与克服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思想基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主席特地到抗大讲《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问题，每周两次，每次四小时，共讲了一百一十多小时。他讲课联系实际，形象具体，对大家认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给革命造成的危害性，有很大帮助，同时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得到启示。这一期，

朱总司令到抗大讲过党的建设、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等问题。

同年七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开始了全面抗日战争，二期学员于八月毕业。毛主席为抗大学员的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第三期——窑洞大学的学生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抗大第三期在延安开学。这期共有学生一千二百七十二人，编为三个大队。大部分是外来知识青年，也有部分工农干部。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各条战线的干部。为了解决校舍，学校决定开展一个突击修建校舍的运动。全校师生热烈响应。八月十三日晨，一千多教职学员扛着镢头、圆锹，开进了凤凰山工地，开始了劳动第一课。

经过半个月突击，全校师生共挖了一百七十五孔窑洞，修了三千公尺长的“抗大公路”。窑洞建筑很好，有土炕，土写字台，洞内白灰粉刷，洞口安有门窗，光线充足，冬暖夏凉。顺着山坡起伏，一层一排的窑洞犹如一幢幢楼房，可称“壮观”。同学们亲切地称抗大为“窑洞大学”，自己是“窑洞大学”的学生。

新校舍落成时，毛主席题赠了“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并在新校舍落成典礼会上讲了话。毛主席说：获得成绩的原因，就是克服困难，联系群众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战胜日寇，是完全可能的。

九月，毛主席针对学员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为抗大政治部出版的校刊《思想战线》写了发刊词，题为《反对自由主义》。

十二月十五日，抗大三大队九队成立了救亡室，毛主席给抗大九队救亡室写了贺信，指出“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救亡室等于红军时期的列宁室，它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配合完成教学及其他任务，如积极开展各种内容的课外活动，进行民运工作，帮助群众义务劳动，组织文化体育娱乐活动，进行内务、军风纪的检查等，它是连队联系群众和活跃生活最好的课外学校。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成立“抗大同学会”，毛主席写了重要题词，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一九三八年一月，抗大举行“一·二八”抗战纪念运动大会，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一致前进，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运动会闭幕时，毛主席讲了话，并宣布罗瑞卿同志由教育长升任副校长，刘亚楼同志由训练部长升任教育长，张际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许光达同志任训练部长。

一九三八年三月和五月，第三期学员分批毕业，毛主席和三大队的毕业学员亲切的谈话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鼓励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第四期——大量知识青年到抗大学习

一九三八年党中央作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决定”后，抗大

就大开门了。四月十六日，第四期正式开学（实际上是学生陆续到校编队，陆续开学）。共有学生五千五百六十三人。其中知识青年占总数百分之八十。学生中有一些华侨和留学生，还有全家入校、叔侄同学、父子同队、母女同班的佳话和动人事迹。

四期共有八个大队（八大队是女生大队），除延安有四个大队外，在蟠龙、瓦窑堡、庆阳等地分住了四个大队。此外，还成立了教员训练班、参谋训练班，以解决专业干部的急需。

毛主席于五月二十日为四期开学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五月，又在四期全校干部会议上作了指示：“一切干部要下决心来干，要认识抗大的教育，是抗日事业的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是增强抗日力量的一个有效的具体的方法，抗大的任务是光荣伟大的，我们应为这一伟大任务而奋斗！”鼓励全校干部安心于党的教育事业。

学校开展了全面军事训练，如队列教练、战术训练、实弹射击、游击战术、行军宿营、侦察警戒……以及政治教育、政治工作教育等。“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就是这期提出的。

同年春天，学校开展向国内外募捐。许多学生献捐和向亲友募捐。这除解决经费困难外，还扩大了学校和我党我军的影响。

七月，毛主席针对当时抗大学员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作了《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着重指出，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抗大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这并不妨碍抗大的集中的军事性质。对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于如何正确运用民主，都有深刻的发挥。这个讲话，在民主革命时期适用，在今天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保证党内正常

的民主生活，同样也是适用的。

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雷克难、傅路德等四人于五月份来延安参观。他们参观了抗大的全部教学活动，对抗大作了极高的评价，并要求抗大接受他们为荣誉学员。他们穿上抗大的军装，戴上抗大的领章合影留念。

九月，周恩来同志从武汉回到延安汇报工作，特地到抗大作了《第三期抗战的形势与前途》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介绍了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热潮，及全国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所抱的殷切希望，给同学们以极大的鼓舞。

九月二十九日，我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会后，毛主席亲自给抗大领导写信，并要求四期学生学完了六中全会文件之后，才能毕业。信中说：“此次毕业生必须发给解放五十七期、六中文件，并需讨论之后才走为好。……”

同时朱总司令也来抗大作了关于敌后根据地建设，八路军、新四军打击日寇的作战经验的报告。增加学员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同年年底以前，四期学员陆续毕业，毛主席在毕业证书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

第五期——挺进敌后办校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确定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敌占区。因此，抗大从第五期开始在敌占区办学校。于是以抗大的第五、六大队为基础组建第一分校，何长工、周纯

全同志任正副校长，韦国清同志为训练部长，黄欧东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校址在晋东南；以抗大第七大队与第一大队的四支队为基础组建第二分校，陈伯钧、孙毅同志先后担任校长，邵式平同志为副校长，袁子钦、李志民同志先后为政治部主任，校址在晋察冀。三八年底，两分校出发，通过敌人封锁线，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于一九三九年二、三月份分别开学。

朱总司令经常到抗大一分校向干部、教员讲授军事课，理论联系实际，讲得非常生动。左权参谋长也常来一分校作军事报告。对干部、教员的军事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这时总校尚在延安，也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开学。总校学生四千九百六十余人，加上一、二分校的学生，总数超过一万人。总校还增设了参谋训练队，敌军工作训练队，工人大队等，以培养专业干部。“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学校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党中央提出要抗大对过去的工作作一次检查。毛主席为之题词：“检查越深入、越彻底，越能发挥学校成绩，克服缺点。”抗大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开始，对学校教育工作、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医疗卫生等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历时两月余。最后，罗瑞卿副校长作了总结，肯定了成绩，取得了经验，明确改进工作的方向，使全校人员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并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党中央号召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自己动手，努力生产。毛主席先后给抗大生产运动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学校专门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把生产列入教育计

划，提出当年生产三千三百石粮食。结果开荒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一亩，生产粮食一百多万斤。“抗大农庄”是全校一百多个炊事员开办的。毛主席称赞这个农庄说：“抗大农庄一百几十个人担任了六千个人全年四分之一的粮食，四百个人便可以生产六千人全年的粮食（还是用的落后的工具）。如果按照抗大农庄的办法，那末中国只需要三千万人生产，就可以养活四万万五千万人。……”

同年六月一日是抗大三周年纪念日，开了纪念大会和运动会。毛主席和陈云、李富春、邓发等中央负责同志亲临大会，检阅了部队。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毛主席还为抗大成立三周年撰文，题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论述了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和重大贡献。抗大在全国闻名，在外国也有点名气，比昔日的“黄埔”更革命、更进步，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能够作出更加伟大的贡献。

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迁移到晋东南敌后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罗瑞卿副校长在抗大活动分子大会上，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阐明了这一决定的重大意义……全体人员一致拥护。以总校的原第一大队的工农干部队、第二大队的职工队、第五大队、敌工队、参谋队作基础，组成第三分校，留在延安，许光达同志任校长，李逸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总校的领导机关和一、二、四大队与陕北公学本校共同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由罗副校长率领开赴华北敌后。

一九三九年七月，总校出发东征，前来送行的，有中央和边区机关、各团体、各学校代表。毛主席在欢送大会上作了指示：“坚持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内部团结。这是同志们上

前方的总方针。是拯救中华民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活法宝。”

抗大原是直接向晋东南挺进，由于汾河涨水，不能通过。因此，改变向晋察冀边区前进，穿过同浦路敌封锁线，日夜兼程，历时三个月，终于到达晋察冀，于十月十日举行远征祝捷大会。一九四〇年春节时，总校与二分校干部联欢，贺龙、关向应、周士弟、甘泗淇等同志以及军区聂荣臻、彭真同志先后到总校看望。

第五期于一九三九年年底毕业。

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顿抗大问题的指示》指出，抗大及一切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之办理方针，应当如下：

（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好干部，确实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学生中的思想上的争论与辩论，实际上这样的学校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

（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

1. 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2. 教育他们有组织性、纪律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3. 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

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抗大以军委指示作为办校的指导思想。

第六期——边战斗边学习，渡过难关

一九四〇年二月，总校转移到山西武乡县蟠龙镇。三月，一分校由晋东南迁到山东，留下部分学员到武乡与总校会师，何长工同志回总校任教育长。第六期学员共四千九百人，主要是来自八路军及山西新军（决死队）的干部，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半文盲占百分之四十三，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工作与战斗经验。开学那天，朱总司令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你们这一期比哪一期都幸福，主要是能直接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来受教育，能接触更多的实际。他要求大家要发扬前五期的光荣成绩，努力学习，吃苦耐劳，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前进。

四月，罗瑞卿副校长调任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继任副校长。

这一期的特点，是在流动环境中进行教育，经常要对付日寇“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一面学习，一面战斗。总校校址一年中变迁过两次，一次由武乡到黎城，二次由黎城到邢台浆水。一九四〇年日寇对晋东南实行秋季“扫荡”，抗大的一团六连、青年连和二团的二、三连及校部的警卫连，在黎城参加了阻击战，掩护学校及地方机关安全转移。洪岭、长岭背战斗，粉碎了日寇合击抗大的企图，击毙日伪军一百余人。当时，有的连队距离战场只三数里，仅隔一个山包，头上有日机盘旋，耳边响着步枪、机枪、迫击炮声，还坚持列队上课，真正做到了“一面学习，一面战斗”。

这一期遇到的突出困难是华北大旱，加之没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故粮食给养非常困难，有几个月尽吃黑豆高粱，而且还必须到八、九十里接敌区去背回。驮柴、背粮，成为学校的一件大事。没有菜吃，到山上去挖野菜。抗大师生就以这样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各种困难，还总结了背粮途中、战斗间隙和流动环境中如何顺利进行教学，保证教学的一套方法。同时，还帮助训练地方武装，参加敌后根据地各种建设以及抢收、抢种、抗旱、坚壁清野等工作。这些做法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也培养和锻炼了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

一九四〇年，抗大又先后成立了三个分校：三月，在安徽涡阳成立了第四分校，彭雪风、张爱平同志先后担任校长，六月，总校派洪学智同志率领华中大队予以加强；十一月，以皖北、苏北的两个干校的一部分合并组建成第五分校，校址在淮南，陈毅同志兼任校长，该校于一九四二年一月改为华中总分校；十一月，一二九师的随营学校与总校派出的第四团合并组成第六分校，校址在山西武乡，刘忠同志任校长。从此，抗大的旗帜，已从黄河之滨飘扬到江淮两岸了。

总校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迁到邢台浆水，第六期于此毕业。

第七期——强调正规化建校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日寇也加紧扫荡抗日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巩固与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中央军委给抗大指示：“由于分校的分散，对分校之具体领导，应责成各地党的分局及最高兵团负责。”“总校应当注意总结经验、

指示方针、统一教材之编印，统一各种教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及帮助和加强各分校的领导。”“各分校不仅办下级干部班，且当办上级干部班，过去军委及总政在延安集中办高级班，在抗大集中办上级班的计划，应有部分的变更。”

一月二十八日，第七期在河北邢台县浆水镇开学，学员共二千五百五十一人，均系八路军、新四军的团、营、连干部，分为上干科和基本科。还有一个军政教员训练班。

根据军委的指示，抗大除了坚持正常训练工作外，认真总结了五年来的军、政、文教育工作，对工农干部和对知识青年的军、政、文教授法与学习法，政治上改造知识青年的经验，行政管理及事务人员的教育、供给、卫生等工作，分别召开专门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写出了《抗大五年来工作经验》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全文约四十余万字。通过这次总结，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改进了教授法和学习法，改善了工作作风，促进了工作效率，提高了教学质量，全校出现了新气象。同时还成立了军政研究室和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政治工作等三个研究班，及教员训练队、供给人员训练班、医务人员训练班。建立了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定期举行测验、考核，定期举行学术研究和时事报告。对长期分散在外的供给、粮秣、采购等人员，分批调回学习，以提高政策和业务水平。通过这次总结，还加强了对分校的领导，密切了总校与分校的关系。分校有什么重大活动，都向总校报告，总校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指示和指导。

这一期开始大编教材。凡是教育计划上规定的课目，不论军事、政治、文化等教材，都编印得较齐全。这些教材，是经校首长亲自主持，分别集中有造诣的教员反复讨论定稿，再经教材编

审委员会审查通过，并以命令颁布之。教材质量比较好，深受教员和学员的欢迎，不但解决了总校和各分校的教材需要，而且还提供给部队使用。

鉴于敌后经济非常困难，学校开展了生产节约运动，实行严格预算、决算制，提出“节约一分钱，增加一分抗日力量”。在生产上，号召各伙食单位生产蔬菜自给、烧柴自给。每天晚饭后，都有人在菜地里锄草、浇水，每逢星期天大家都纷纷上山砍柴、背柴或背粮。这一期日寇扫荡的间隙较大。所以环境相对稳定。

四一年“六一”，是抗大诞生五周年纪念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这是抗大成立以来一次空前规模的盛会。中央军委对这次庆祝活动非常重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罗瑞卿主任以及中共北方局、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都为大会题了词。朱、彭副总司令的题词是：“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旗帜，插遍整个中国”。左权的题词是：

“锻炼铁的党的干部”；罗瑞卿的题词是：“提高技术，提高学术，必须是与近代技术与新的科学化的学术结合了的军队，才会是真有力量的军队，愿抗大会后作更大的努力”；中共北方局题词是：“用马列主义武装千百万青年”；野战政治部题词是：

“发扬抗大五年来的光荣传统，创造抗大新阶段，为党、军培养大批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干部而斗争。”罗瑞卿同志代表八路军总部长途跋涉，专程赶来参加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共有七十多个单位的来宾三百五十八人。大会还收到纪念旗帜一百多幅、贺函贺电五十件和其他物品等。

庆祝大会开始时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彭德怀副总司令亲临学校，代表中央军委检阅学校队伍，陪同检阅的有罗瑞卿主任、滕

代远副校长、何长工教育长、张际春主任和十一旅的秦基伟旅长、六分校的黄政委等。彭副总司令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抗大已经培养了数万青年干部，走上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希望继续培养大批模范干部，作为提高八路军到铁军阶段的骨干。……”

还举行了五天的大型运动会和五周年展览会。展览内容相当丰富，全面地反映了抗大全貌。

这期教育，进一步走上正规化的建军道路，军容风纪和各种制度、条令的贯彻执行都很严格。学校注意养成教育，要求各级领导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做到令行禁止。有一次全校举行阅兵，一个连队迟到了十分钟，该队领导干部因此受到了行政处分，给学员以很大震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第七期学员胜利毕业，刘伯承同志亲临大会作了重要的讲话。

为了在敌后大批培养干部，抗大又先后成立了六个分校。一九四一年七月，在晋绥地区的兴县以一二〇师教导团为基础成立第七分校，该校于一九四三年春迁至甘肃合水，一部分并入总校。一九四一年五月，在淮南天长县以新四军江北干校的一部分为基础成立第八分校。一九四三年改为新四军二师教导团。一九四二年五月，在苏中南通县以抗大苏中大队为基础成立第九分校，一九四四年改为苏中公学。一九四二年春，在鄂豫皖地区，由新四军五师随营学校改编为第十分校，一九四五年二月停办。一九四五年春，还分别成立了太行分校和太岳分校。太行分校在河北涉县，以抗大太行大队为基础组成。太岳分校在山西沁水，以抗大太岳大队为基础组成。同年冬，这两个分校与总校第五大队合并

组成晋冀鲁豫军政大学。

第八期——保存干部、准备反攻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第八期开学。校址在河北邢台浆水镇。学员共六千人，都是从八路军及新四军来的从排至团的干部。营团干部编为上干科，排连干部编为基本科。另外还附设有陆军中学，是各部队、机关精简下来的十四、五岁的少年战士，他们主要是学文化，只有少量的军政教育。

八期学员一般有较强的实战经验和工作经验，政治水平也较好，但文化程度多数偏低。教育计划第一学年为文化教育，要求达到初中水平。由于文化程度不齐，为教学方便起见，每队分编为初小、高小、初中等年级班。对文化低的加强辅导，对文化高的则多给自修时间，让其整理过去的经验。

由于抗大在敌后目标大，是敌人心脏里的炸弹。因此成为日寇扫荡主要对象之一。日寇在华北地区有名的四二年五月大“扫荡”中曾发出“以二十个人换抗大一个学员”的叫嚣，出动兵力四路合击总校驻地浆水，由河北临城、邢台、沙河、山西昔阳向浆水前进，妄图合击总校。抗大首长早已预料到敌人会来进攻，在第七期时就制作了反“扫荡”的预定方案，对跳出敌人合击圈作了周密的布置，即敌进到利害变换线时，敌向我进，我向敌进，来一个大换防。我向敌进时不能全校走一条路，而是分途转进。

基本系向北转进，只一个夜晚就转进到北路之敌后边去了。上干科西上太行山，在转进途中虽遭遇敌机轰炸，但无损失地转到西路之敌的后方去了。总校校部向西南拐儿镇、黄泽关方向转进，发现敌军在前面不远，又折回东向路罗镇、浆水前进，和敌

人转磨盘。因校部非战斗人员多，行动不灵，为了行动灵敏，又分为三路，滕副校长、何教育长、张主任，各带领百余人分途转进，最后在王莽寨（一个山名）会合，乘夜跳出敌之包围到达赞皇村。供给卫生等部门就地分散隐蔽。陆军中学向路罗川以南转进时，在途中与优势之日寇一个大队遭遇，他们顽强抗击，击毙敌百余人。陆校第五连伤亡较大，最后因子弹、手榴弹都打完了，与敌展开肉搏，校长史紫千被俘英勇不屈，壮烈牺牲。学校运输队被敌人合围了，损失骡马数十头。总校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一边战斗，一边学习，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胜利地回到原驻地，继续进行正常教学。这时，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左权同志于反扫荡中在辽县牺牲，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滕代远同志接任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张际春同志升任抗大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长工同志升任抗大副校长。

华北日寇为了蚕食抗日根据地，在平汉路西侧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地区修碉堡、筑封锁墙、挖封锁沟，企图蚕食缩小我根据地。鉴于此种情况，学校派出警卫连并抽调军事干部到边沿地区帮助各县独立营、基干民兵队与敌人展开尖锐的反蚕食斗争，不断打击敌人，宣传组织群众，平沟毁墙，进行反封锁，逼得敌人不敢越出碉堡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为了保存干部，准备反攻，党中央决定抗大由何副校长率领返回陕北。陆军中学由校长任白戈、政委陈鹤桥率领，仍暂住浆水一带。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总校从邢台出发，在地方武装和群众掩护下，胜利地通过了白晋路 and 同蒲路两条封锁线，历时四十余天，于三月初到达绥德。总校到达绥德前，原三分校（后改名军事学院）已先期到达绥德；总校到达后，第二、七分

校也奉命到绥德，此时三个分校都与总校合并了。七分校的一部分又与后来回陕甘宁边区的陆军中学在甘肃合水合并，成立了新的七分校。

这时中央任命徐向前同志为校长，李井泉同志为政委，何长工同志为副校长。毛主席为返回陕北的抗大题词：“站在最前线”。

同年四月，学校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就是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弄清是非，提高觉悟。最后，根据整风计划，每人写出自传。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整风结束。

抗大回到陕北绥德那天起，为了克服日寇对根据地进攻和国民党对边区封锁所造成的困难，全校人员响应党中央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热烈投入了大生产运动，共开荒一千五百亩，养猪一千头，还养了许多牛、羊、鸡、兔等家畜家禽。此外，学校还经营了酒精厂、屠宰场、豆腐场、木工场、缝衣场、印刷厂、开煤井等。还有手工生产，如造粉笔、肥皂、捻毛线、打毛衣、织手套毛袜、编筐子、打草鞋、纺线等。做到公私两利，生活有很大的改善。这里举一九四五年学校对各伙食单位生产任务要求：自给全年蔬菜，每人平均五百四十七斤，养猪每人每月猪肉一斤（学校供给肉在外），每月吃肉七次。各单位自己磨豆腐、生豆芽、腌咸菜等。其他日用品，全年每人毛巾两条，牙刷两把，袜子两双，肥皂六条，煤、油、盐、灯油以及被服等则由学校工商业盈利生产内统一供给。从抗大开办以来，第八期可算得是丰衣足食，物质生活比任何一期都要好。

此外，学校为了解决校舍不足，还新开窑洞近二百个，五大队住的全部是新窑洞。

第八期除整风、生产有大的收获外，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也比任何一期的教育质量要好。这期学习期间比任何一期要长，共三年零四个月，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战略反攻。九月，适值日寇正式投降，抗大完成了历史使命。

一九四五年十月，由何长工副校长率领总校向东北进军，年底到达通化市，学校又正式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一九四九年迁到武汉、改为华中军政大学，以后又改为汉口高级步校。一九七〇年春，林彪大砍院校，把我军这个历史悠久的学校砍掉了，真是罪恶滔天。

教育方针、教学原则

校 训 校 风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毛主席为抗大三期亲笔题的教育方针（当时称为校训）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为纪念抗大三周年而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又重申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后来，毛主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一个人民军队的干部，应具有为人民解放事业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为了实现这一方向，不论如何困苦，甚至流血牺牲亦在所不惜。因此，人民军队的每一个干部，必须首先具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这个品质，同时必须具有实现

这一方向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因为人民的解放事业非常艰巨，没有艰苦工作作风的锻炼和养成，就无法实现正确的政治方向。人民军队的干部，不但要具备上述品质，而且在斗争中，还要善于依据具体情况的变化，采取对敌人斗争的各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以达到争取同盟军，孤立敌人，打败敌人，取得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因此，人民解放军要求他的干部在同人民的敌人斗争时，还必须具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品质。

抗大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是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是全校教、职、学员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准则。

教 学 原 则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主席指示抗大的教育原则要“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一九三九年三月，毛主席对抗大一分校又明确指出：“为了教育深入，必须坚持学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每周上课无论如何不得超过六次”，“在八个月的学习期内，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去实习的机会，时间约一个月。”兹将上述各项教学原则分述于后：

1. 少而精的原则

“少而精”是抗大教学第一个重要原则。它体现在教育计划、上课次数、教员讲课等方面，特别是教员讲课，要贯彻这一原则，目的是让学员消化所学的知识，提高教学效果。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需要及时输送大量干部到前方，学制不能过长，学习内容不能太多，所以应采取少而精的原则。什么是少而精？这个问题在教员中是经过多次讨论才求得认识一致的。所谓少，并

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反对面面俱到，要大胆放弃一些次要的可有可无的课题和内容，以便突出重点。同时，应针对不同对象，有所侧重和取舍，使学员在短期内学到急须具备的知识。

2. 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一贯的学风。抗大在敌后办校，敌我双方斗争复杂剧烈，扫荡与反扫荡频繁，这正给我们一个联系实际的好机会，同时也要求教学必须联系实际，比如讲军事课，除了例举历史上的战争经验和搜集各部队的战斗经验总结外，教员要组织学员开座谈会，启发学员讲亲身经历的某一战斗的过程，教员加以整理，划出战斗经过图例。讲战术原则时，则联系此战例说明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学员听课有兴趣，且能理解战术原则之真谛。另一方面，学校经常请部队首长和战斗英雄来校作报告，根据情况，组织干部、教员到部队参加实际战斗，如“百团大战”、“保卫黄烟洞战斗”等著名战斗，学校都派教员参加，这对提高教员的战术水平大有裨益。

教 学 方 法

抗大对于教学方法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不论教员的知识如何丰富，教材如何好，若无良好的教授法，教学效果还是不好。现将抗大的教授法简述如下：

1. 启发式

启发式的特点，是利用学员已有的知识，引导学员提高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员对学习的内容，不仅懂得是什么，而且懂得为什么，能够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从而养成动脑筋想

问题的习惯，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2. 讨论式（或研究式）

讨论式教授法，适合高干队。高干是以自学为主，教员指导为辅，开展座谈讨论，让学员整理总结以往的经验，互教互学，取长补短。

3. 实验式

实验式教授法是将教、学、做统一起来，教员边讲边做示范，教员在讲的基础上做，在学员做的过程中检查学。这是更生动的学，能够更深刻地领会所学的内容，如军事教学中的射击与兵器操作、测量与绘图、战术队列教练、实兵演习等等，都是先讲后做或是边讲边做。

在政治教育中，组织学员进行社会调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等，以促进学员思想感情的变化。

在文化教育中，把数学与连队的各种统计、计算联系起来，把语文与写日记、书信、作报告结合起来；物理、化学课目，也充分结合实验进行教学。

以上是抗大教员的三种教授法，但取得教学效果的程度，还取决于教员的个人修养和在授课的技能及学员努力程度。

各 种 制 度

抗大的各种制度是比较健全的。大家所熟知的有行政上的会议、汇报、报告、检查、总结以及一日生活的作息制度等。本文所讲的仅仅是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是实施教育的利器。教育计划确定之后，必须有一套教育制度去保障其实现，如教育准备会，

听课制度，考核测验制度，课代表制，讨论会等等。

1. 计划制度

抗大的教学，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是有计划、分阶段按单元安排与实施的。军政教育时间比例，一般为七比三。军事队的军事课占百分之七十，政治课占百分之三十。政治队的政治课占百分之七十，军事课占百分之三十。如果有的队需要学点文化，其比例是六、二、二。军事队（或政治队）的军事（或政治）占百分之六十，政治（或军事）占百分之二十，文化占百分之二十。

每周课程表的安排，各种课目基本上是穿插配当的。另外，各级领导要制订每周个人工作计划。

2. 教员的配备

抗大教员的配备编制是适应战争环境的。学校往往处在流动环境中，校址在农村，各队驻地很分散，队与队之间相距颇远，因此，军政教员通常固定在连队编制内，主任教员固定在大队编制内，各队教员的业务直接属主任教员指导。各兵种教员因授课时间少，编制在校部或大队，轮到实施该课目，届时教员到连队去上课。条令教育和政治工作不专设教员，前者由连（队）长兼任，后者由政治指导员兼任，目的是行教合一。为统一起见，校部设有队列主任教员，政工教育由组织部长统一掌握。

3. 教育准备会

教育准备会，是教员课前准备的一种主要方法。通常由主任教员主持。有时也由分工管教学的行政首长主持之。开会时，召集某一门课程的住队教员到会集体研究每一单元课目（一个或二、三个课目）在不同的学员对象中如何实施。教员所使用的教材教具，新老教员的观摩见学等等都是教育准备会要确定的。

对新教员还要组织试讲。如果是军事课目需要实施野外作业或演习的，还要到现地去勘察地形。

4. 听课制度

为了教员之间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提高学术水平，改进教授方法等，抗大规定了教员互相听课的制度，听后大家评论，主任教员小结。

5. 检查制度

检查制度，是学校各级领导及时了解课程进展，教员的学术水平，教学能力，学员的学习情绪和接受能力等情况的主要方法。领导每周要抽出时间去学员队去听课或参加学员的讨论会，然后将检查结果填写在本周工作日程表上。滕代远副校长、何长工教育长、张际春主任，还到学员队检查夜间演习实施情况。在黑夜难行的崎岖山路和乱石成堆的河滩上，他们跟着学员们奔跑，一直到演习结束。演习完毕后，他们还找教员讲评，指出演习中的优缺点，分析缺点产生的原因及如何改正。这种负责精神深受教员、学员以及连队干部的钦佩。

6. 测验、考试制度

测验是促进学习的一种动力。从测验成绩中，可以检查教学效果，改进教学方法。

测验方式是多样的。除了定期举行课终测验外，主要是在平时经常抽测。特别是现地集团作业时，令学员即题作业，看学员如何运用战术原则。每次提问的成绩要登记在学员花名册上，以了解其学习成绩。

考试是定期的。通常在毕业前举行，只考试主要课目，如战术原则、实弹射击、政治理论。军事课的考试方法，要根据各课

性质和学员水平来确定，不是千篇一律地出题考试。如射击、投弹等，是根据实弹射击和实投成绩，战术课主要是根据情况判断和实兵演习成绩，参谋队则以作业考核为主。

总之各种考试方法，都是通过考试衡量教学效果，从中总结教学经验，学员考试成绩写在毕业鉴定上。

7. 课代表制度

课代表是抗大一种教学制度。课代表是教员与学员之间的联络员，由支部指定或军人委员会选出。他的任务是：收集同学们对教学上的意见；反映同学对课程理解的程度；汇报各学习小组讨论会的情况（模糊认识或争论的问题），代表同学对教学方面提出要求与建议等等。抗大从第五期至第八期都有这种制度，深受学员的欢迎。

教员队伍的建设

教员是完成教育任务的主要力量。毛主席称教员“是干部的干部”、学校的“老母鸡”。抗大很重视对教员的培养与提高。罗瑞卿副校长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总结抗大两年工作时，对教员队伍的建设专门讲了六条要求：“提高现有教员质量，能满足学生的要求；增加教员的数量，求得自给自足；善于团结教员，关心其生活与工作，保证全体人员对教员的尊重；解决教员理论与实际联系，除了组织他们研究时事、党报与党的文件外，在可能情况下，分批派遣到前方，到各种实际环境中去实习、去考察研究；根据所教对象，适当地配备教员；把名教授组织好……”从中可以看出抗大是如何有计划地培养新教员，提高老教员的。

1. 培养新教员

抗大从第四期开始有计划地培养新教员。每期都办有教员训练队（班），从学生中或部队中挑选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政治水平的同志到教员训练队（班）学习，以培养军政教员。学习期限为八个月至一年。到教员队（班）去授课的都是学校指定的有专门学科造诣或教学经验丰富的各级负责干部，以保证毕业后百分之九十以上能胜任教员职务。所以抗大虽然扩大学员定额，增加抗大分校，但始终保持有一支强大的教员队伍，当然有时还感到教员缺乏。

2. 提高老教员

老教员是教员队伍中的骨干，靠他们对新教员传帮带。为了提高老教员的水平，学校经常组织教员和干部到部队参观见学，增加感性知识。如：有计划地派教员参加部队与敌人作战，或直接担任作战部队的技术作业干部；反扫荡时，让教员担任作战、侦察、联络等参谋；根据地的反蚕食斗争中，派教员到地方部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学校本身处于经常的战斗流动环境，教员在战斗中担任指挥员直接参战，也是常有的。

总之，想办法让教员到战斗中去实践，多接触一些实际知识，再把实践知识用到教学中去。

3. 教员的待遇

抗大一贯重视教员工作，除了经常给教员以精神鼓励外，政治待遇（看文件、听报告）对教员适当放宽。在物质生活上，还给教员以优待，使其集中精力从事教学。当时是供给制，不发薪金，从朱总司令到团长，每月发津贴五块钱，营连长三、两块钱，而一般的教员都发三至四块钱，主任教员和老教员则发五块钱。

有时学校搞到一点白面或大米时，都要专门发几斤给老教员，数量虽不多，但在当时物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教员确是很大的鼓舞。遇到行军时，两个教员配一匹马驮行李书籍，两人配一个公务员，以减轻教员的劳累。宿营时，把光线充足和有桌凳的房子让教员住。教员的点灯油不受限制，以便让教员好好备课等等。

政 治 工 作

抗大政治工作的基本对象是学员，中心任务是改造学员的思想。中央军委指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为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场所，一切工作都是围绕教学安排的。这便要求学校的政治工作必须熟悉教育方针和教学原则，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把学校校风贯彻到全体人员日常生活中去。因此，学校政治工作基本特点，一切政治工作的活动，都是为着保证党对学校的领导，保证学校对培养干部任务的完成。

抗大政治工作基本任务与内容

1. 保证党对于培养干部事业的领导，保证学校培养干部任务的完成。凡是中央与上级机关关于培养干部和学校工作的指示，必须对全体干部深入传达与讨论贯彻，作为全体人员在工作学习上和思想上的武器。罗瑞卿副校长在《抗大检查工作总结报告》中说：“学校政治工作第一个任务便是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因而政治工作人员应当切实研究与了解教育计划，正与前方政治工作人员要保证作战胜利，首先要研究与了解作战计划一

样，……教育内容之是否恰当？教授方法有无缺点？学习上有何倾向？教学员之间关系如何？以及教学方面其他问题。政治工作人员，应及时了解并掌握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而显出政治工作的威力来，……”

2. 提高与巩固学校的教学能力，教育每个工作人员为教学服务。一九三九年秋，中央军委对抗大明确指示，“学校一切工作应以教育为中心”。因此，学校的政治工作是教育全体人员热心教育事业，积极作好本职工作，成为忠诚（不仅安心）于培养党的教育事业的模范，并以此来考核每个人的工作成绩。

3. 加强全体人员的党性与思想意识锻炼。一九三九年秋中央书记处讨论《抗大检查工作总结报告》时，批准学校的提议，决定将“党性与思想意识的修养锻炼”列为学校政治工作基本任务之一，把党课列为教学内容，并着重指出学校政治工作中，必须加强党性与思想意识的教育锻炼，强调共产主义道德的锻炼，使全体人员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个问题不仅对知识青年重要，对工农干部亦同样重要。

4. 直接进行政治工作教育与党的建设教育。由于政治工作与党的建设两门课程和党的政治机关有直接联系，一向是由政工干部负责进行，没有设专职教员。这样不仅能保证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有利于加强学员党性与思想意识的锻炼，而且对部队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加强亦有着实际意义，因为学员们都将是部队干部。

抗大每期政治工作的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从学员入校之日开始，直到学员正式上课，

并奠定了学习的初步基础为止。大体占全期时间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一阶段政治工作中心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学习目的，安心学习。

(1) 入队前的政治工作：正确向学员介绍学校情况，从教育方针、校风，学校优良传统，组织状况，学习情形，学期长短，基本课程及学校所处环境等等，都运用适当时机与方式（采取欢迎仪式为好）使新生得到了解。同时，须备有校史、校刊及其他介绍学校的书画，供新生阅览。尽可能使新生参加各种集会，特别是名人讲演，游艺晚会，最为新生所欢迎。有时还组织新生参观学校或名胜风景。

(2) 编队后的政治工作：做好收生编队工作。向学员介绍连队干部、教员、介绍当地居民风俗习惯，深入传达教育计划，并组织讨论，使他们正确了解来学校学习的任务，熟悉新的环境，坐下来安心学习。建立连队各种组织。包括支部、俱乐部、青年队、流动宣传队、课代表等。物色积极分子提名经过民主选举，担任各种工作，一般兼任一个职务。

这一阶段末尾，总结本阶段工作，斟酌情况进行一次鉴定。

2. 第二阶段是全期教育的中心阶段，时间较长，约占全期时间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二。这一阶段，政治工作中心任务是保证学生以饱满的情绪完成学业。

(1) 根据第一阶段的总结，重新审查教育计划是否适合对象，并检查原配备干部是否有必要调整。

(2) 采取适当方式巩固学习情绪。

(3) 普遍了解学员的学习成绩，思想水平与工作能力。根据全阶段的发展，对每个学员作鉴定。一般是三、四个月一次，

考核每个人的发展情况。

(4) 加强党的建设，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

3. 第三阶段是学期的最后一段，也即是毕业前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约占全期时间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二，缩短或延长，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一阶段政治工作中心任务是保证每个学员都成为合格的毕业生。

(1) 学员已接近毕业，要巩固他们的学习热情，保证完成最后阶段的学习任务和各种演习与实习任务；动员学员总结自己全期的学习成绩与缺点，以及思想上进步怎样。

(2) 对具备入党条件的知识青年，要大量吸收入党，并动员他们到八路军、新四军去工作。

(3) 完成对每个学员的了解，进行毕业鉴定工作。这一工作的进行，要作深入动员与严密组织。

* * *

抗大是伟大历史时代的产物，在全国人民强烈的抗日救国声中诞生，在八年抗战烽火中成长壮大，在抗战胜利的凯歌声中完成了历史使命。

抗大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校风和教学原则，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一贯优良传统和作风。圆满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培养大批革命军政干部的历史任务。

抗大是最革命、最进步新型的学校，其特点在于：

第一、抗大把改造学员思想放在首位。注重联系实际进行政治教育，使知识青年能较快地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其中很多人成为德才兼备的共产党员。在当时对知识青年采取团结、

教育、改造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强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校，军民团结，克服困难。当时毛主席教导：“现在是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是一面战斗，一面学习，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第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让学员在战争实践中学习锻炼，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经过多方面的实际锻炼，使知识青年思想发生变化。抗大培养的大批军政干部，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英勇作战，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对我人民军队的建设也起了重大作用。

第四、从实际需要出发和从严训练。从我军当时的装备小米加步枪出发，学习近战、夜战，并重视学军兵种知识。

第五、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发挥“课外学校”——俱乐部的作用，使全体人员愉快活泼地从事教学活动。

上述这些，既是抗大的特点，又是抗大的经验。今天，我军院校仍应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为我军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抗大二分校的回忆

高 克 恭

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我曾经在抗大二分校学习，距今已经四十年了。这一段既紧张、艰苦，又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使我怀念、留恋，终生难忘。时至今日，回忆起来，还是那样清晰，那样亲切，那样具有吸引力，好象是昨天的事情一样。

晋察冀边区是我党在敌后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根据地，直接威胁着敌人的主要运输线平汉、北宁、津浦、平绥、石太等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成为敌人进攻的重点。特别是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之后，日寇更加疯狂地对我解放区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等总体战，给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增加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我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英明决策。同时，为了保存和培养干部，中央还指示各根据地设立抗大分校，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干部基础。

抗大二分校设在河北灵寿县西北方的陈庄、大庄、白家河、韩信台等十几个村庄，校部设在韩信台村。孙毅同志任校长，李志

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陶汉章同志任训练部长。二分校下设三个学员单位，即高上科（营团干部组成）、附中（冀中“抗中”学生组成）、步兵团（连排干部组成）。

我原在冀热辽军区平西分区九团担任总支书记。一九四一年部队缩编时，组织上决定九团和七团共抽调二十多名营连干部到二分校学习。一九四二年二月，由我带队从河北涞水县蓬头村出发。我们首先赶到晋察冀军区组织部报到。然后组织部长王宗槐同志找我们个别谈话，希望我们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随后将我们重新编队介绍到二分校。

正式入校后，我被分配到高上科。高上科共设三个队，每队一百多人。科长由陶汉章同志兼任，副科长是盛治华同志。我所在的一队的队长是宋玉琳同志，指导员是周玉宽同志。我们高上科的学员都是营团干部，原来都备有骡马，带着警卫员、勤务员。入校后，首先把骡、马交给分校运输队，警卫员、勤务员交给警卫连，放下干部架子，老老实实当学生。

进校的第一课由校长孙毅同志作动员报告。他说：你们是抗大二分校的第五期学员，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文化和基本战术。由于敌人的不断袭击、扫荡，目前各方面的条件十分困难，大家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准备。最后，他指着我们高上科的队伍说：你们高上科的同志，恐怕在学文化方面要多下点功夫。他希望大家能发扬红军时期光荣传统，将学习搞好。

抗大二分校的学习分为“预备科”和“正式科”两个阶段。从一九四二年二月到一九四三年一月，我们在“预备科”的学习，主要是学习文化和基本战术课程。

文化课确实是个难题。高上科的学员文化基础都很差，绝大多

是数大老粗。拿我来讲，“西安事变”时，“高克恭”三个字只会认，不会写。上抗大二分校时，文化水平还是很低，念报纸还结结巴巴，写就更谈不上。这么个基础，这么个水平，学文化对我们来说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有的学员为了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急得浑身冒汗还是解不开。大家开玩笑说：认一个字，解一道题，真比消灭一个敌人还难！这话既是开玩笑也是实话。好在大家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学，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学，因此把学习上的一个个困难当作一个个敌人那样去认真对待。在学习中，我们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互帮互学。加之分校领导和教员们采用启发式授课法，由简入繁，由浅入深，由易入难，循循善诱，使学员们在文化课的学习方面成绩显著，进步很快。

军事训练分两部分进行。首先进行制式训练，其次进行基本战术训练。校长孙毅同志有相当的军事素养，很有军人风度。他对军事训练抓得很紧，要求很严。我们每次早操都是全副武装，由大庄跑到陈庄，往返八公里。每周全校会操一次，由孙毅同志亲自带操。记得一九四二年隆冬，冀西山区连降大雪。孙毅同志就带领我们跑到韩信台后山上，用雪洗脸、漱口。天气越冷，同志们锻炼的决心越大。训练时，孙毅同志以身作则，同我们一起摸、打、滚、爬。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全校会操做“虎地平身”（相当于现在的俯卧撑）。孙毅同志让教育长陶汉章同志做示范动作，他讲解。陶汉章同志直做得满头大汗。同志们看到校领导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都深受感动，个个争先恐后，刻苦训练。

我是政工干部，在部队参加战术和制式训练不多。到二分校后，许多东西都得老老实实地从头学起，自然会有不小困难。但

是，同志们像对待文化课方面的困难一样，一丝不苟，毫不马虎。不但在课堂上学，休息后回到宿舍还找军事干部学；敌人来了，就在实战中学。这样，我们很快就掌握了各种基本战术动作，圆满地完成了训练任务。

抗大二分校的学习生活之所以值得怀念、留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年军民血肉相连的深情。这也是我们当年在战争环境中，能够坚持学习的重要条件。由于敌人不断扫荡、围剿，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首先，粮食就很困难。我们高上科学员开始时还供应点细粮。冀中“五一”大扫荡后，前方不断有伤病员转来，冀中的父老兄弟姐妹及儿童、学生也不断转到冀西，我们就把细粮让给他们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以黑豆、豌豆为主要食粮的，过年过节吃到小米饭就不错了。蔬菜、副食的短缺更是可想而知。夏、秋季还可以吃到白菜、土豆，到冬春青黄不接的季节，只有很少一点干萝卜条。一个班十来个人打一盆汤，上面漂几根萝卜条，我们风趣地称之为“舰艇”。谁挟到一、二块萝卜条，就高兴地说：我找到“巡洋舰”了。

学员们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一队两个班、二十来个学员住在大庄村李大娘的院子里。她和她侄子两家给我们腾出四间房。李大娘是个寡妇，看来很苍老。她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年纪都小。我们看到她家里缺少劳动力，就常主动帮着干活，从担水、扫院，到掏粪、垫圈、耕地、收割，什么活都干。李大娘很受感动。我们当时大都二十几岁，她象对待亲生儿女一般，热情关照我们，军民亲热得象一家人一样。有一次，我拉肚子拉得很厉害，从韩信台校部回到大庄，路上就已脱水，刚进院子就晕倒了。当时，同志们都上课去了，李大娘立刻同她侄子、闺女把我抬进家

里。清醒过来时，她正在给我喂小米汤，脏裤子和上衣也不知什么时候都换成了干净衣服。过了一会儿，她女儿叫来了医生。连着一个星期，她们一家人为我熬汤煎药，做面条、鸡蛋，精心调养护理，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据当时医生讲，我昏倒后，要是得不到及时抢救护理，真有生命危险哩！

一九四二年秋，敌人又对我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二分校不得不到处转移。就是在转移的日子里，我们也基本上坚持了学习。有时上午行军，便下午学习、训练；有时黑夜行军，便白天学习、训练。到处是我们的课堂，到处是我们的操场。这一带是河北有名的枣乡。当时正是枣子成熟的季节，一串串红枣子挂满枝头。我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论宿营，还是行军，虽然枣子伸手可摘，俯身可拾，但谁也不去吃一颗。老百姓热情地给我们送来一筐筐红枣，我们一般都婉言谢绝。实在无法谢绝时，就按价付款。正是因为二分校学员干部这样爱护群众利益，才得到群众的真心支持。

通过一年“预备科”的学习生活，我们收获很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程度有所提高。学习了语文、算术、地理、历史，为后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军事理论，奠定了文化基础。二是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尤其显著的是将我们在战斗部队因战斗任务紧张而患上的失眠症完全治好。至今我们抗大的同学聚在一起，还常常谈起。我们当年由灵寿出发，全副武装，经过四十八天的艰苦行军到达延安，没有一人掉队，没有一人生病。这一成绩的取得，是与当年二分校严格训练分不开的。三是基本战术已达到熟练程度。军事训练一开始，有的学员不习惯，对孙毅同志有一些意见，嫌他卡得太严。后来在实践中，

大家亲身体会到这样的严格训练大有好处，于是对孙毅同志心悦诚服了。通过这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们这些政工干部也能够象军事干部一样，既能组织平时训练，又能更好地指挥部队打仗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我们从“预备科”转为“正式科”。重新分成三个队，进行专科训练。一队学军事，二队学政治，三队以学后勤为主，我编入了二队。刚编队不几天，敌人又扫荡了。为了保存干部，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及各分校调回陕甘宁边区。

一九四三年一月底，我们从冀西出发，在上级党组织关怀和沿途部队护送下，我们胜利地通过滹沱河、同蒲线、黄草岭三道封锁线，于三月十九日到达陕北绥德，与总校合并。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考试，我们高上科的绝大部分学生，又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到了延安，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住进了中央党校，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九八一年四月）

争取任丘伪军起义的经过

杨建新

一九四四年春的一天，在日寇和伪军统治下的任丘城里的内线关系送来一份紧急情报，说“日军黎明前全部撤走，未留营底，伪军上下混乱。”

河北的任丘县城是冀中地区的桥头堡，“平大”（北平至大明）“津保”（天津至保定）公路的中枢，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一九三九年春，日军占领了这座县城后，修的公路如网，岗楼如繁星，不时的“清乡”“扫荡”，环境极为残酷。尤其是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之后，敌人以任丘作试验地试行五次强化治安，进行惨无人道的“反共誓约”。可是今天奇怪的是冀中各县的敌人没有撤走，任丘的敌人为什么反倒首先撤走呢？是因为日寇认为伪军强大可靠，撤走后也能保住县城；是津浦铁路沿线形势紧张，需要紧急支援？还是整个抗日形势有了变化？我必须进一步弄清鬼子突然撤走地详细情况。

我当时是任丘县委敌工部长，立即写了报告，派身边的通信员给县委书记和军分区司令部送去，并约定了新的联络地点。而

后，骑上自行车，沿着高低不平的山路，到几个上层关系联络点去了解情况。太阳下山的时候，我来到城东一区东大坞的县议员李金堂先生家里。老先生身着农民服装，戴着老花眼镜，正在北屋外间的八仙桌上翻看任丘县志和河务局的治水资料。他见我进去，立即迎了出来，迎头便问：“见到情报了吗？”我说：“情报见到了，只是内容还不清楚。”“是呢！连潮如也说，有点莫名其妙？他很着急，希望能见到你。”

李金堂先生，是任丘县的开明绅士，人民群众选举的县议员，原任河务局长，后任副县长。他的儿子李宝光同志是县抗联会的秘书，儿媳妇是当时任丘县伪军司令刘潮如的妹妹。而刘潮如是任丘县军庄村人，自幼就去南方蒋管区，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一九四二年突然随日军来家乡接任伪军司令，并主动通过李金堂先生和我们接头，我们也就顺水推舟地让李金堂先生做伪军上层的联络工作。

刘潮如在伪军中没有自己的亲信，几个大队长都自成体系，不听他指挥，抢掠勒索的粮款财物也没有他的份，实际上他是个光杆穷司令。只是在一九四二年“反共誓约”后，日本人扣留下五百多青年搞感化院，交他管理。他乘机叫各村拿钱赎出一百多名，发了点横财，其余三百多人，组织了个新兵营，直属他指挥，算是他的基本队伍，但毫无战斗力，甚至枪也不敢发齐。这种处境可能就是主动和我们拉关系的原因。一年来，刘潮如在我们的争取教育下，也给我们做了一些情报工作。

为了进一步弄清城里的情况，我对李金堂先生说：“大伯，我现在没有时间见他，你是否代劳到城里去一趟？”李先生马上领会到我的意思，说：“对！我叫着亲家子奇兄（刘潮如的父亲

刘子奇，也是我县的开明绅士），就住在他的司令部，不但可摸清他的思想动向，还可以观察城里各方面的情况，随时把情报叫联络员送出来，请你指定个送情报的地点吧！”

“情报不用向外送了，你常到增义成杂货铺去，那里会有人持我的亲笔信和你联系的。”我说。

李金堂听了顿时一楞，但很快就明白了。这增义成杂货铺开设在城里十字街上，不但卖副食调料，而且经营百货、干鲜海味，还包销全县的盐碱，是任丘县最大的买卖。它是我们的地下关系与伪军三大队长张增祺合资开办的，还有伪河北省新民会长叶季孚的堂弟叶玉芳的股份，经理孟宪章、崔仲芳都是我们的内线关系，同时是张增祺的把兄弟。

我向李金堂先生交代完进城的任务、联络地点及联络方法之后，天渐渐地黑了。我搬出自行车迎着微风急速地向天宫村奔去，找另一上层关系的联络人牛大伯去了。

一进天宫村就碰见牛大伯，他六十多岁，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是个为革命事业不计个人艰危的老人。到他家中还没有坐下，他就迫不及待地说：“你来得正好。城里的鬼子又走了，张崇武请我进城，说有急事，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正想去找你商量呢！”

张崇武，天宫村人，是伪军警备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他是旧军人出身，为人阴险狡猾。过去我们曾作过争取他的工作，但他依仗日本鬼子的势力，并不怎么动心，前不久，他还杀害过我们作内线工作的同志。但他不敢伤害牛大伯，因为他知道牛大伯是任丘县白色恐怖时期英勇牺牲的著名烈士“牛氏三杰”的叔父，也是三杰亲密的战友。他在冀中区党委的首长和当地人民群众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张怕激怒我军民，对自己不利，这也

算是他为自己留的一条后路。

我和牛大伯分析，张崇武主动找我们，一定和鬼子突然撤走有关，是想利用牛大伯在军区首长和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为自己解脱罪责，把罪恶推给鬼子。同时也想试探我们对他的态度。不管怎样，这是我们争取伪军，宣讲政策的好机会。

我们商议的结果是：牛大伯可以进城，除了进一步摸清敌人内部的情况外，张崇武如有弃暗投明的意思，可以帮他解除顾虑，我们保证按起义政策办事，既往不究。和牛大伯谈话之后，我搬出自行车又要上路了，这时已经满天星斗，牛大伯问我，“光顾说话，你吃饭了吗？”我说：“没时间了。”他进屋摸出一个饽饽放在我怀里，我向老人家笑了笑，就分手上路了。

浮云抚摸着明月，夜风显得格外的清爽，我准备从天宫村去城西三区的段家坞，如走大路得绕大圈，天亮也到不了，于是只好从城根下的小路走，这样可以近几十里。在路上清楚地看到城墙上伪军哨兵的黑影在往返的蠕动，并不时发出惊叱的口令，不知他们是养成了习惯，还是为自己壮胆子。

天还没有亮，我就赶到了三区的段家坞。一条东西大街两面的墙上写满了抗日标语，路北被烧塌了的一座破门楼前，站着个大高个，老远我就看出他是我们的另一个内线刘慎忠。他从小在城里当修理钟表的学徒，敌占领县城后就给我们作情报工作。后来，他通过和伪警备队第三大队队长张增祺合伙作买卖，来作敌伪的上层工作。

刘慎忠迎上来接过我的车子，边走边说：“城里现在乱极了，伪军们互相猜疑，到处打听消息，过去吃喝打牌乱说乱道，现在谁都没话了，张增祺急于想和你接头。县委高书记，分区魏司令员

和敌工科李科长都来了。”我知道，没有大的行动，几位首长是不会同时到达的，就赶忙走进屋里。李科长一见我就高兴地说：

“小杨子来得正好，快坐下，谈谈你的意见。”虽说我是当时的县委敌工部长，可在几位首长面前还是个小兵，我把和李金堂先生、牛大伯的谈话和安排，任丘敌人的兵力部署，以及我们在伪军中关系的力量和我掌握的情况，一一向领导作了汇报，然后说：

“日本鬼子一走，城里的伪军失去了靠山，人心惶惶，已失去战斗力，咱们可以趁机组织部队攻城，我带人事先运动到城里，组织关系力量，来个里应外合，消灭敌人，解放县城！”

魏司令员用铅笔敲着桌面上的敌伪城防工事图，聚精会神地思索着，自言自语地说：“我看这是下策，恐怕还有点冒险吧！”

“小杨同志进去，内部有我们的力量，上层又有关系，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下，不会有什么危险。不过，敌人会不会把我们困住，不战也不降，拖住我们，期待鬼子返回来接应？敌人会不会组织力量突围逃跑呢？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拿下县城呢？现在敌人也急于摸清我们的意图，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谈判，争取敌人起义呢？”高书记说着，又象是提着问题。

魏司令员说：“两军交战，不可轻敌，胜在智勇双全。”

听首长这么一说，我心里顿时明亮起来，是呀！如果能逼敌起义，不是比流血解放更好吗？

接着首长和我们又一起分析了形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已到了内外交困，兵源枯竭的时候，他既要大规模“扫荡”，又必须集中兵力保护铁路运输，任丘县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一九四二年鬼子的“五一”大扫荡之后，我们八路

军化整为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到处破坏公路，捣毁炮楼，一小股一小股地吃掉敌人，迫使敌人缩在城里不敢动。现在各村都有我们的民兵组织和游击小组，敌人在全县只是一个点，而我们是一大片，加上任丘县方圆百里没有敌人的大据点，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争取敌人起义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的，下一步就是要看我们的工作了。

组织决定，派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李科长和我一起去，代表八路军与伪军实力人物“二张”谈判。分手时，魏司令员对我们说：

“在敌人心里工作，你们要提高警惕，谈判地点最好选在城外，这样离我们的部队不远，可以防止意外。为了配合你们的谈判，我们准备同时调动全县的部队和民兵进驻城防，壮大军威，造成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迫使敌人接受起义。”

这是一次不同往常的任务，要在短时间内争取两千余名伪军起义，解放一座县城，这在冀中还是第一次，我既感到光荣，又感到责任重大。我和李科长把行动的每个环节都细细研究了，并通过几条内线关系分头作敌伪中下层的工作，以保证万无一失。

经过内线关系和城里的“二张”联系、协商，确定晚上九点钟，双方在城西关接头。

夕阳西下，夜幕笼罩着古城，城外战马嘶鸣，军号声声，一派紧张的战斗气氛，这是魏司令员有意摆下迷惑敌人的攻城阵。我和李科长等几位同志扬鞭策马，穿过一道道军民防线，来到了任丘城西关，张崇武和张增祺两个伪警备队大队长已经恭候在此。一见我们，他们立刻从小客栈里迎了出来。张崇武五十多岁，留一撮仁丹小胡。张增祺才三十出头，他头脑简单，原是城关的一个地痞流氓，依仗着他妹夫前任伪司令李弼臣很快得了势，他有

一千多伪军，控制着大半个任邱县。

落座后，这两个家伙对我们大献殷勤，又是点烟，又是倒茶，张增祺还无中生有地硬扯起我们前辈老人的交情。我也将计就计，故意当着张崇武的面，表扬张增祺过去帮助我们作过抗日工作，营救过被捕干部，还感谢他送给我们子弹。张崇武这才知道他的同伴背地里和八路军早有来往，他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张增祺。张增祺暗地里和八路来往是为了给自己留点后手，想不到我们竟当面给他端出来，惹得张崇武起疑心，因而表情十分尴尬。

李科长观察到张崇武的不快，就把话题转到他的身上，“牛大伯在你那生活得很好吧，老人家为革命真是舍生忘死呀！”李科长有意向张崇武提起这件事，向他表示感谢，并讲起军区首长对革命老人的敬仰，尊重。这在张增祺听来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哪里知道老奸巨猾的张崇武也留着一手，早偷偷地将一位老革命接到自己家里作护身符了。

这番揭底加深了“二张”的互相猜疑。这时我才将谈判转入正题，可是还没等我将来意说完，张崇武突然站起来说：“李科长，杨部长，天不早了，这里不方便，还是请二位长官进城一叙，如何？”

这是一个突然的变化，看来敌人是有准备的，我们如果不同意，敌人会认为我们胆小，缺乏诚意，瞧不起他们；如果同意，我们就如同闯进虎穴，远离我们的部队，有一定的危险性。为了争取谈判成功，个人安危就顾不得许多了。我用请示的眼光看了看李科长，他点了点头，于是我坦然地站起来说：“那好吧！不相信你们，我们就不来了！”说完，我又对随同我们一起前来的

义勇中队队长崔绍宗等人说：“你们几个也一起进城看看老朋友吧！以前都是张队长的老部下嘛！今后大家到一起，你们还得听张队长的指挥呢！”

这崔绍宗原是张增祺手下的一名中队长，是去年在赵北口起义过来的，张增祺听我这么一说，当然无法拒绝，他干笑了两声说：“那里！那里！还是老崔进步，往后，还请兄弟多关照，多关照。”

进城的路上，“二张”的脚步放得很慢，他们显然是在思索对策。进城后，向左一拐就是张增祺的家。这是一幢新建的青砖瓦房，朱红的大门上贴着一幅“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不知是那位女人秀才这么风趣，给这位招娼窝赌的世家，杀人放火的汉奸选了这幅对联。我们穿过四扇油绿贴金的屏门进入正房，灯光透过粉红色的窗纱，隐约可见房上和东西厢房都布置有警戒。

“我和慎忠哥替你招待这几位弟兄吧！”没等张增祺说话，崔绍宗就陪着化装成警卫人员的敌工干部向勤务兵住的东配房去了。

张增祺以主人的姿态将我们让进正房，硬木方桌上早摆好了精致的糕点，条几上的时钟已经是十一点了，李科长在大伙的推让下，坐了上位。

谈判正式开始了，李科长向他们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八路军对他们的希望，然后请“二张”谈谈自己的打算。

张增祺心里矛盾，又想不出对策，一个劲地抓头皮。张崇武不愧是个老滑头，他咽了一口唾沫说：“兄弟有这样一个意见和二位首长商议，主要是从八路军和老百姓方面着想，如果我们拉

出去了，日军还会占领县城，残害百姓，不如我们仍在城里，明是警备队暗是八路军，等到国共大军大反攻时，兄弟愿在疆场效力。”这小子一席话，不但道出了他们的如意算盘，而且反映出对我军有顾虑，对国民党有幻想。

“等到大反攻？”我追问了一句。张崇武避开了我的目光。我又说：“时间是不等人的！牛大伯常到你那里，对我党我军的政策你听得不少了。只要你们回到人民一边来，旧账可以一笔勾销；如果指望着国民党回来收复失地，那是作梦。”我又加重了语气说：“我们多等些时间没关系，只怕拖下去对你们不利，日本人知道你们通共产党，后果怎样？两位难道没有想过？”

张增祺在张崇武目光的逼迫下，抬起胖脑袋支支吾吾地说：“恐怕，我们代表不了下面弟兄们的意见，即便拉出去，也得容个时间，三言五语恐怕不行吧？”

我明白他们是想用拖延时间，听听日本人的动静，就说：“增祺，你还是把汉奸帽子摘掉了好，司令员已经允许对你们不收枪，不改编，不调山区，不算旧账，机会不可错过啊！”

头脑简单的张增祺，有些动心了。他刚要表态，张崇武赶紧截住话头说：“今天大家都够累了，二位首长今天暂住在城里，明日继续商议吧！”

我知道这家伙又在耍花招，工作不允许我们拖延时间，我把茶杯一推，当头一句：“这么说我们算是被扣了！”

张增祺见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连忙欠身离座说：“那里话，二位首长是我们请来的贵宾，不过是为了商议问题嘛！”

就在这时，一个全副武装的伪军小队长闯了进来，大声说：“报告队长，东南城角一大队骑兵营一个班拉走了，八路军把城

包围了，正在城外喊话！我们怎么办？弟兄们等大队长的命令呢？”

“先回去！正在研究！”张增祺头也没抬，不耐烦地答复着。

张崇武吃惊地吸了一口凉气，站起来想往外走，伪军小队长拉住他说：“张队长往那去，街上很乱，到处不断地打冷枪，谁也闹不清那个是八路，还是等天明吧！”

张崇武颓然的又坐在椅子上。原来这个小队长也是我们派在敌人内部的内线，他照计划在他的防地上将义勇中队的战士运动进来，作好战斗准备。见天快亮了，谈判还无结果，既不放心，又有些急躁，想找刘慎忠打听一下消息，来到张增祺的住宅，知道崔队长和我敌工干部已将张增祺警卫队的工作作好，故意进来给“二张”施加压力的。

这一下真见效，“二张”坐不住了，额上沁出了汗珠。李科长又用逼迫的口气说：“话我已经说到了，现在司令员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到底怎么办，二位拿主意吧！”这时，城外我军的喊话声，军号声，此伏彼起；城内伪军人心惶惶，经过我们内线同志的工作，也要求起义。

张崇武见大势已去，不起义不行了，就抢在张增祺前面说：“既然首长对我们这样关怀，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张增祺也站起来想说话，可干张着嘴没有说出来。我对他说：“增祺更没有问题了，过去常说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回咱们算到了‘古城’了。”

李科长见谈判成功，从座位上站起来，环视了一下四周说：“现在我宣布司令员的命令：任丘县伪警备队改称冀中军区抗日

义勇支队，张崇武任支队长，张增祺任副支队长，立即开拔石门桥水月寺完小听候司令员讲话。”张增祺拍了一下我的后背，在我耳边小声说：“咱那刘司令怎么办？”这时，正巧刘潮如在两位老者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于是我当众向大家说：“魏司令员已经答应了潮如兄留在敌工部工作，叫崇武和增祺带兵的请求。”

天亮了，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我军一弹未发解放了任丘县城的喜讯长了翅膀，传遍了全县，传遍了冀中平原，一面鲜艳的大红旗在任丘城头迎风飘扬，被敌人盘踞了五年之久的任丘古城如今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在黑雾中战斗

张持平

一、上第一课

一九三七年初夏，日本东京中共特别支部代理支书王孔昭同志突然被日本当局借故驱逐出境。我们特支留下的几位党员，是多么渴望能和北方局快点重新接上关系，继续坚持斗争啊！

没有多久，国内爆发了七·七芦沟桥事件，和党失掉了联系的我们从日本新闻社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关头，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就在这紧急时刻，我们几个党员和左翼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在一起共同研究，决定动员全体留日同学，有组织地，分批地回祖国参加抗战。

尽管日本秘密警察在注视着我們，经过半个多月紧张工作，我们终于开始陆续回国了。我是第一批，以后每两、三天一批。我们好几批同学回到上海，踏上祖国的土地。

刚刚来到上海，就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要抗战，二是要吃，要住（因为抗战突然爆发，我们急于回国什么都来不及准备）。

怎么办？由于党的关系没有接上，我们不得已求助于全国各界救国会（下简称救国会）。一九三七年八月初，决定成立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作为救国会下的一个抗日团体，进一步激发留日同学强烈的抗日要求。至于吃住问题则要求国民党社会局解决。后来我们就住在霞飞路（即现在淮海路）青年中学，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出墙报、街头演讲、募集救国捐款。八·一三抗战，我们又参加慰劳难民和救护伤员等工作。

岂料我们进行这样一些最起码的抗日救国活动，都受到表面上标榜“抗日”的国民党当局的所不许。他们百般刁难，甚至威胁说，如果再不停止这些活动，国民党社会局潘公展局长就要我们搬出青年中学，停止供给伙食。那时，八·一三战火正在上海燃烧，上海人民无不同仇敌忾，我们责问国民党社会局：我们连抗日的基本权利都没有吗？那么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话，到底算不算？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给刚从日本回国同学上的重要的第一课。

二、往哪里去

眼看上海快要失守，我们几百个留日同学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往哪里去？那时虽经一个多月的奔走努力，党的关系仍然没有接上。《救国会》来同我们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联系的是何干之先生。从谈论中，我们感到他大概是个共产党员，但大家都不敢暴露。当时，留日同学要求有组织地撤出上海，提出三条出路：到延安去；组织救亡宣传队；下乡搞流动宣传队去；到南京要求国民党教育部分配抗战工作去。经过多数同学讨论，加上何

干之的指点，认为打进国民党军政机关，争取合法的地位，开展抗战工作，较为有利。我是这样认识，留日同学救亡会的骨干和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认识。但谁走什么路，都由自己选择，共同的目标是，大家都继续走抗日救亡的道路。

三、送文书

抗战的烈火越烧越旺。从上海北站到南京的火车已经切断一部分了，我们通过各方的交涉，国民党社会局被迫答应我们从上海西站经嘉兴到南京，在炮声隆隆，飞机袭击下，我们一百六、七十同学登上火车，一路上我们时而唱抗战歌曲，时而讨论形势，时而商量如何与国民党教育部交涉。个个斗志昂扬，充满信心。正在此时，来了一个自称是邹韬奋弟弟的人，找我和姚耐，他问我们到南京去准备怎么办，我们回答是要求国民党教育部分配我们留日同学到各个抗日战场去，我们是留学生又会说日语，对抗战是能起有益的作用的。“除此之外还有熟人吗？”邹向轩听我们说完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说没有。但我心里早想好去找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这是不能对他说的。“我准备介绍你们去认识《救国会》沈钧儒先生，他可能会对你们作某些帮助。”韬奋的弟弟又说。听了他的谈吐，感到他的话是真诚的，可以信赖的，我们说：“谢谢，请你写个介绍信。”我们非常感谢旅途中送来一个文书。虽然事隔四十多年，至今记忆犹新（近日我从韬奋夫人沈粹真处了解，韬奋是有个弟弟叫向轩，曾到过延安，是个共产党员，当时我们碰到的就是他。文化大革命时被“四人帮”迫害，含冤致死）。

四、总算谈判成了

国民党教育部把我们安置在南京一所停课的中学里。对我们提出分配工作的要求没有作任何回答。同学们很感焦急，我作为一个党员考虑到如果这样下去，旷日持久，可能涣散人心，更是焦虑不安。于是我和姚耐设法找到了沈钧儒先生，在场的还有他的秘书何伟（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长）。我们表明来意，希望沈老先生向国民党教育部反映和推动一下。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们两个青年人，并表示大力支持。日后，我自己偷偷地去找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主任，出来见我的是李克农同志。我认定办事处里的同志一定是共产党员，当时我就象回到母亲怀抱一样，感到说不出的欢喜和高兴。我首先介绍我是党员，是怎样和北方局失掉联系的，并恳求早日接上党的关系，以便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又向他谈了一百多个留日同学来南京的目的和要求，谈了曾见过沈钧儒先生和何伟，我们要求国民党教育部分配抗战工作，这样做对吗？李克农同志很热情、很简洁地回答：“你是党员，请写明失掉关系的经过，我去北方局询问。你们可以向国民党教育部提出要求。通过沈钧儒先生疏通，这样很好。以后少来这里，因国民党监视得很厉害。李克农同志很机警而又诚恳的谈话，给我留下了一个久经锻炼的革命者的形象。

我们一连等了几夭，分配工作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为减少同学们焦虑情绪，我们组织同学到郊区作救亡宣传，晚上组织歌咏活动。有一天晚上，请来一位刚从东北逃亡到南京的青年学生来唱《松花江上》，当唱到：“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

能够看见我的爹娘……哪年哪月才能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我们大家伤心得都流泪了，心都碎了，我们抗战意志更坚定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们真是耐不住了，我和姚耐再次去找沈钧儒先生，恳切地说明我们心急如焚。上海失陷，苏杭危急，国民党教育部为什么不理我们？沈老先生告诉我们，他已见过教育部长陈立夫，说是要留日同学派三名代表去谈判，经过训练才能分配工作。我们感到有了一线希望，但必须作充分准备。于是留日同学经过讨论，选出三名代表。为了使谈判更有把握，共同商讨出我们的意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反复进行考虑。而后，我单独去找李克农同志，征求意见，他支持我们的做法。叫我们依约去谈判，并给我分析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大约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上旬，姚耐、李肇嘉和我作为留日同学代表，按约定时间和陈立夫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陈立夫提出：第一必须经过考试才能进行训练班（实质上他们想利用考试，把学生中的先进骨干筛掉）；第二，学习时间三个月；第三，训练内容抗战国策和军事常识。我们回答：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不必考试，抗战危急，三个月太长，最多一个月就够了；我们同意训练内容。谈判结果是：一、不考试，自愿报名，政府登报，由我们写信给同学动员参加；二、时间为期三个月（我们作了让步）；三、名称叫留日同学训练班。在正式发表时改为“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同学特别训练班”（下简称训练班）。这次所以能谈判成功，是他们迫于当时抗战形势，同时，国民党想通过训练班拉拢留日同学为他工作。

五、在训练班里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训练班在南京孝陵卫开始了，约有五百名留日同学参加。从开学到我逃离，在训练班里一直贯穿着我们要抗日，国民党要妥协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是当时形势的产物。

在与陈立夫谈判结束后，我们曾立即向克农同志报告。他鼓励我们去参加。训练班开办十来天后，训练班又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我又化装去见克农同志，向他请示在那里如何工作，在尖锐复杂的情况面前，必须得到党的指示。同时询问我的党的关系接上没有。李克农同志说：北方局没有回答，你以后和我联系吧，没有党组织，遇事多和同学商量。他为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妥协、投降、失败主义是主要危险。我们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上海要坚决死守，但上海是守不住的。如果真“死守”，那就等于“守死”。撤退是为了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后来，他给我几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解放》杂志、《新中华报》。我带了这些党的书报回到营房，也正是这些书给我们带来党的指示。

为了便于活动，我建议成立核心组织（是党的外围组织）由姚耐、李肇嘉、刘笃、邵敬勋和我五人组成，共商训练班的重要决策和活动方式。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进步同学，团结广大同学到抗日战线上来。

训练班约有五百人，设一个总队、四个大队，另有一个妇女队。训练班的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陈立夫，班主任是张道藩，副主任鄧悌，总队长是郝鹏举，大队长、中队长都是国民党骨干，直接管我们的班长是国民党宪兵学校毕业生，至于混在学生中间

没有公开身分的人有多少，我们无从晓得。在这种环境下，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斗争。在抗日高潮中，那些人又将如何呢？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抗日的，许多人还是东京左翼同学的骨干，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虽然复杂的斗争还在后头。

为了便于活动，首先争取直接管我们的班长。一面我们要努力学习军事，把基本军事教练内务搞好，同时对他们进行抗战救国的教育。不到一个月，我们的工作收到了一点成效，那些班长认为留学生挺尊重他们的，是抗日的，爱国的。

第一个回合的斗争是从反对亡国论开始的。上海失守后，副主任鄧悌对全体同学“训话”，他说：“中国不能与日本打仗，现在上海失守了，沪宁吃紧，再打下去，一个半月就要亡国，我们武器不如日本，没有不失败的……。”散会后，我们针锋相对，高唱“奋斗抵抗，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驳斥亡国论，失败主义，唯武器论。我们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暗藏在同学中间的特务也开始活动了。他们时而暗中搜查我们的口袋，时而注意我们看什么刊物。一天有个留日同学从南京城里来训练班采访我们，忽然训练班来了个紧急集合，对学生进行全身搜查。当时我身上正藏着有一本包好封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当我意识到可能出事，已经要搜到我了。我沉着地把书大大方方拿出来给宪兵班长，他翻了一页又一页，想从中找个什么夹着的東西，但没有看内容，就还了给我。后来，我们得知国民党的命令是搜信，不是搜查书。

第二个回合是反对汪精卫的投降论。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要来训练班做抗战形势报告。报告前规定：不准走动，不准说话，要整齐严肃。当时我们已知汪是亲日派，投降主义者，怎

样破坏他的讲话呢？那是一个深秋，天气已经转冷，但棉衣尚未发下，汪刚讲几句，我们按事先约好，由一个人先咳嗽，全场学员也咳声大起来，搞得满场嘈杂，大家好象因天冷而伤风，有的同学还蹙起地板，秩序大乱。汪精卫反复讲什么我们武器差，到处打败仗，英美是白色帝国主义、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中国又是一盘散沙，结论是抗战非失败不可，只有投降，中日亲善才有出路。我们后来反复想，这一回合的斗争在策略上是成功的，可是在总体上却暴露了我们自己力量。

第三个回合是批驳不伦不类的“唯生论”。教育长陈立夫，以“唯生论”的伟大发明者自居，大肆宣扬他的哲学。标榜自己既反对唯物论，又反对唯心论，从而创造个“唯生论”的新体系。经我们研究，在抗战第一的前提下可以各抒所见。我们采取了他讲他的，我讲我的。我们的许多同学都学过辩证唯物论，我们认为哲学只有两大体系，即唯物论与唯心论，唯生论只不过是唯心论的变种，不是什么新发明。这叫“不伦不类”的东西。最为可笑的是陈立夫每每上课，讲中国哲学思想史，胡诌“唯生论”贯穿始终。为了赞美“唯生论”，就说古代某某哲学家，真“伟大呀”，上一节课，不知讲多少“伟大呀”三个字。我们同学为陈起了个代名词叫“伟大呀”，作为对陈立夫的“唯生论”的讽刺。令人可笑的是，国民党教官也跟着我们叫“伟大呀”，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对陈立夫的一种讽刺，真是笨蛋。

开学不到一个月，南京吃紧，训练班奉命撤到庐山海会寺去。临行前，我乘忙乱之际，又一次化装去找李克农同志，请示撤离南京后如何接头，并汇报了我们的斗争情况。他告诉我，八路军办事处也要搬到汉口去，今后接头有困难，要独立作战，要

注意斗争形式，从长期打算，我们不能见面，你可以到书店买《解放》、《群众》两种杂志，我们党的言论方针在那里会发表的。临走前，他又送了上述几本刊物给我。至于如何联系，他没有说，只告诉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

第四个回合是三民主义讨论会。我们于十一月底搬到庐山去。到了新地方，训练班的国民党下面人马依旧，但上面的头子换了。由于国民党内部斗争，陈立夫失败，康泽取代了他。凶神恶煞的康泽在庐山第一次给我们“训话”就破口大骂：你们学了一个多月军事，就连普通的立正、稍息、敬礼都没有学好。以后又骂八路军平型关大胜是吹牛，日本军上了当。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等。会后，我们一些同学也和康泽争论，但方式上比在南京是隐蔽得多了。为了澄清思想上的某些混乱，宣传抗战必胜信心，我们利用训练班搞的三民主义讨论会，事先组织同学发言，针对国民党当时提出的问题，逐一予以澄清。有好几个同学分别演讲，指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应当反对民族失败主义。要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要坚决进行全民族抗战，多打胜仗。民权主义应当开放民主，还政于民。民生主义应当改善民生，反对欺压群众。联俄、联共、扶植工农是孙先生三大政策。对外应当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苏联援助我国抗战、不是赤色帝国主义。国民党党部指导员原指望通过三民主义讨论会来宣传国民党解释的假三民主义，结果我们利用此机会宣传真三民主义。他们又是一大失望。

第五个回合，抵制强迫利诱集体加入国民党。训练班总队长郝鹏举在全体集合的大会上宣布：奉令，凡是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同学特别训练班的学员都要集体参加国民党。限几天内办好手

续。这又是国民党的恶毒手段之一，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说参加党派应当是自愿的，信仰什么，加入什么党，不能强迫，更不能集体参加。如果可以这样做，国民党可以下令全中国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这个党又将有何用？在全体同学的反对下，没有人愿意参加，几天办不成，集体参加的做法又破产了。至于有没有个别参加，我们不知道。后来郝鹏举说，你们留学生真难搞，如果是军队，一个集合，一个举手，就解决了。什么自愿，什么选择，花样真多。

第六个回合，反对造谣诬陷。我们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的十分注意。有一次国民党女指导员、党部负责人找我谈话，说我关于民族主义理解有错误，要我收回讨论会上的发言，我据理力争，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点不错，大家争论不休，最后我说：历史将会做出最后的裁决。自此后，我渐渐注意到国民党特务在跟踪。在一个清晨，突然宣布，打扫营房，整理好内务，剃好头，忙得浑身是汗。我累极了，想洗澡，可没有水，就跳进露天游泳池游泳，时值隆冬，水冷刺骨，有人跟着我，我以为好奇。洗好后，突然发出紧急警报，我们以为日本飞机袭击赶快隐蔽。警报解除接着就是紧急集合，宣布蒋委员长要以校长身分，给训练班学员训话。我随队伍进入大礼堂，本来我们的队伍应排在前头的，突然命令向后转，一下子把国民党干训团摆在前头。我们就感奇怪。队列未定，忽然一声“立正”，但不见蒋校长出来。突然搜身，然后把我带出礼堂（后来才知道姚耐也被带出来）送到大队部，在我的质问下，大队长说：有人（特务）曾跟踪你几天，今天一直跟你去游泳池。看你是否到游泳池取炸弹，有人告密你要谋杀蒋委员长，故意把训练班人员调到后面，然后

把你带出去，这是为了保证校长安全。我听后又气又笑，对无中生有的造谣提出抗议，要郝鹏举在大会上宣布这是造谣诬陷。在学员们的压力下，郝鹏举被迫宣布：今后不可以无中生有，造谣生事。

六、又要再迁

在国民党消极抗战，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庐山也不保险了。不到一个月（约十二月初）又下令迁至湖北荆州（江陵），在途经汉口之际，我乘一空隙时间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同志，向他报告，我在训练班里已经暴露，恐怕坚持不下去，万一呆不下去如何办？克农同志要我们尽量隐蔽，不要暴露，从长打算，实在呆不下去，就出来吧！因为船停不久，不可多谈，我匆匆走了。

到了江陵，没有营房，我们住得很分散，条件也越来越差。前方危急，后方松散，何日结业，何日到抗战岗位上去，只有天晓得。训练班原定三个月毕业，眼看就要到了，但分配的消息杳无音讯。康泽为训练班的宪兵班长没起作用，全换掉。为了加强他的政治攻势，准备派托派叶青当我们的高级政治教官，对那些“优秀分子”（指学生中的抗日骨干），要提前分配“工作”。课也不上了，军事训练也不正规了，每况愈下，这时我思想上波涛翻滚，怎么办？怎么办？

七、逃出江陵找寻援助

许多同学满腔的抗日热情，受到沉重地打击，结业遥遥无期，思想上非常混乱，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时的活动更困难

了。我和姚耐商量，我先逃出江陵，到汉口寻找援助去。决心已下，就装病住临时医院，事先我察看了城门守卫，选定出城地点，第二天就化装出城。由于我的行李中有日文书，北门守城的千训团发现我是训练班的，便押送我去城防司令部去，幸好那位押送我的士兵还有抗战良心，我晓以大义，他托辞把我放了。一不做，二不休，我从小北门出不去，就从南门出。这次接受上次教训不带任何东西，果然大摇大摆走出江陵。第三天跑了一百多里路，第四天来到公路小站，没有客车。小站负责人是广东人，我就利用同乡关系，乘上军车到襄阳去。在襄阳，我又认识一个原来曾住在江陵的国民党中校军医官，经过许多试探，知道他同情我们的处境，后来我们一起到了汉口（姚耐和约十位同学经过他的帮助都逃出来了）。

到了汉口，立即就去找李克农同志，他看见我逃离江陵到汉口，批评我这样做太暴露了，当时我听到这些批评还不服气，认为国民党不准我们抗日，我们怎能留在后方的虎口里，你不是曾说过呆不下去，可以出来吗？克农同志不跟我争论。介绍我去找沈钧儒先生，通过他想办法声援留在训练班的同学早日结业。

沈钧儒先生找了各界知名人士，其中也有党的负责同志，共同为我们大声疾呼，揭露康泽禁锢留日同学训练班学员，不准青年抗日。呼吁让留日同学早日结业，奔赴抗日前线。

在汉口住了十来天，我被沈钧儒先生介绍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当教授，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我在临汾西北的刘庄找到了王孔昭同志，当时他在北方局工作，经过他的证明我立即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并由组织决定仍回到“民大”工作。

相隔数年，我了解到留在荆州同学为争取抗战权利闹学潮。

康泽因破坏陇海抗日战争前线，又加上禁锢留日学生不准抗日，引起社会公愤，被撤了训练班主任的职。此后不久，训练班的学员们结了业，分配工作。

解放后，又碰到不少训练班的老同学，谈起过去那些同学的去向，据闻，有不少同学在训练班后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干部；多数人为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先后离开了国民党军政机关，做了不少有益于抗战、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也有些人为国民党收买，做了坏事。

（一九八〇年四月）

皖南事变的枪声

石 平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打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罪恶枪声，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在这次事变中，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到了不幸，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今天，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当年事变爆发时的情景。

事变发生之前，我从连队文化教员调到教导总队俱乐部做宣传工作，每天排练告别皖南的小歌剧，思想上作了离别皖南的充分准备。

元旦开始，个人的一切准备也已完毕，每人还发一把雨伞，一条米袋。公家的东西一律原封不动，一有命令，立即出发。

记得一月四日，天还不亮，各单位开始列队行军，我们教导总队留下来一同走的大约还有八百多人，俱乐部是一个分队。我们从住地中村出发，直奔章家渡，从章家渡过河就和军部直属机关会合了。前后有战斗部队，机关在中间，据说总共不过一万人。但是整天下着小雨，山村小路很滑，担子又多，路上拖泥带水，实在难走，走到天黑才到离章家渡不过几十里路的茂林村。

由于部队士气很高，又是刚刚出发，同志们的情绪非常活跃，在雨底下走两步晃一晃，跌倒了哈哈大笑，一路上还唱着“别了三年的皖南……”

直属机关当晚在茂林宿营。因为浮桥断了，后续部队大多数是泅水过河的，棉衣都已湿透，机关人员主动帮助泅水的同志烧火烤棉衣。我们俱乐部的同志忙着布置晚会节目。晚饭后演出了几个文艺节目，为一天的行军减少疲劳。

第二天，全军都从茂林出发，走着，走着，就见不到人烟了。雨越下越大，天黑时，我们进住一个山谷小村里，乱糟糟地吃了一顿饭。情况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七日这一天，机关、部队就在原地转来转去，几天的雨下个不停，前方已经有枪声了！当时只知道国民党早已守在山头上不准我们通过，却不知道已经有大量敌人部队调集在我们的周围了。枪炮声渐渐靠近，主力部队要调到前面去作战，一会儿前，一会儿后，把我们的后方机关弄得乱七八糟，刚集结好，又被路过的部队挤散。两天后，后方的人员、马匹和担子遍山都是，非常狼狈。

我记得第四天一连横跨四十几道河，其实是一道长长地狭谷山溪。到处都是枪声炮声，大家搞不清对面枪声究竟是敌方还是我方，因为没有正确的消息。反正一听到枪炮打到我们人群中，大家就自动分散隐蔽。这样几次一乱，伞和米袋也都丢光了，仅有的生米也全嚼光了，又冷又饿，但无一人产生惊慌情绪。我们大多数都是年青力壮的干部，很希望直接参加战斗以便摸清情况向山外突围。

大约在事变的第五天，我们教导队的工兵队在东流山与强大的敌人反复争夺而伤亡殆尽，下山的几个学员向余立金主任作了

汇报。部队正在徘徊之际，我们的军长叶挺同志来到高滩村，向集中在山沟里的队伍（连主力部队在内不到一千人左右）作了一次简单的动员，他慷慨激昂地说：“国民党背信弃义，自己不抗日，专门制造摩擦反对共产党，企图消灭我们新四军，现在已到最后关头，我们如果不冲出去就会全军复没。大家立即轻装，一路突围，翻过背后这座山就是石井坑，到了那里好好整顿，吃饱饭，突围出去才有生路。同志们！生死存亡就在这一冲，到了苏北一切都可以补充。我们是革命军人，是永远也消灭不了的！……”说完，他由余立金同志陪同，带头朝着山上正在向我们射击的敌群冲去，大家也丢掉背包，不顾一切地涌了上去。冲上对面的山岗，绕道几十里，一鼓作气冲到石井坑村周围，我们才停下来休息。

各部队都向石井坑集结，人多，村小，上级宣布用高价收买粮食、牛羊，好好吃顿饭再走。主力部队分到一些牛肉。次日，敌人大部队又占领了南面几个山头，架起炮集中向石井坑开火，小村庄成了一片火海，散在村外的人员各自向山脚下的水草沟里躲避。有的同志为了工作，只好在炮火下来来往往呼喊。黄昏之时，有人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今晚各自向大康方向（北山）突围，不准擅自乱动……”

同志们听说可以“各自突围”，个个信心百倍，各部门在枪弹横飞的情况下召开了各种会议，编好了突击队。我本来是临时的政治干部队队长，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什么人，他们自动跟别的队编在一起了。一大批女同志也各自分散了。我躲在深草里睡着了，天黑定以后，我被冲杀声惊醒，立即随最后一批部队冲上陡壁大山，一整夜才爬上这座杂草丛生的乱石山岗。下山，不少

同志为了图个迅速，就坐在小竹林上一滑到底，棉衣、棉裤后头都磨光了，有的同志半身是血也无法擦洗。

我们翻过这座大山，集结在山谷里等待向山外突围，多数同志下山后隐藏在丛林中。军部和教导队的几百个同志都在空场上来来往往地活动着，我们想听听余立金主任的主张，但始终听不到一点消息。到了中午，突然从对面山沟里出来一个国民党军官，他一面向前走，一面大喊：“中国人民不打中国人！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决不能自己打自己，请你们派一个高级军官到我们一〇八师来谈判，我们掩护你们出山……”教导队的余主任马上出来表示欢迎，问他什么条件？这个自称副官的来使说：“只要你们结集统一行动，我们这个师保证你们的安全。”消息一传出，人们顿时骚动起来，有的认为一〇八师是东北军，他们受到感动而支持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的真心话；也有不少人说：“完全是假的，不如趁机冲出去。”余主任手持大刀，高呼：“不许乱动！听指挥行动，谁要乱动，我砍他的头！”又通知旁边的人喊大家下山。大家心急如火，谁不想得到机会冲出去哩？有几十个比较老练的同志一面集合，一面嘟囔着：“我们走！什么谈判不谈判，不愿上当的跟我们冲出去！”于是一批勇敢的战士自动地跟上他们的队伍走了，余主任挽着袖子舞着大刀也制止不住这批人。他们很可能乘着这个空隙冲出去了。

过了一会，余主任他们派了几个人随这个军官谈判去了，我记得军部黄诚同志也是谈判的代表之一，大家抱着一线希望，目送他们进入山林。

谈判的人走了两三个小时还不见动静，开始有更多的人怀疑了。敌人为了制造假象，把一部分重机枪架在我们周围，机枪

手一个个站在一旁和我们交谈，根本不象有战斗任务的样子，我们的同志深受迷惑，出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上圈套了。

到了黄昏，人们等得非常心焦，可是一点谈判的消息也听不到，人们议论纷纷，说是谈判的人可能被扣留了……。事实也是如此。

天近黑了，大家又饿又冷，躲在山脚下瞎估计。突然，摆在面前的轻重机枪都撤走了，隐藏在四面八方的密集火网对着我们这些毫无准备的人群猛烈射击。顿时，整个山沟火光冲天，照得象白昼一样，什么都看得到。我们只好急急忙忙地往树林子里钻。这一阵炮火，可以说把我们的机构彻底打乱了，真是死伤遍野，死里逃生的人不多了。

爬上山以后，伸手不见五指，我在一个山岗上听到不少教导队的老熟人在讲话，其中现在还活着的有：陈安羽、陈维成、王羲亭、阮世炯、蔡和昌、张坚立等，他们中有人主张组织临时部队向山下冲。

当夜，我们这支小分队绕过敌人的几个哨所，摸到一个可以通到山外的狭谷口，但被守山口的敌人发现了，敌人一面大喊：“缴枪不杀！”一面用火力的封锁了道口。当时如果不声不响、灵活作战是可以冲过去的，但是多数人无战斗经验，大喊：“冲啊！”“杀呀！”暴露了自己目标，反而当了俘虏。我本来已经冲到山外了，结果山口桥头上有几个哨兵把守，不便弄清河水深浅，于是就地钻进桥边深草里待机寻路。可是一等几天（从太阳升落计算共是三天），也不敢动一动。人渐渐昏沉下来，只听到对河村上天天打人。

第三天下午，村上的部队出发了，他们也唱新四军东进歌，我

开始迷惑起来，以为是新四军主力部队来救我们了，桥上的哨兵也向后撤了。突然有个国民党兵在桥头上喊哨兵下山，我误为自己人，主动开口问他哪一部分？这个士兵很沉着地答复我：“我是五十二师机炮连传令兵，队伍都走光了，你赶快跟我们一起走吧！”他还不知道我是新四军，可是就在这之后，我遇上了这个连队最后下山的一个班，被他们发现抓住了。

我被押到连部和几个最后搜山抓来的同志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层层向上押送。送到太平山口镇第三战区战俘营时，我才知道我们将近一千人被抓来了。我们是最后的十多个被俘人员，分散到已编好的各个队里被一同看管。

之后，我们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在那里同世界上最残酷的法西斯魔王们展开了更加艰巨的斗争。

第一个中共广西省委

黎 晓 沧

中共两广区委于一九二二年在广州成立，担负着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和南洋地区的革命领导工作。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一九二五年秋中共两广区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同志秘密亲临广西梧州召开会议，指导广西的革命斗争和建党工作。是年十一月两广区委派龙启炎同志回梧州建立了广西最早的一个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这是广西的第一个党支部。

在中共两广区委的关怀和领导下，梧州的党组织发展很快，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已建立了四个党支部，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共梧州党委会。同年六月间梧州党委会改为梧州地委，旋又改为广西地委，由谭寿林同志任地委书记。此时，中共两广区委及广西地委先后派中共党员陈勉恕、黄日葵、严敏、罗少彦、罗如川等同志到南宁共同筹组南宁地委，不久便成立了南宁地委，由罗少彦同志任地委书记。同时广西地委派陈洪涛、余少杰等同志到右江进行建党工作，派关育培、李家仁等同志到柳州筹组柳州地委。在反动政府统治下，那时在梧州的党组织多次被破坏，广西地委

书记谭寿林同志也被反动派捕去。“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中共广东省委派廖梦樵等同志到梧州建立中共广西特委，并由廖梦樵同志任特委书记。可是他后来也被反动派逮捕，党组织和党的工作都遭到极大破坏。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爆发了，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广西籍的中共党员陈勉恕、朱锡昂、俞作豫、朱光、朱仕华、梁君怡、黄嘉谷、黄懿仁、梁章云、张罕因…等和共青团员梁乃全、黎汉昭、黎三林、黎晓沧、梁绍坚、梁志荣……等。起义失败后，起义战士分路撤退：其中一路是我们桂籍参与起义的同志，大多数转移到香港，听候中央和广东省委在港负责同志的指示。经过朱锡昂、俞作豫等同志多次联系、请示，中央及省委在港负责同志决定派朱锡昂同志为中共广西临时省委书记，带领我们这一大批参加广州起义后退到香港的党员、团员和革命同志回广西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和地下革命斗争，并指定中共广西临时省委领导机构设于广西北流。这一指示是由广东省委委员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杨殷同志到香港太平山下的俞作柏公馆通知朱锡昂、俞作豫等同志的。在此之前，中央及省委在港负责同志曾派陈勉恕同志回桂建立中共广西省的领导机构，可是他行至雷州半岛却中途折返香港，故接着改派朱锡昂同志担负这一重责。

党派朱锡昂等同志回桂，在北流建立中共广西省委领导机构这一决策，有其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因：

一、在“四·一二”前，广西只有中共广西地委、特委的党组织，尚无中共省委领导机构。而革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地崛起，革命怒潮风起云涌。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初，广西革

命力量鼎盛时期，不仅梧州、南宁、桂林、玉林、龙州等地有学联、妇联，而广西全省已有三十多个县相继成立了农会，全省共有农会九百余个之多，有些还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梧州成立了轮船、机器、力行、建筑、旅业、印务、洋务等三十个工会，还组成了梧州工会联合会，拥有会员万余人。南宁组成了海员、印刷、苦力、餐楼等三十多个工会和南宁市总工会，总共拥有会员八千多人。其余各城市亦多成立了工会。各地农会、工会都积极活动，开展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右江东兰、凤山各县在韦拔群同志发动和领导下农运声势尤为强大，他在一九二三年间就已率领武装农民三次攻打东兰县城。可是“四·一二”事件后，各地许多中共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党组织、工会、农会亦多被破坏。为力挽狂澜，集结、恢复和壮大革命力量，酝酿下次革命高潮，客观形势迫切要求建立中共广西省委的领导机构。

二、当时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城市暴动，迭遭失败，损失巨大。农村是反动势力薄弱地带，形势迫使革命者由城市转入农村。中共广西省委不设在梧州、南宁等城市，而设在内陆农村地带的北流，是这种历史条件所促成。

三、“四·一二”前，俞作柏在广西秉政多年，并与工农结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声望，在他的原籍北流尤多社会关系，而他家又藏有大批枪弹。他自愿竭诚襄助，这个有利条件可资借助。况且俞作柏、俞作豫的姑表李明瑞那时在桂军中任师长，掌握着军权，因俞作柏与李宗仁、白崇禧有隙，俞作柏之弟作豫既被白排挤，李明瑞亦深受歧视。李明瑞同情革命，与俞协作，策划他倒桂，实一有利于革命的战略措施。

四、当时留港候命回桂的中共党员、团员和革命同志大多数

原籍北流、博白等县，熟悉地方情况，易于开展工作。而预定作为中共广西省委领导机构地点的黎家庄屋主黎衍同志又曾在广州求学，是个共青团员，他素仰彭湃同志的革命精神，有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坚强意志，接应、掩护革命同志足以信赖。而且北流经过上海“五卅”惨案和北伐时热火朝天的反封反帝运动，和中共党员宁培英、梁藻生、郑晴山等同志在县内开办农讲所，培训革命干部，并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早已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些都是深得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

故中共广西省委领导机构之设在北流就成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顺时乘势的历史事实了。此后广西的革命历史发展和革命新局面的迅速打开都充分证明了当时党的这一决策是极其英明正确的。

朱锡昂同志接受任务后，即指示我们这批留港候命同志分两路回桂：朱锡昂、俞作豫、朱光（解放后任广州市长）、容天、陈为民（以上两人广东人，叶剑英同志任团长的教导团学员，是参加广州起义后转移到香港的）、梁君怡、邱桂馨、梁乃全、林鹿鸣、张罕因、黎汉滔、黎三林、黎晓沧、梁绍坚、梁志荣等十余人，佯作各不相识，扮商人，分数组，搭法国邮船赴广州湾（今湛江）。到赤坎后，又分数路前进，约定同到北流城郊黎家庄集合。朱锡昂、朱光等先回博白；俞作豫、邱桂馨等去六万大山，策动绿林武装；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则取道梅绿、化州、宝圩。当我们到达梅绿时，因带有革命书刊和个别同志线衫上有商标红影子，梅绿伪警备司令部疑为参加广州起义留下的标志，竟把我们扣留起来，后几经折腾始得脱身返北流。黄嘉谷、梁章云等同志则取道梧州。一九二八年农历小年夜的前一天，即公历一九二八

年一月十四日各路同志都一齐到达了北流城郊瓦窑头黎家庄集合。

翌日，正是是年农历小年夜那天，朱锡昂同志在黎家庄召开了回桂后的首次重要会议，除所有我们从香港回桂的同志和屋主黎衍同志出席外，黄嘉谷等同志经过梧州时联系好的邓拔奇、董铨汉两同志也专程赶来参加。会议由朱锡昂同志主持，他首先叫全体起立为广州起义死难烈士沉痛默哀，然后分析形势，讨论、决定今后工作方针是秘密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发动、组织农民，开展工、兵、学、妇运，发展革命力量，组成革命武装队伍，为建立人民革命政权而奋斗，最后具体分配工作任务。会后各同志即分头出发积极进行活动。中共广西临时省委领导机构就设在黎家庄内，朱锡昂同志长住那里，指挥全局。俞作豫、邱桂馨、黄嘉谷等负责兵运兼农运，我们常往来于北流附城、岭洞、新圩、大小莲塘和玉林成均、樟木、六万大山等地，筹措枪械弹药，策动伪兵、绿林。朱光同志负责博白县的发动、组织工作。黎三林、黎汉炤、林鹿鸣等同志往返于卢圩、来宾、贵县、陆川等县进行联系和组织工作。其余容天、陈为民等同志都在附近各县搞农运。张罕因同志和我起初是在北流二厢塘岸、九代坡一带搞农运，后来朱锡昂同志指派张罕因同志为中共广西省委的交通联络员，他常往来于邕、梧、桂、柳等地（当中共广西省委委员昌景霖在梧州叛变时，朱锡昂同志曾派他赶往南宁通知余少杰等同志迅速转移。后来他还出席过在南宁某村召开的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邓斌即邓小平同志曾代表中共中央到会指导并讲话）。我搞了一段时间农运后，也随同俞作豫同志搞过兵运，后来朱锡昂同志留我在中共广西省委搞秘书工作。那时广西省委的重要文件如

《农民运动宣传大纲》和《劳农会章程·会员证》等就是朱锡昂同志草拟经我誊写印发的。黎家庄屋主黎衍同志一面负责掩护党的领导机构，一面跟当地的贪官污吏、豪绅阔少鬼混周旋，假借花天酒地，呼卢喝雉，刺探敌情。

那时中共广西省委在北流街上设有两个对外联络处：一是经营土产买卖的“华丰”行。外来的人必须先到那里，经审查后始能引见朱锡昂同志。该商行的招牌“华丰”二字即俞作豫同志亲笔所写，解放后已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二是彭任甫医务所。当时党中央、广东省委与广西省委之间的联络通讯多采用如下两种方法：一、平时秘密通讯是用米汤写隐形字于《圣经》的空白处，邮寄彭任甫医务所收转。收到后刷上五倍子水，即显现出文字。二、特别重要的机密文件及指示就派专人传送。机密文件是藏在藤匣内。做法是先把藤匣内的花纸、薄板拆开，铺上机密文件后，再把薄板钉好和贴上花纸。这样除特意拆开藤匣，否则任凭揭匣翻看是难寻破绽的。此外在北流街上还有“华兴隆”和张敬修同志家里这两个同志们经常进出的秘密联络点。

经过朱锡昂同志的积极联络和筹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秘密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期约四天。出席大会的除朱锡昂同志外，有各地党组织代表邓拔奇、雷荣璞（经天）、郭金水、董铨汉、谢生华、李秀农等十多人。恽代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作了当前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的报告。大会对报告进行讨论后，通过了有关建立中共广西省委领导机构，恢复各县党组织，大力开展工人、农民运动，积极组织工会、农会及今后革命斗争方针等决议。并选举朱锡昂、邓拔奇、董铨汉、雷荣璞、郭金水、胡奕卿、谢生华、余少

杰、李秀农、谭景韶、张士乐、陈福寿、宋自洁、杨翰桥、昌景霖等十五人为中共广西省委委员，朱锡昂为中共广西省委书记。这样便产生了第一个中共广西省委。

贵县中共广西“一大”结束后，朱锡昂同志即返北流，中共广西省委领导机构仍设在北流黎家庄。有个别省委部门及印刷处是设在梧州的，也有些省委委员在梧州开展工作。但昌景霖叛变后，省委委员郭金水、李秀农、谭景韶在梧州被捕牺牲，省委在梧州的部门及印刷处也悉遭破坏，省委印刷处后来迁至北流九代坡村继续印刷《布尔什维克》等刊物。在朱锡昂同志领导下，设在北流黎家庄的中共广西省委办事处始终没有暴露过，故在当时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朱锡昂同志长时间住在北流黎家庄省办，领导和指挥全局。他也不时往南宁、梧州、桂林、柳州等地视察、指导革命工作，并曾先后两次秘密赴香港向罗登贤、恽代英、邓发、杨殷、陈郁等同志请示汇报，并与俞作柏联系。这两次他到香港，饶卫华同志（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秘书）都曾跟他会晤，并招待他住宿于党在香港的地下招待所。有一次朱锡昂同志还偕同党的女交通员陈少勤同志回桂，从此港桂间的联系就更频繁了。朱锡昂同志还经常深入农村宣传、组织农民，并指示每个村的农民组织都要有自己的武装队伍。他下乡活动主要是在北流、玉林、博白、陆川、兴业五属地带。

中共广西省委建立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不仅北流、玉林、贵县等许多个县恢复或成立了中共县委，还建立了玉林中心县委。各县的工会、劳农会、共青团也纷纷恢复或建立。俞作豫同志负责的兵运也很有成效，在各地农民武装的基础上，组成了玉林五

属农民武装自卫队，还吸收了一批绿林武装和伪兵、伪县警作为党的外围武装力量。北流县劳农会成立后，召开过两次浩浩荡荡的农民群众大会，俞作豫同志分发了步枪两百多支武装农民。随着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还进行了短兵相接的革命斗争，北流县劳农会曾出动大批武装与地主武装激战一昼夜之久，以抗拒地主夺佃。玉林农民武装白昼攻打全宝岭地主炮楼收缴地主枪械。靠拢了党的绿林武装曾在北流县城“华兴隆”内外与伪军警展开激战。党为壮大革命声势还发动玉林五属农民一夜之间把革命传单、标语贴满城乡圩镇和公路沿线的电线杆上，吓得敌人丧魂落魄。

一九二九年六月，在俞作柏、李明瑞回桂前夕。中共广西省委书记朱锡昂同志为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五属政权，不幸在玉林新桥被捕牺牲。

党鼓励和协助俞作柏策动李明瑞倒桂的决策也取得了重大成果。一九二九年春，长江中、下游的蒋桂战争一触即发。事前中共广西省委与俞作柏早有默契，除俞作柏亲到南京接应外，广西省委特派俞作豫、梁君怡两人秘密到武汉前线与李明瑞会晤，推动和密商倒桂军事行动。是时李明瑞是桂军的前敌总指挥，一身系桂军全线安危，正值战事剑拔弩张的紧急关头，李明瑞一声倒戈，整个桂系势力便立时瓦解。后李明瑞、杨腾辉率师回桂，俞作柏出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绥靖主任。俞作豫也率领玉林五属农民武装自卫队以及大批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到达南宁，俞作柏、李明瑞把这支队伍补充后扩编为包括有第三、第四、第五三个警备大队建制的广西警备总队。整个广西政权都掌握在俞氏昆季和他们的姑表李明瑞三人手里。俞、李回桂后，广西政局，顿时大变。中共中央应俞作柏邀请派遣邓小平、张云逸、袁任远、

叶季壮、袁也烈等大批同志来桂助俞主政和发展革命事业，俞、李还立时释放了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团员和进步人士，如陈漫远、莫文骅、吴西、罗如川、何建南等，一律予以任用。当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中共党员、团员都公开活动，还有不少中共党员经俞作豫建议得俞作柏、李明瑞派以军政要职。如陈豪人任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张云逸任第四预备大队队长兼军校教导总队队长，俞作豫自己任第五预备大队队长，龚鹤村任南宁公安局长，徐开先任南宁军校教育长，梁君怡任民政厅的处长等等。中下级政权也多为中共党员、团员和进步人士所掌握。如朱锡昂同志的侄儿朱健予任玉林县长，他的学生杨第鸷任玉林县政府秘书。李智南、黄嘉谷、梁章云等分任北流县县长、教育局长和北流县中校长。陈柏民任河池县长，林柏任向都县长，黄书祥任果德县长，潘宪甫任奉议县长，黄大权任恩隆县长等等。俞作柏、李明瑞还拨给在东兰、凤山等县奋战多年的韦拔群同志三百多支枪和几万发子弹，以充实力量。就是在李明瑞面临失败，即将撤离南宁时还电邀韦拔群同志来邕共商今后革命大计，并命令他的经理处处长陈镜波交给韦拔群同志毫银八百多元，以充军饷。俞、李失败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第四、五预备大队转移到左、右江，于广州起义两周年之日连同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当地农民武装举行了百色起义，接着又举行了龙州起义，成立了以李明瑞同志（转移桂西后，他已参加中国共产党）为总指挥，邓小平同志为总政委，张云逸同志为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以俞作豫同志为军长的红八军。同时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开辟了红艳艳的广大桂西苏区。原广西第四、第五预备大队是当时起义的主要力量，他们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广西

省委也直接或间接地尽了它应尽的历史任务。

以上是第一个中共广西省委建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经过的梗概。

（一九八一年三月）

风 雪 征 途

——东北抗联第十一军西征记

卢 连 峰

我是一九三七年二月参加东北抗联的，当时只有十五岁。参军后，在抗联第十一军四团给团长隋德胜同志当警卫员。当时我们十一军属抗联第三路军。十一军军长是齐志忠，军下辖独立师、二旅和四团三个建制。

第三路军先是由赵尚志同志负责，后来就由李兆麟同志任总指挥（即张寿箴，大家都叫他张指挥）。

一九三八年阴历九月，三路军的一些领导同志在长白山一个叫七星砬子的地方开会研究西征问题，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李兆麟同志。他中等身材，看样子约有四十多岁，他看我很小，就跟我开玩笑说：“你还没有马枪高就参加抗联啊，能行吗？还是回家去吧！”我吓得哭了起来，团长隋德胜在旁边哄我说：“张指挥是跟你闹着玩的。”。说话时，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也来了，

于是他们就商量大事去了。

为了进行西征，我们事先作了三项准备工作。一是思想动员，干部战士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家乡观念较重，部队要开到远离家乡一千多里的地方去活动，必须首先打通大家的思想。二是备齐御寒物资，西征要在人迹罕至的林海雪原里长途跋涉，没有棉衣、棉帽、棉乌拉不行。因此，我们通过地下人员抓紧购买和筹集了一批过冬物资。三是集结部队，要把分散在各处活动的游击分队隐蔽地集中到出发地。

阴历九月底，我十一军一千多名官兵全部集结在松花江北江通一带，准备渡江西征。这时正是深秋季节，江水清寒。早晨，江岸两侧的洼地里，已经铺上了一层醇醇的白霜，人们的呼吸已经清晰可见。先头部队把搞好的几条船两条两条地并在一起，就开始渡江了。先是独立师过，接着是二旅过，我们四团担任警戒和掩护，最后过。第一天很顺利，独立师和二旅全部过了江。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四团的二百多人便开始过江，第一批先把马匹、辎重和五十多名同志运了过去。我们其余的一百五十多人，分乘在两条对子船上，第二批过江。船在清澈的江面上平缓地移动，快到江心的时候，突然发现日寇的四艘炮艇分别从上水和下水向我们包抄过来，情况十分紧急，渡到对岸和折回原岸都已经来不及了，刚好江心有一个小岛，于是隋团长果断地命令我们把船驶向岛上。小岛约有一里方圆，长满了一人多高密不透风的柳树丛。凭着柳树丛的掩护，我们同炮艇上的鬼子接了火。敌人用小炮和轻、重机枪向岛上猛扫，把一片片的柳树丛齐刷刷地“剪”去一截。我们不理睬敌人的火力攻击，专等敌人的炮艇靠近小岛时，再集中火力和手榴弹狠揍他们，使他们无法登陆。

就这样，我们和敌人整整对峙了三天三夜，大家粒米未入，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敌人虽然登不上岛，但我们也失去了船，突不出去。正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军里又搞到了几条船，并把仅有的一门小迫击炮架到船上，每条船又配备了几挺机枪，趁着漆黑的夜色，悄悄地把我们接上了船。但是，在上船时敌人发觉了，机枪和小炮疯狂地向我们扫来，于是我们的机枪和迫击炮也一齐开火，同时岸上我军也组织火力予以支援，终于把我们抢救了出来。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团伤亡了四十多个同志。

过江后，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我们草草吃过了饭，就又疾步转移，整整走了一天多，才在小兴安岭东南角的一个名叫老等山的地方停下来。独立师、二旅和李兆麟同志直接领导的干部教导队等已经先到达这里。李兆麟、冯仲云、金策、于天放等领导同志决定部队在这里休整几天，筹备粮草。这时，我又被调到二旅，给高旅长当警卫员。

休整以后，部队出发了。那天正赶上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我们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拉着驮着粮草的马匹，排成一行纵队，在两个交通员的引导下，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在逶迤的深山小路上，开始了艰苦的西征历程。

从富锦县的老等山到绥化一带，取捷径并没有多远，但是那样走要通过日寇的重重封锁，无异于是同装备精良的关东军死打硬拼，其结果势必断送全军，因此，我们只能在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绕道曲折而行，先北上，然后再折向西南，这样路程就远多了，路也就难走多了。

开始几天，雪不大，每天还可以走五、六十里路。后来大雪封山，雪深过膝，走路相当吃力，每天能走上三、四十里路就到

顶了。在这无边无际，举头不见蓝天，到处都是白皑皑一片的莽莽林海里，我们抗联战士冒着尖厉的山风和零下四十多度的酷寒，为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顽强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挺进，晚上，我们就在冰天雪地里宿营，四个人一组，四边用雪堆起挡风的墙，中间架起一堆篝火——好在原始森林里有的是木柴，我们就围着篝火和衣就寝，值勤的同志负责给火添柴。一天行军，十分疲劳，大家一倒下就呼呼睡着了。有时火星溅到身上，烧焦了棉衣、棉乌拉都不知道，直到感到发烫才能发觉。因此，不少同志的棉衣、棉乌拉都烧坏了，在小兴安岭的大森林里，根本无处补充衣物，有些同志因此冻伤了脚。

走了约半个月后，部队的粮食已经不多了，为了节约干粮，每次饭前同志们都分头去找野菜、采橡子、摘冻蘑菇、刮榆树皮，然后在这些东西里加点玉米面用水煮着吃。就在这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大家仍然非常乐观，每到宿营地，总要几十个人凑在一块，围着火堆又唱又跳地闹一阵子。当时，部队里有不少能歌善舞的朝鲜族同志，还有一些女同志，他（她）们经常为大家表演一些小节目。有时李兆麟、冯仲云等领导同志也和大家一起联欢。李兆麟将军会编歌，也会唱歌。记得有一次他给大家用东北小调唱了两支歌：一支是“九·一八事变哪，民国二十年……。”还有一支是：“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坚定、洪亮的歌声，给大家以很大的鼓舞。

这样穿山越岭，约摸又走了十天左右，部队来到了汤原县的汤旺河附近。这一带日本鬼子建有几个木营（就是伐木的林场），

我们决定搞掉它一个，补充些粮食和棉衣。为此，部队在汤旺河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清早，四团长隋德胜就带领三百多名身强力壮的同志，临时编成了三个小队，出发去摸鬼子的一个叫老钱柜的木营。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没放几枪就把敌人缴了械，搞到了一些粮食和棉衣，还赶回来了不少黄牛。隋团长他们赶回来后，部队就立即转移了。为了消灭痕迹，我们专门派了十几个人在队伍后面，掩埋了几里路雪地上的脚印。这一天，从上午一直走到黄昏，中间一刻也没休息，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足足奔走了六七十里路。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来到了离伊春一百来里路的大山里。伊春是个大林区，我们决定在这里再想法补充一些给养，然后找机会休整一下。在一个名叫乌拉嘎河的小地方，我们打了一仗，袭击了一个敌人据点，消灭了几十个日、伪军，还活捉了一名日军小队长，并弄到了一些粮食。但是我们的行踪也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派出了一批日、伪军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为了甩掉敌人，隐蔽西征意图，我们就在伊春附近的大山里和敌人周旋，整天拖着他们在林海雪原里转圈子，白天拉着它不停地走，晚上就派游击小组去扰乱它，弄得敌人寝食不宁，疲惫不堪。就这样，我们同敌人“磨菇”了一个多月，终于把它拖垮了，不得不撤离山里。于是，我们才又向着既定的目标继续前进。

虽然摆脱了尾追的敌人，但部队的行动却越来越困难了。一是大家实在太疲劳了，两个多月来每天在雪地里不停地跋涉，几乎没有象样地休整几天，因此脚步越来越沉重。二是部队吃的越来越困难，野菜、磨菇、橡子、榆树皮已经成为主食，马也杀光了，几天也难得吃上一顿粮食，有的班排甚至把不能再穿的破

牛皮乌拉都煮着吃了。三是许多同志都冻伤了。不少同志的乌拉已经破得不能再穿，只好用一块生牛皮或割下一片棉衣裹在脚上当鞋子用，由于长时间在山地和森林里行军，大家的衣服早就刚得到处开花了，棉衣已经很不御寒，行军时只要稍一停下来，就冻得发抖。特别是脚部冻伤的同志走路就更为困难。在这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身体好的同志争着帮身体差的同志扛枪，脚有冻伤的同志走起来实在吃力，大家就轮番搀扶着这些同志前进。那时我的脚也冻坏了，脚后跟肿得老高，整天流脓水，同志们就扶我走一段，背我走一段，硬是坚持了二十多天，直到西征结束。

到了阴历腊月二十前后，我们终于走到了绥化地区，在一个名叫王八拉对趟子的地方驻下休整。几天以后，我们就和六军会师了。那时，夏云杰同志去了苏联，六军已由王明贵同志负责。六军的同志给我们送来了粮食、棉衣和药品。两个军的同志在一起高高兴兴地渡过了春节，大年初一还按照东北人的习惯，包上了饺子。至此，从阴历九月下旬到腊月底历时三个多月的西征，算是胜利结束了。

西征结束后，部队经过一段时期休整，就又生龙活虎地投入了新的战斗，在哈尔滨以北的广大地区，发动群众，英勇斗争，给了敌人以很大的打击。

（李哲夫 整理）

晋夫烈士永生

乔 钊 章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面，死难烈士当中，有一位头戴中国人民解放军棉军帽，长得十分英俊而又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的照片，用暗色的硬木镜框，悬挂在纪念馆正面醒目的地方。照片下面，另一个较大的镜框里面，用坚韧的楷书书写着本人的简历。他，就是原晋冀鲁豫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第一兵团第八纵队参



图一 晋夫烈士像

谋处长晋夫同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在解放太原战役中他被派赴敌军接洽起义时被捕，解到南京，同年十一月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壮烈牺牲。

重 任

事情发生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一月四日太原战役的初期。

太原东山的一个山腰有老乡的几孔土窑洞，窑洞前用积土平整了一个土院子，没有围墙，以土洼地势自然砌成。参加太原战役作战的第八纵队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也就在这里，接待了敌三十军军长黄樵松派出他的谍报处长为联络官，第二次出城与我接洽举行阵地起义的事宜。

这件事，一开始，敌人从我前沿阵地派人过来，我们没有理睬，这是黄军长第二次又派人出来，说是有要事与我前线最高指挥官接谈。前沿部队传来报告，根据兵团首长指示，先由纵队领导出面接谈，摸摸对方的底。敌三十军派出的联络官由前沿部队护送至纵队司令部。联络官王正中再三表示是黄樵松军长亲自授意出城来接洽起义事宜的。于是太原前线总指挥，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同志亲自布置，把起义将领高树勋将军从后方接来，商讨后，即派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和高将军连夜从兵团司令部赶到八纵队指挥所，与三十军联络官王正中商谈起义事宜及具体办法。在接谈中，联络官王正中当即表示：我为黄军长所派遣，军长已安排就绪，要我把他的意愿向贵军转达，并带来准备反正是的方案与贵军商谈。接着王正中谈了三十军起义的行动计划和部署，他：“军长决定先以轮换休整为名，将第一线阵地上的部队留一小部，为贵军布置进出城关走廊。原二线部队向大东关附近移动，全军集结于城北亭堂一带，准备届

时控制大小北门和大小东门，接应贵军进据东北两关，切断阎军的外围各点。同时，三十军与贵军由大小北门并肩入城，一部占据东北城角，监视驻扎该地的日伪干总队；主力部队以后小河及鼓楼为据点，包围阎锡山的绥署，隔断阎的城内布置，进而用兵谏方式，着阎下令停止战斗，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太原。”

黄樵松的联络官叙述完黄的起义计划和部署之后，胡耀邦同志首先回答说：“请联络官先生回去向黄军长转达，黄军长以民族利益为重，迎我军入城作战，共同解决太原问题，他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表示钦佩。只要黄军长愿意脱离蒋阎顽固派，我们表示欢迎，人民对于他的这种爱国举动，也是不会忘记的。因此，我们只希望黄军长调遣部队迎我军入城，入城后的战斗任务，全由我军承担。至于能否胁迫阎锡山交械投诚，那还要看战斗结果如何，估计战斗的结局，不会象黄军长预料的那么轻松！”

经过初步协商，商定：我军攻取太原城时，黄樵松的三十军可交出他防守的大小东门要点，放我军入城消灭阎锡山的顽固军，三十军撤出城外集结，进行整编。胡耀邦同志当机立断，说：“我们决定马上派出联络代表与阎下一齐入城，与黄军长商定我军入城作战和三十军部队撤出城外的集结位置等。”黄樵松的联络官当即表示同意。但是，这位联络官急于求成地恳求说：“我们已两次出城，这二次出城也两天时间了，时间再拖长，万一走漏风声，大事将败。”胡耀邦同志表示：“我们立即就办！一定按预定的时间归城。”与黄樵松的联络官握了个手，转身走出窑洞，来到八纵队的作战室。

在作战室这个窑洞里等待胡耀邦同志与黄樵松联络代表谈判结果的，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

谅，政治部主任桂绍彬等。胡耀邦同志在陈述过谈判结果之后，郑重地向纵队的领导同志说：“我们得选一名政治上很强的代表随同前往。选谁去合适呢？”入城与黄樵松接触，不单纯是政治谈判，还有个里应外合，军事接防，采取武装斗争对付顽固派，捉拿战犯阎锡山等复杂的问题。这样，得派个“文武双全”的军事干部比较妥当。经纵队领导推荐，决定由参谋处长晋夫带侦察参谋翟许友作为随员前往。决定之后，胡耀邦同志要向晋夫交代具体任务。纵队首长要我马上去叫晋夫同志。当我“露嘴”同他讲了他将肩负重任之后，没有看出他有一点儿“吃惊”的感觉，他仍然十分冷静而又沉着，笑迷迷地对我说：“好嘛，任务越艰巨，越光荣啊！”说着，他同我一道走到胡耀邦同志及纵队首长们中间。他靠在坑沿，用他手中紧握的那只铅笔，在他亲手拟定的路线图的一边，记录着胡耀邦同志和纵队首长向他交代任务和囑言。

具体交代任务之后，胡耀邦同志对晋夫说：“晋夫同志，组织考虑来考虑去，认为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比较合适。这个任务，要同敌人斗智斗勇，十分艰巨，可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没等胡耀邦同志讲完，晋夫同志坚定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党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甘心！”

送 别

胡耀邦同志向晋夫交代任务之后，纵队首长又把侦察参谋翟许友找来交代任务。翟许友同志做侦察参谋时间较久，是个机灵鬼，纵队首长向翟囑告：“你要协助晋夫同志很好地完成任务，

深入虎穴，做好保护晋夫的工作。”又说：“这次入城执行任务，是以联络代表的身份，晋夫的职务是宣传部长，你是他的通信员！”

接着，胡耀邦、王新亭同志又把晋夫、翟许友介绍给黄的联络官王正中，随员王玉甲，确定了出发与入城时间。

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黎明前的时分。我们作战科的几个参谋人员也都为晋夫同志临行忙碌起来。为他准备了简单行装，有的还往里面装了几个铅笔和纸张。晋夫同志比我们更懂得，打入敌人阵营中，那里片纸不能有，只字不能留的，他把塞进包裹里的铅笔、纸张拿了出来，还有他随身多年的钢笔、《日记》本子等，放在换下来旧棉军装的一堆。他换了装，穿上了一身临时弄来的短小的旧便衣。把那张亲手描绘的路线图和随身多年的一块旧怀表揣在兜子里。胡耀邦同志和纵队的首长们也为晋夫他们的走，忙碌着。这是关系到太原提前解放的大问题，不时地想起一点，嘱咐了又嘱咐。

晋夫同志临行前的几个小时又是多么紧张的几个小时啊！从兵团首长、纵队首长以及在场的参谋人员，都为他们的离别焦虑不安。可是，站在送行者面前的晋夫却非常镇静地思考着问题，眼前的什么动静，也打不破他的思念。他一心一思想的是，如何克服艰难险阻，去完成肩负的重任！

“时间到了，我们该出发了！”晋夫抬头看了一下台上的闹钟，掏出怀表对正了一下时间。这时，参谋人员有的去通知对方联络人员，有的拿着晋夫同志的行装，准备送他走上“特别”的战场。首长们，也通通走出窑洞门外，站在院子里准备与他们握别！

初冬，十一月的太原东山，黎明前走出窑洞，冷风扑来，已

经感到十分寒冷。在胡耀邦同志和晋夫握别之后，双目深度近视的王新亭走来了，一只手拉着跟随他南征北战多年的参谋处长——晋夫的手，另一只手摸了摸晋夫身上又旧又短的棉袄，说了句：“等一等！”在场的人也不知他又想到了什么，只见他急忙走进窑洞，把自己身上的毛背心脱下来举给晋夫，硬让他穿在身上，这才放心地和晋夫握了个手。

要走了，已经开始走了。前头走的是背着枪挂着手榴弹，全付武装护送的警卫连的战士，还有黄樵松派来的联络官和随员。后面跟着的是去执行任务的坚强战士——晋夫，和送行的首长们肩并肩地行走着。首长们还不时地嘱咐着新提到的问题。晋夫的部属和战友们，紧跟在他们的身后。一直送到能遥望那阴沉沉太原城的山梁子上。

我们目送着他们沿着通往太原城的羊肠小道、弯弯曲曲，急步前行。眼望着他们，只能看见很小很小的身影了，谁也不愿意先行离开这随时可能被阎锡山用炮火射击的山梁子。

被 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的清晨。这是双方联络代表商定的入城时间。规定我军护送双方联络代表至太原东郊的杨家岭我军前沿阵地，对方在这个阵地前接应。我坚守在前沿阵地的部队，向对方发出了信号，对方也发出了接应信号，联络沟通了。双方联络代表和各自的随员一共四人，从我军前沿阵地战壕里走出来，跨过一段开阔地向对方的阵地走去。背影消失了。

“叮铃铃！”八纵队作战室里的电话铃响了。

守在电话机旁急待接电话的值班参谋接过电话，把时间、地点，内容记录在《阵中日记》上。拿《阵中日记》本子，向等待在旁的胡耀邦同志、纵队的首长报告：“前沿部队来电话报告，晋夫同志和对方联络代表已经安然通过我前沿阵地入城。”这时，胡耀邦和纵队的领导同志如同磐石落地，放心地走到间壁窑洞，休息、用饭。离开前，又嘱咐：“命令前一线部队，严密警戒，注视敌情变化，如有情况，立即报告。”

首长们离开作战室以后，兼参谋长张祖谅，又作了具体安排，根据兵团命令，通知各部队，立即作好攻城的各项准备，待命行动。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从我前沿部队对敌情观察分析判断，敌人对我之警戒防御、不是松宽，而是更加严密，回击力增强，动不动机枪、大炮一齐向我阵地开火。纵队首长们的心情沉重起来。兵团首长指示：“要更严密地监视敌人，防止敌人趁机搞我们一下子。”黄樵松举行起义的事无影无踪，我方联络代表晋夫的情况如何，毫无信息。

过不久，从我内线谍报和与敌对话宣传中始得知，由于黄樵松部下的三十师师长戴炳南告密，早在晋夫他们入城前一天，阎锡山用电话以召黄樵松先生开会为名，把黄骗诱到太原绥靖公署逮捕了。接着，第二天（十一月四日）晋夫、黄樵松等一跨入敌阵地，立即被那里早已等待的敌人宪兵队捆绑起来，解往太原绥靖公署审讯。黄樵松先生准备率部起义的愿望没有实现。

就 义

一九四九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我军攻占了国民党二十二年反

革命统治的中心——南京。国民党伪总统府门楼上的所谓“青天白日”旗，降落下来了，随之悬挂起来的是鲜红鲜红的胜利的大红旗。红旗迎风招展，从此，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覆灭。

在南京解放胜利消息的鼓舞下，第二天，我军攻入了阎锡山统治了三十八年的山西省省会——太原。太原解放后，第八纵队在榆次召开的动员向大西北、大西南进军和追悼太原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的大会上，展布的烈士名单中，已经写上了晋夫的名字，参加大会的全体指战员，向死难烈士静默致哀！但是，作为晋夫生前的战友和同志，总还寄希望于随着南京的解放，晋夫同志，他能从敌人的绞刑架下，获得新生。

日子过了好久好久，一个月又一个月，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正当我们高举胜利的旗帜进军大西南聚歼国民党川境敌军大会战途中，传来晋夫同志在南京雨花台惨遭国民党杀害，英勇不屈，慷慨就义的消息，才知晋夫烈士的热血，早在去年的今天，飞溅在雨花台前！

原来，晋夫同志在太原入城被捕后，被送进敌太原绥靖公署，敌人多次重刑审讯，从未招供。一日早晨，敌人的五辆吉普车开出太原，穿过汾河大桥，越过汾河激流，向西山开去。中间的一辆吉普车里，装着被五花大绑的晋夫。车子停留在一片荒野，敌人的宪兵从车子里把晋夫架了出来。晋夫，他明白敌人想干什么。一下车，晋夫挺胸站在敌人跟前，怒目而视，他面对着敌人的宪兵副营长蔡子纯嘲笑说：“还要你们这样辛苦干什么，在什么地方死不一样！”蔡子纯拍了一下腰里挂着的屠刀，恶恨恨地说：“嘿！这家伙还怪硬气哩，是个共产党的硬骨头！”随之嚎叫：“来人！架过去枪毙！”晋夫说：“架什么，自己有腿，自己会走！”说罢，

向远方走去。晋夫，他站住了，挺起胸膛，等待着敌人的枪响。他向身旁的翟许友说：“敌人要下毒手了！为人民而死，死的光荣！”高喊：“共产党……”没有完全喊出来，匪徒们上来堵塞了他的嘴巴，说了句：“想死，便宜了你！”又把晋夫扭上吉普车，拉到河西圪僚机场，上了飞机押送到南京。

晋夫被押送到南京后，关在伪国防部军法监部的看守所。伪国防部军法监部多次审讯他，逼他承认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伪北野战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是“共军”间谍，是来探听蒋军情报的。匪徒们对他用尽种种重刑，把他反吊起来拷打，一只臂膀也被折断。而敌人从晋夫嘴里所得到的，只是一顿斥骂。

后来，蒋介石下令军法监部会同卫戍总部开特刑审判，由顾祝同任审判长，开庭两次。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一次审判中，当顾祝同讲到敌三十军军长戴炳南诬告黄××是“黄逆叛党叛国、私通奸匪”，晋夫是“匪谍渗入国军”的罪由之后，顾祝同问晋夫：“你为什么当间谍？”晋夫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是间谍，不是‘匪’，我是来接受三十军起义的。要说‘匪’你们才是真正的匪！”

接着，顾祝同宣判晋夫、黄××、王正中三人死刑。死，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的战士，为人民革命的事业而死，又算得了什么？晋夫，他如同雨花石一样坚硬纯洁，挺立在敌人的法庭。两名身着礼服的敌军官拿着判决书叫晋夫签字，晋夫“横眉冷对”，说：“我是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落在你们的手里就没打算活，要杀听便，签什么字！”并对一旁的黄××说：“黄军长，你也无罪，有罪的是他们，该杀的也是他们。死，吓不倒我们，会有人替我们报仇的。全国就要解放了，清算

他们血债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敌人当时急于开庭审判晋夫他们，是因为我军大举反攻，国民党军事上节节退败，经济上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南京市抢购米面的风潮起涌。南京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敌人多次押解审讯晋夫，囚车来回都要途径南京新街口繁华闹区。一次，囚车从这里经过，道路被抢米的人群堵塞。晋夫从窗口伸出头来，向群众大声疾呼，发表演讲：“老乡们，我是共产党员、解放军，国民党发动内战，搜刮老百姓，逼的你们没有饭吃。他们不要老百姓活命。解放区人民有饭吃、有衣穿。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反动派就要灭亡了，不要怕他们，和他们坚决的斗争！”晋夫在囚车上的讲演，激起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极大地愤慨。群众越来越多，围聚在囚车周围静听，道路涌塞不通，直到国民党的军警赶来，驱散围聚的群众，囚车方才通过。晋夫，他在敌人的监牢里，也常利用放风的机会，向难友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和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形势，鼓舞大家同敌人斗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早晨，匪徒们把晋夫押赴刑场。晋夫，他经过近一个月的监牢生活，又经受了敌人的重刑拷打，身子瘦骨如柴，脸色有些焦粹，但他精神饱满，意志坚强，在敌人的刑场上，毫不惧色，如同雨花山上的青松翠柏，昂然挺立。临刑前，他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壮烈牺牲。

难忘的鄂东南兵工厂

王 只 谷

(全国政协委员)

编者按：王只谷同志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这段回忆录写成之后，还来不及修改，不幸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四日逝世。现将此文发表，以表怀念，编者除对个别地方作了文字加工外，未作更动。

这个回忆又把我带进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我党在湘鄂赣边区鄂东南根据地的穷山沟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兵工厂，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当时，广大干部、工人那种不畏艰险、不怕困难、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直到现在我记忆犹新。

工农要武装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革命群众遭到迫害。当时窜到鄂东南地区的国民党新军阀夏斗寅部与当地农村豪绅地主、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办起了“民团”。他们解散农民协会，杀害农民运动领袖。鄂东南地区凡是农民运动所及的地区，无不遭受反革命的清乡蹂躏，尤其是阳新县在大革命时期是湖北农民运动之冠，这时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也属最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二七年八月，夏斗寅匪军勾结阳新豪绅地主，把阳新县委书记罗伟同志从安徽抓回来，在城关太尉巷处杀害的惨景，同时遇难的还有二十多位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二八年六月一个月內，遇难者就达一千二百人左右，烧毁的房屋达三千余间，抢走的粮食达数万担，反动派对农民群众施以割耳朵、挖鼻孔、钉铁钉、油烧、压棍、挖心、碎尸等酷刑，野蛮程度前所未闻。但是，鄂东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压服、被杀绝。相反，反动派的暴行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以高举梭标、棍棒和刀枪，高喊“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组织起来，武装自己、举行暴动、建立根据地来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在党的“八七”会议以后，鄂东南地区党组织深切认识到组织群众掌握武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但是，那时敌人用飞机、迫击炮、机关枪和步枪来对付工农群众，而工农群众呢？则只能凭梭标、大刀来反击敌人。虽然当时有些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或在外地做工的工人先后回到家乡，带回了一些枪支，但是这些枪支零件不全，缺这少那，不是没有撞针就是没有板机，而且没有子弹，即使手上有了一支枪也不能发挥作用。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鄂东南地区党组织深刻认识到，必须

改变这种对我不利的因素，要持久地开展和扩大农村游击战争，建立红军，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壮大自己，战胜敌人。工农就必须武装自己，除了有梭标、大刀之外，还必须要枪和炮。

鄂东南党组织十分重视兵工厂的建立。一九二八年初，在阳新县的金龙区中庄铺，靠“三匠”（铁匠、木匠、铜匠）起家，办起了第一个修机组，这就是鄂东南兵工厂的前身，开始打短刀，做梭标，后来经过一段努力，试制成一种可以打六发子弹的枪支，叫“六子轮，”供给游击队，有效地支持了鄂东南地区游击战争。

随着游击战争的不断发展，这个机修组的技术也相应地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底，已能做枪机、造撞针了。到了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这个修机组已发展成有十多人的修械所了，所长是胡秀峰同志。它担负着为游击队、警卫团修枪炮、制枪支零件的任务。同年下半年又改修械所为修械处，人员由十多人发展到五十多人。这时，阳新、大冶两县我方的枪支都是送到修械处去修理。从而，短枪队也成立起来了，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短枪队出现后，鄂东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开展地更为活跃了，打民团、杀土豪，痛击反动武装，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鄂东南人民掌握了武器后，又密切配合红军五纵队挺进鄂东南，所以，很快就恢复了鄂东南苏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走艰苦创业之路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更好地为革命战争服务，一九三〇年下半年，鄂东南的党组织决定在修械处的基础上，正式扩大成立鄂东南兵工厂，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支、制造炮弹、子弹，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受党组织委派，到兵工厂任特派员的。

当时，我们这小块红色根据地是处在四面白色恐怖之中，敌人除了不断对苏区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外，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困死这块红色区域。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建立起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兵工厂，确实不易。

首先是厂址的选择问题，除了考虑安全外，还要反复考虑如何少花钱或不花钱而多办事的经济效果。当时我们的经济是很困难的，真是每一个铜板都要计算着用。我们按照这个原则。先是找到阳新县杨林区的东坑和西坑，调查后，发现那里缺乏材料来源，又缺水缺煤，只好放弃。后来又找到大冶县的一个地方，那里水源不成问题，但煤和其它材料来源不足，离敌人又近，也只好放弃。最后我们选择了地处龙港、璪厦、大畈各十五里的中心点沙基畈。这里自然条件好，两面有山，可以放哨也便于守卫。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山上一打枪，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前面有一条小河，即有水源，也可以行船搞运输。中间是个大平畈，畈上有一个大村庄，庄上有一座姓陈的大土豪房子，主人早已逃跑了，可以做厂房和供千把人居住，即省钱省事，又省时间。离沙基畈不远的明家湾有烟煤资源，在离此地十几里的通山还有造弹药用的硫磺。我们将上述情况报告特委。特委经过研究后，认为这里条件好，同意建立兵工厂。接着，特委又派詹侠东同志到兵工厂担任厂长，胡金山同志任经理，胡秀峰同志任总工程师，我担任特派员（后任经理、政委）由这些同志组成了厂领导班子。

后来，我们兵工厂越办越大，越办越好，有个重要因素，就是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我们首先注意对原有技术人员的培养和使用，我们的厂长詹侠东、总工程师胡秀峰，技术组长石大山

以及技术员徐尚清、胡有阶、赵风光、黄家晚等同志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我们还重视被俘人员中的技术人材的使用，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红军五纵队在何长工、李灿同志率领下，挺进鄂东南，打下了通山县城后，俘虏了三十余人，其中有一个姓向和一个姓徐的是国民党二十六师的随军修械师，不仅可以修理一般枪支，还会修理机枪，是难得的技术人材。后来打中庄铺时，又俘虏了一个姓盛的工程师，他的技术也很高，由于我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俘虏政策，对他们不打骂、不搜身、不虐待，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感化教育，他们很受感动，表示愿意为我们服务。组织上把他们安排到我们兵工厂工作，这对我们来说真是雪里送炭，结果，他们发挥了很好地作用。那位姓向的技术员后来还入了党，升为工程师，并被任命为我们一分厂的厂长。由于我们原有的和新加入我们行列的技术人员一起努力工作，不但使我们厂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而且使一大批从农村来的同志有了受教育、学技术的机会，为我们厂培育了一批新生力量。

兵工厂的设备是很简陋的。除了五纵队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三架台钳一个烘炉外，主要是使用一些极简陋的土设备。翻砂用的炼铁炉，是工人们用头发、稻草、泥巴把油桶壁糊起来的（代替耐火砖），风箱是大油桶做的，由于风箱做得较大，很笨重，一个人拉不动，就用四个人或六个人拉，人多不好拉，就用绳子牵着拉。

制造枪炮弹药所需要的物资，我们尽可能地做到废物利用，就地解决。翻砂需要用的铁和铜，我们一般都是各县老百姓用箩筐送来的废铜烂铁和生铜线等，制炮弹和子弹用的炮弹壳、手榴弹壳、子弹壳，主要是捡敌人用过的，做火底使用的熟紫铜是群众捐献给兵工厂的紫铜壶，兵工厂所用的酒、樟树、栗树、茶油、

菜油都是就地解决的。当时詹侠东同志与汉阳兵工厂有关系，该厂同情者支援我们一些老虎钳子、锉、锯、做子弹用的白硝。还有下路工厂工人支援了做枪用的八方钢。

由于工具简单，制造枪炮弹药时要付出很大的劳动，生产撞针是靠铁匠用手工打出粗坯后，先用粗锉子锉，再用细锉子锉，最后相差毫厘，就靠用沙纸磨了。步枪管也是靠手工钻，钻一支需要两个人花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生产火药时，碾槽由两个人对拉，每天十二个人，最多只碾得两槽。试制第一挺机枪时，石大山同志花了四个月时间，制成后，厂长和工人们都很高兴。试射时，发现拉杆粗了一点，石大山同志用锉子锉了一下，结果又松了不能用，他难过地眼睛都哭肿了。经过反复试验，最后还是搞成功了，从失败到成功整整花了七、八个月的时间。

当时生产条件虽差，但生产质量还是好的，要求也很严格。我记得运到前方去的炸弹，有一个在爆炸时只破成两半，这个部队的负责人拿着弹壳子一直跑到兵工厂里来追究责任，我们便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检查，经过化验，发现弹壳里有一个熟铜钱，影响了炸弹的质量。从此以后，兵工厂对质量要求更加严格，每次出厂都要经过严格地检查，确认无问题后，方能出厂。

尽管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但从领导到工人，心里想的都是要把军工生产搞上去，提高武器质量，为革命战争服务。大家不畏艰苦，不怕困难，不计报酬，不考虑个人得失，一条心，一股劲。当时我们除伙食外，津贴补助是很有限的。大致分为四等：一等是工程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每月十元；二等是技术高一点的组长、工会主席，每月八元；三等是一般技术工人，每月六元；其余的人每月四元，这些津贴补助有时有保证，有时候几个月发

不到一文钱。但谁也不计较，终于胜利完成任务。

努力生产，支援革命战争

经过一翻艰苦创业，到一九三一年，兵工厂终于发展壮大成具有翻砂、木工、铁工、火药、子弹五个大组；机修、保管、总务三个大处；两个运输队；一个警卫大队。包括供销社、剧团、通讯、勤杂等在内，共有一千多人左右规模可观的兵工厂了。生产能力也由原来每天只能生产四个炸弹、二、二百发子弹，修理枪二、三十支，提高到每天生产炸弹一百以上，子弹五百到六百发，修理枪（包括轻重机枪及步枪）三十余支。过去不能生产的迫击炮弹，这时每天也能生产三号迫击炮弹十五个，二号迫击炮弹十二个，一号迫击炮弹十二个，手榴弹二百八十个，炸药十五到二十斤，还生产了两支铜手枪，另外，还能生产技术难度较大的仿德国造二十发驳壳枪，十发的汉阳造驳壳枪，迫击炮筒，轻重机枪等。

兵工厂生产的这些武器弹药，主要是供给湘鄂赣红军主力红十六军、鄂东南红军主力红三师以及鄂东南各县的地方武装，有效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为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

* * * *

鄂东南兵工厂的成长壮大与湘鄂赣省委和鄂东南特委的坚强领导以及鄂东南人民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省委和鄂东南特委曾多次派干部到兵工厂加强领导，又多次询问兵工厂的生产情况，具体帮助解决困难，鄂东南各县的人民也千方百计支援兵工厂，关怀职工的生活，阳新县金龙区派八十余人，步行一百多里

给兵工厂送来铜和钢，另一个乡的群众，还给兵工厂送来了九十多只鸡；职工吃的粮食是龙港人民供给的，兵工厂烧的柴是靠中山岭三个乡的人民解决的。鄂东南人民群众对兵工厂的大力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兵工厂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积极性，激励我们为革命战争多造武器弹药，支援革命战争。

一九三二年秋，鄂东南兵工厂改为湘鄂赣兵工农厂，在省委、地委的领导下，对湘鄂赣红军的发展壮大、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

精兵简政度过难关

赵 恒 远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的国民党军队望风几十里的向南撤退，连日本人沿主要交通线坐汽车也赶不上。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祖国和民族的生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纷纷组织起来，有力地打击日寇。

距济南几十里路的山东省肥城县，靠近铁路线。一九三七年冬，日寇追国民党军队从这里路过后，很长时间里什么军队也没有。于是，我地下党在这里举起抗日旗帜，几个月就组成了二十几支游击大队。这些部队联合起来，先称鲁西抗日人民自卫团，后改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纵队第六支队，就是后来的教导第三旅九团。随着人民武装的迅猛发展，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也不断高涨。真是人多声势大，抗日形势无限好。

但是，从一九四〇年开始，根据地的形势起了变化。日本侵略者在正面战场上加紧了与蒋介石的勾结，放松了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们把在华作战部队的主要兵力转向敌占区，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实行惨无人

道的“三光”政策。同时，蒋介石又积极配合日寇，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靠吃反共磨擦饭的国民党军队石友三集团军，配合日寇加紧了对冀鲁豫抗日军队作战。抗日根据地军民遇到了困难。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后，日寇加紧了对占领区的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在分区“清剿”铁壁合围失败后，又采取蚕食政策。日寇不但占领城镇，而且还对一些有军事价值的村庄和交通要道都派兵占领控制，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交错。

日寇的蚕食政策，给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和行军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日益严重的困难，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精兵简政就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许多指战员仍陶醉于过去顺利的大好形势，习惯于部队不断扩大的局面。带兵的指挥员，对部队增人增枪就高兴，对减人减枪一时转不过弯。当时为扭转这种思想下了很大的功夫。以我们九团为例，这个团在精简前有三个营，加特务连共十三个连队，每个连队都一百多人。连队集合操练人多，情绪也高。精简后，全团只有六个连队，每个连队人员也逐渐减少，情绪也随着有些低落。后来，通过斗争的实践，才认识到精兵简政是为了适应新形势，一面坚持敌后斗争，同时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因敌人的情况变化，我军大部队作战已不可能，只能采取化整为零，短小精干的活动。我们九团六个连队，各连都单独活动在不同的一个地区，连队之间只有间接战术协同，部队完全是白天在房子里睡觉，夜间出来活动。有时是行军转移，有时则去拔敌人碉堡，再就是摧毁伪政权，镇压汉奸。有时一个连队还要分几个部分活动。那时连队活动都是在敌碉堡空隙中转来转去，为了不使敌人发觉，每个人都身穿便衣，头戴毡帽。白天派出的警戒战士，杂

在群众中间在田里劳动，不易被发现。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敌人给我们制造困难，我们就有克服困难的办法。日寇设置的封锁沟、碉堡，根本限制不了我们的活动，连队通过封锁沟如走平地。一个有经验的步兵班通过封锁沟只要二分钟就可以了。我们通常在夜间通过封锁沟，即使被碉堡中的伪军看到了，因他人少，怕我们打击，就装作没有看见。有的碉堡中还有我们内线，不但不打枪，还给我们造成通过的好条件。如碰上日寇或很反动的伪军用火力封锁拦阻我们通过，这时，我们就事先派出的掩护部队用火力压制，保障部队通过。碉堡中不论是日军还是伪军，晚上他们是不敢出来的。

由于实行了“精兵简政”，压缩了部队人数，节省了开支，减少了人民群众的负担；精兵简政后，我们又利用一切机会打击了日寇和伪军。因此，我军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更加强了军民团结。在日寇星罗棋布的碉堡空隙中，我们之所以象穿梭一样穿来穿去，并能长期生存和坚持斗争，全是依赖军民鱼水情的良好条件。在群众的掩护下，一个二、三百户人家的村庄，村东头设有日寇碉堡，我们连队可以夜间摸到村西头住下，一住几天，敌人发现不了。而我们对碉堡中有几个敌人，敌人什么时间外出扫荡或有什么军事行动都清清楚楚。

一九四二年，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物质生活极其困难时期。日寇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想根绝我军民生存条件，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当时年景又不好，天大旱，农业连续欠收。我军指战员说是每月一元钱的生活津贴，实际上早已停发。洗衣服根本没有肥皂，只好淋草灰水来洗。吸烟的人，用干黄豆叶加上点野薄荷来过瘾。冬天在

雪地里连续行军作战，鞋袜破得不能再穿，但得不到补充，有的光着脚穿单鞋；有的同志鞋底和帮开了线，就用绳子捆绑一下，照样行军打仗。有一段时间根本吃不上青菜和油，粮食每人每天不到一斤，红高粱每顿饭只能吃个半饱。物质生活困难是严重的，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困难，走向了胜利。

战争中的九个新年 (日记摘抄)

王 紫 峰

(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二九年的新年——井冈山

一九二九年的新年是敌人向井冈山进行三次围剿的时期，红第四军廿八团及卅一团分驻宁岗县各区进行训练（苏区）。我在湘赣特委训练班受第一次训练，当时的经济相当困难，每人吃二分钱的伙食，米由地方政府发动群众供给。所以饭是红米，菜是南瓜。当时曾流传一段“红米南瓜，南瓜红米，接你的大兵，”空城计的京调，我们训练班的生活相当的苦。

过新年时，没有什么改善伙食，只领了一条黄牛，杀死后，大家吃了一餐牛肉。但精神很愉快。

一九三〇年的新年——闽西古县

一九二九年是由井冈山突围出去，在闽赣边界斗争的一年，

也是红军顺利地发展的一年，但一九三〇年是敌人向闽西苏区进行围剿的时候，由北方调刘和鼎入闽省。我们第四军全部在古县集中训练。新年到了，一、二、三纵队各自为单位，搭起了台子，大演新戏，还唱花鼓戏。各连都很热闹地办了几盘几碗，会餐过年。我这时候是在三纵队九支队任宣传小队长。上面说了一九二九年是红军顺利的发展一年。也是我进步最快的一年。

一九三一年的新年——青龙岗战场

一九三〇年是红军伟大的发展和胜利的一年。消灭十五旅（唐云山部）攻打赣州，夺取南雄，占领汀州，成立红三军和十二军。向北攻打南昌，会合三军团于文家市，消灭夏斗寅一个师，一次夺取长沙（三军团）。第二次围攻长沙，口号是要夺取长沙会师武汉（立三路线），回赣夺取古安。粉碎敌人第一次向中央苏区的围剿。所以一九三一年的新年中即消灭张辉瓒部队（五十师）的第二天，也是活捉张辉瓒的第二天，也即打扫战场准备转移战区，继打谭道源的一天，因此说一九三一年新年在青龙岗战场上呢！这时我是在十二军三十四师一百团第一连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二年的新年——广昌

一九三二年的新年，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一个新年。是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之后成立红五军团后的第一个新年，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新年。我第四军全部在广昌过新年。这时候我是随部队编到第四军十三师三十五团第三连任政治委员。我们过年时，各连队都架了牌楼，我在连门口的牌楼上作了一首对联：“新时局层层开展，年与年大大不

同。”

第十二师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在比赛场上的运动员选手，特别做了运动衣服，这个运动大会很热闹，轰轰烈烈整整开了两天。

一九三三年的新年——太宁城

一九三三年的新年时，正是敌人向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开始，我们红军主力大概是在新湾战场上，捉敌旅长周士达。我一九三二年就到红五军团十五军四十三师一二九团任团政治委员，工作上并有成绩。没有到一二九团前，该团是王军团中最落后的一个团，三个月之后是五军团中，最进步的一个团，表现在部队的巩固任务的完成、指战员的团结上，没有闹出什么问题。所以五军团将我一二九团单独留在太宁（白区），创造新的苏区，担负钳制将乐、昭武方向的敌人，掩护主力，在有利条件之下消灭敌人（新湾战斗）的任务。我们完成了任务，建立了太宁苏维埃政府，将乐、昭武等地发展为游击区域，并扩大了我团本身的力量。我们一二九团即在太宁城过新年，每人分发了一角菜金，各连进行了会餐，我们全团进行一次运动大会，请了县政府主席及工会会长等负责人参加，并担任我团运动大会评判员。运动大会开了一天，奖品丰富。虽然是一团人单独行动，也可算最热闹的新年了。

一九三四年的新年——第五后方医院

一九三四年的新年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后过的，红军消灭了敌人五十九、五十二两个整整的师，李明河坝打

垮了号称中央铁军的十一师，罗作英部十四师，陈诚部九师，蒋鼎文部，其他还有许多部队。这个新年也是敌人遭到惨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之下，重新布置第五次“围剿”的开始。同时也是我第二次全苏大会布置开幕的时期。

这时我调到新成立的十四师四十二团任政治处主任。新年时我带了几个工作人员到第五后方医院慰问伤病员，所以就在第五后方医院过年，该院办了最丰盛的一桌席酒，请我过年。

一九三五年的新年——余度

一九三四年是最残酷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一年，因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结果，所以使我们红军主力在不断“短促突击”中伤亡过大，以至没粉碎五次“围剿”，结果只好离开中央苏区，实行远距离的长征。冲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胜利地到达贵州的余度过新年，前卫部队继续渡乌江天险。

我这时候因部队的编散，转调一军团的教导营，任总支部书记，我们在余度休息一天，过新年，教导营各连进行了会餐，开了一个晚会。

一九三六年的新年——陕北秋林子

一九三五年是‘红军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最伟大的一年’。这是朱德同志在总结一九三五年斗争登载战士报的标题。因为一九三五年是长征中渡了天险的乌江、大渡河，过了从来没有人烟的雪山草地，打垮敌人无数次追击。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全体红军指战员艰苦奋斗终于胜利到达陕北抗日前线阵地——陕北苏区。

一九三六年的新年，就在陕北苏区过的。一军团分驻宜川秋林子等地，军团直属驻在秋林子。各连举行会餐，直属队开了一个晚会，宋任穷主任讲话，政治剧社及火线剧社都表演了新剧，此外还有双簧。

一九三七年的新年——太峪镇

一九三六年是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行统一战线，伟大成功的一年，如张、杨在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中，主动公开联合红军，进行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一九三七年的新年，正是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胜利之时，我们教导营是在文家堡子过新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下)

李国祥 张国琦 殷纯俊 编写

(二) 新 四 军

新四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主要是：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的闽西南游击队，一千二百余人，五百余枝枪；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游击队，一千一百余人，三百五十余枝枪；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队，九百二十人，五百余枝枪；黄道领导的闽、赣、浙游击队，六百余人，三百余枝枪；刘英领导的浙江平阳游击队，六百余人，二百余枝枪；钟得胜领导的瑞金游击队，三百人，一百五十枝枪；关英后、李步新领导的皖南游击队，一百九十八人，七十五枝枪；谭云宝领导的湘鄂游击队，三百三十五人，二百枝枪；项英、陈毅领导的赣南游击队，约三百人；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九百余人，五百余枝枪；周骏鸣领导的鄂豫边游击队，约六百余人；李林领导的湘南游击队，约三百余人。总共大小十四个游击队，约八千人，三千五百余枝枪。他们在主力红军长征之后，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武装。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各游击区，“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进行抗日救国的战争。在国共谈判的同时，陈毅、邓子恢等游击区的领导同志也分别与所在地国民党政府谈判，协商红军改编等问题。

同年十月十二日，根据国共双方多次谈判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宣布，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为加强党的领导，党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宣布成立。二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集中皖南岩寺整编。于是，军部分头令促各游击队兼程前往。（四支队向舒城集中）四月四日，军部离南昌至岩寺，着手改编部队，编为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共二千三百余人，分编为一、二两团，第一团由湘鄂赣边游击队编成，团长傅秋涛兼；第二团由湘赣边、粤赣边及赣东北等地游击队编成，团长张正坤。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共一千八百余人，分编为三、四两团，第三团由闽西及闽赣边游击队编成，团长黄火星；第四团由闽西、闽南及浙南等地游击队编

成，团长卢胜。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胡荣。共二千一百余人，分编为五、六两团，第五团由闽北游击队编成，团长饶守坤；第六团由闽东游击队和闽北游击队一部编成，团长叶飞。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共三千一百余人，分编七、八、九三个团，第七团由鄂豫皖边游击队编成，团长曹玉福；第八团由豫南桐柏山游击队编成，团长周骏鸣，政委林凯；第九团由鄂豫皖边游击队编成。团长顾士多，政委高志荣。军部特务营：由湘南、闽中等地游击队编成。全军共一万〇三百余人，六千二百多枝枪。

新四军各支队分别改编以后，军部及第三支队在皖南，第一、二支队在苏南，以后挺进苏中，第四支队在皖中，皖东，与党的当地组织一起，发动群众，组织与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伪军，创建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亦迅速扩大，先后建立了以罗炳辉为司令员的第五支队（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成立）以彭雪枫为司令员的第六支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游击支队改称），以及许多游击支队。为了加强领导，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中央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

为适应斗争的需要，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任命叶挺、陈毅为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指挥的部队有：新四军的苏北指挥部（兼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江北指挥部（兼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罗炳辉），江南指挥部（指挥罗忠毅，政委廖海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先念）和八路军

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黄克诚）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翌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等领导同志牺牲，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一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将领发布通电，宣誓就职。一月二十八日，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二月十八日，新四军总部颁令，将全军扩大整编为七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详后）。

整编后的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抗击敌伪的进攻，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中央决定组织新四军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五人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七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命饶漱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原主任邓子恢调任第四师政委。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中央决定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七大，新四军政委一职由饶漱石代理。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命谭震林为政治部主任，饶漱石免兼主任职务。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同志对新四军作出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简后新四军下辖：一师兼苏中军区，二师兼淮南军区，三师兼苏北军区，四师兼淮北军区，七师兼皖江军区。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华中我军在三十万国民党反共大军的封锁、围攻下，抗击着敌伪强大兵力。对敌伪作战近二万次，毙伤俘敌伪三十一万七千余人，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的敌后根据地。我主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了三十一万余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师是由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合编后发展演变而组成

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粟裕同志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由第一、二、三支队部分团以下干部和侦察连组成）向苏南敌后进发。六月一日，新四军第一支队在陈毅率领下，七月间，第二支队在张鼎丞、谭震林的率领下进入苏南地区，创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一九四〇年七月下旬，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担任正副指挥，由刘炎、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部队统一改编为三个纵队，分别由叶飞、王必成、陶勇任司令员，由叶飞（兼）、刘培善、刘先胜任政治委员。各纵队均辖三个团。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遂编为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下辖三个旅，第一旅由原第一纵队编成。旅长兼政委叶飞，下辖第一、二、三团；第二旅由原第二纵队编成。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下辖第四、五、六团；第三旅由原第三纵队编成。旅长陶勇，政委刘先胜，下辖第七、八、九团。

一九四一年三月，苏中军区成立，第一师领导机关兼苏中军区。为适应苏中环境和坚持苏中地区的斗争，十一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六师合并到第一师。师长兼政委兼司令员粟裕、副师长叶飞。参谋长张震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下辖第一军分区（十八旅），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刘先胜，兼代政委兼军分区政委聿埭平，参谋长夏光，政治部主任刘松清；第二军区（二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军分区副司令员梅嘉生，政委陈时夫，（一九

四二年，为加强苏南斗争力量，二旅南下与十六旅合并，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留下的一部分人员重组二分区)；第三军分区(一旅)，兼旅长、政委叶飞，司令员陈玉生，副旅长张藩，政治部主任李一平；第四军分区(三旅)，司令员李方，旅长兼副司令员陶勇，政委吉洛(姬鹏飞)，政治部主任卢胜，副主任傅钟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粟裕率第一师主力三个团渡江南下，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组成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下辖第一、二、三纵队。同年四月七日，叶飞率第一师三个团自苏中继续南下，改编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叶飞为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第二师是由新四军第四支队和军部特务营发展演变而来的。

一九三八年初，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皖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十一月，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由张云逸率领抵达江北无为地区，与当地抗日武装合编为江北游击纵队。一九三九年五月，叶挺军长根据中央指示，亲赴庐山东汤池组织江北指挥部。五月五日，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为副指挥，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党的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委黄岩；以及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梁从学；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杨梅生，政委刘顺元。

皖南事变后，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后为谭震林)，副师长罗炳辉(后任师长)，参谋长周骏鸣，政治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张劲夫。第四旅由原第四支队改编而成。旅长梁从学，政委王集成，下辖第

十、十一、十二三个团；第五旅由原第五支队改编而成，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团；第六旅由江北游击纵队与淮南津浦路西一部分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旅长兼政委谭希林，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团；津浦路东联防军司令部（独立旅），司令员杨梅生，政委刘顺元，下辖第三、四两个独立团；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郑抱真，政委谭光廷。

一九四二年三月，淮南军区成立，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师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韩振纪。主任肖望东。副参谋长詹化雨，副主任余立金。一九四三年春，为执行一元化领导，取消了东西联防司令部，成立了东西两军分区，五旅兼路西军分区，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副司令员罗占云，参谋长张元寿，政治主任张树财，副主任郎清荣，辖十三、十四、十五团；六旅兼路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谭希林，副旅长张翼祥，副政委黄岩，副司令员陈庆先，参谋长朱绍清，政治主任邓少东，副主任肖学林；辖十一、十六团；四旅旅长梁从学，政委张劲夫，副旅长吴世安，副政委高志荣，政治主任李世炎。一九四三年秋，谭希林率十六团去七师，六旅番号即取消，改由四旅兼路东军分区。

第三师是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

一九四〇年八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二纵队新二旅及第六八七团、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之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副主任邓逸凡。下辖三个支队，近二万人。九月，第五纵队东进淮海。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主任吴法

宪。第七旅，由原第一支队改编而成，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团；第八旅由原第二支队改编而成，旅长田守尧。政委吴信泉，辖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个团；第九旅由原第三支队改编而成（一九四一年十月，九旅与十旅对换建制），旅长张爱萍，政委韦国清，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个团。还有皖东北保安司令部；淮南军区，司令员覃健，政委金明，亦都属第三师指挥。

不久，成立苏北军区，第三师兼苏北军区，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政治主任吴法宪，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洪学智任参谋长。下辖七旅，旅长彭明治，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郭成柱；八旅（兼盐阜军分区）旅长常玉清，政治部主任李雪山，参谋长兼二十三团团团长胡继成。副参谋长庄林；十旅（兼淮海军分区）旅长刘震，政委金明，副政委吴信泉，参谋长沈启贤，政治部主任高震斧，副参谋长冯志湘。

第四师是由新四军第六支队发展演变而来的。

一九三八年夏，河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在豫东地区组成了两支抗日武装，一支是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组织的第一战区自卫军第七路，约一千五百余人；一支是由原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以睢县、杞县太康地方党为基础组成的豫东游击第三支队，约二千人枪。同时，山东分局所属的（微山）湖西区党委，在丰县、沛县、肖县一带组建了人民义勇军十八个大队，一九三八年七月，河南省委派肖望东率先遣大队百余人，配合第三支队开展游击战争。十月间，彭雪枫率游击支队第二大队三百余人挺进豫东，与先遣大队及第三支队一部合编，仍用游击支队番号（简称游支），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

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大队。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三个主力团、一个特务团、四个总队、三个独立营，共一万七千八百人。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南下华中，经鲁西南越陇海路南下，抵达新兴集与第六支队胜利会师，八路军三四四旅、新二旅与新四军第六支队（欠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共一万七千余人，司令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主任肖望东。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成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一九四四年九月，彭雪枫不幸牺牲，张爱萍为四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参谋长张震，政治主任肖望东。第十旅，旅长张震，政委康志强，辖第二十八、二十九团；第十一旅，旅长滕海清，政委孔石泉，辖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第十二旅，代旅长饶子健，政委赖毅，辖第三十四、三十五团；肖县独立旅，旅长钟汉民，政委李中道。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淮北军区成立，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参谋长张震，政治主任吴芝圃。一九四三年精简整编后，下辖九旅（一军分区），旅长兼司令员韦国清，政委康志强，副旅长张震球，副司令员白浪，代政治部主任张震环；十一旅（二军分区），旅长滕海清，政委赖毅；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汇川，副司令员蔡明，政治主任杨学武；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张太生。一九四四年冬，淮北军区下辖三个分区，一、二分区合为一分区，路西为二分区，三、四分区合为三分区。

第五师是由豫鄂挺进纵队发展而来的。

一九三八年冬，党中央派李先念率领一部分干部由延安向华中进发，翌年一月到达河南竹沟镇(河南省委所在地)，与豫鄂区党委一起，以新四军第四支队竹沟和七里坪留守处人员、八路军残废退伍人员和当地地方党员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马志远任政治部主任，余学礼为副主任。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李先念率领的豫鄂游击大队与陈少敏率领的信阳挺进队在安陆赵家棚会合。六月中旬，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一九四〇年一月，根据中原局刘少奇的指示，把豫南、鄂东、鄂中地区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朱理治，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彬，副主任王翰。下辖五个团，不久又先后发展了六个团。部队整编后迅速地发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了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中央决定郑位三为政委)。参谋长刘少卿，政治主任任质斌。下辖三个旅和三个纵队，第十三旅，旅长周志坚，政委方正平；第十四旅，旅长罗厚福，政委张体学；第十五旅，旅长杨经曲，政委周志刚。第一纵队，政委张执一；第二纵队，司令员黄林，政委刘子厚；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何耀榜。豫鄂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郑绍文，政委夏忠武。四月五日，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在湖北随南通电宣誓就职，十日，各旅正式编成，启用新的番号。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党中央决定第五师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后来成立了湘鄂豫皖军区，第五师首长兼军区首长，下

辖第十三旅，旅长周志坚，政委周志刚，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罗厚福，代政委程坦；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肖远久，政委文敏生；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王海山，政委周志刚；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政委刘西尧；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黄世德。

第六师前身为二支队四团以及江南地区的抗日武装。

一九四〇年六月，由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奉命率主力北进后，新的江南指挥部随即成立。在罗忠毅、廖海涛领导下指挥剩余部队坚持斗争，并发展了革命武装。以留下的第四团两个主力营及各县地方武装编组了第三团、第四团、独一团、独二团，共约三千人。同时，谭震林到苏、常、太地区，成立了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在江南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了抗日武装，共编为一至七支队。

皖南事变后，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为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辖两个旅和两个保安司令部。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兼，政委廖海涛，下辖第四十六、四十七、独二团；第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下辖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团；东路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何克希，政委吴仲超，下辖警卫第一、二团；西路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韦永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第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实行合并，归粟裕直接指挥。此后，第六师第十八旅和十六旅先后归第一师建制。

第七师由无为地区游击纵队、原第三支队挺进团以及皖南事变中突围的部队合编而成。

一九四〇年六月，为加强皖中斗争力量和准备迎接皖南军部北移，以江北游击纵队一部返回巢、无地区活动，并与一部分游击队合编为无为游击纵队。八月，我第三支队一个营由皖南进入桐城以东地区活动，并与地方党领导的游击队合编为第三支队挺进团。

皖南事变发生后，无为游击纵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从敌伪手中夺回了巢湖、白湖以东广大地区，并陆续收容了皖南突围人员。一九四一年三月，遵照中央军委整编新四军的命令，皖中部队和皖南突围人员在无为地区成立新四军第七师师部。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政治主任何伟。师辖第十九旅，旅长孙仲德，共编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独立团、特务营、挺进团，约四千余人。五十五团是由原二支队一部、无为游击纵队两个连以及一地方独立营合编而成，共约六百五十人，活动于无为西乡一带；五十六团是由皖南军特务团一部与无为游击纵队四个连合编而成，合计一千一百余人，活动于巢南、无北一带；五十七团是以五十六团第一营为基础与皖南独立大队及数个地方游击队合编而成的，活动在皖南一带；挺进团是以三支队第五团一个营为基础，会合桐西、桐南、桐东地方武装合编而成的，合编后即向大别山挺进。两个独立营与一个特务营，均由地方游击队升编。

一九四二年二月，傅秋涛担任第七师副师长，部队扩大为四个正规团，三个独立团，除原来三个主力团外，又成立五十八团和含和独立团、巢湖独立团、泊湖独立团，约六千人。“鉴于七师部队地方性特大，且多分散无力，在反顽战斗中无法集中使用，”军部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中旬，令谭希林率第二师第十六团前往皖中加强第七师，并代理第七师师长。一九四三年三月，皖江军区成

立，第七师兼皖江军区，代师长谭希林，政委曾希圣，参谋长孙仲德，政治主任何伟，副参谋长林维先。下辖含和支队长兼政委孙仲德，副支队长马长真，参谋长张铨秀，副政委杨汉林；沿江支队长兼政委林维先，副支队长傅绍甫，副政委彭胜标，政治主任何志远；皖南支队长兼政委黄火星，副支队长梁金华，参谋长胡继良，政治主任黄继南，副主任张经武；巢湖支队长唐晓光，政委余再厉，副支队长张学文，副政委彭明远，参谋长宣继民，政治主任高立中，副主任杜大公。

独立旅前身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一部。

平型关战斗后，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新成立的第二营东进至苏鲁豫边活动。一九三九年底，改为东进支队，至郟马地区活动。到一九四〇年十月底，正式改为一一五师教导五旅，下属两个团，即十三、十四团。年底，南下至淮海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皖南事变后，改为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后由政治部主任刘兴元代政委）。下辖第一、二、三团。一团，原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在平型关战斗后所成立之第二营，到苏鲁豫活动时改为二大队，到郟马地区后改为教导五旅十三团，独立旅成立后编为第一团；二团，原为郟马地区地方武装及教导五旅十三团一部合编而成的教导五旅第十四团，独立旅成立后编为第二团；三团，是由淮河地区的一部武装——淮河大队改编而来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该旅奉令由淮海区北上山东归建。

（三）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是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基础，联合东北地区各

抗日武装合编而成的。

一九三五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随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具体提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次指示东北党：准备召集全东北义勇军代表会议，建立全东北的军事领导机关，如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的名称——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

根据《八一宣言》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东北党组织开展了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一九三五年秋，东北反日总会成立，将人民革命军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合军。十月二十五日，东北抗日联军发布组织条例，指出：东北抗日联合军系东北人民革命军、义勇军、救国军、抗日山林队等联合组成之组织，各军原来之名称全部取消，均改称东北抗日联合军第×军、第×师、第×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依次改称为抗日联军一至六军。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汤原县召开了各军首脑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反日联军总司令部，选赵尚志为总指挥，张寿箴（即李兆麟）为总政治部主任。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决议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二月二十日，东北抗日联军为统一军队建制发表宣言，于是东北抗日联军相续正式成立。同年八月，东北抗日联军在汤源县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军政干部学校，赵尚志为校长，李华堂为副校长，代理教育长侯启刚。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发展为十一个军，分三路军，总兵力约四万五千人。

从一九三八年起，日寇向东北大量增兵，东北抗日联军损失较大。一九三九年冬，南满、北满、吉东三省省委负责同志在苏联伯力集会，根据当时形势，决定把三路军缩编为十个支队（一说十一个支队）。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东北抗联各路军负责人又一次在苏联伯力召开会议，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确定了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一九四一年冬，抗联人员锐减到不足一千人，东北党组织又根据当时的形势，确立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的方针，将抗联各支队转移到中苏边境隐蔽整训。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抗联主力编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又称国际红军特别独立第八十八旅），共编五个营，四个教导营，一个通讯营，约一千七百人，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并决定成立十三个小分队，派回东北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教导旅和在东北进行游击活动的小部队，积极配合苏联红军和八路军作战，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联第一路军是由抗联第一、第二军合编而成的。这两军前身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一九三六年春正式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第一军在杨靖宇的领导下，活动于辽南地区，多次挫败敌伪军的“围剿”。第二军一部在军长王德泰和政委魏拯民率领下，与第一军联合作战，共歼敌军，使东满与南满游击区连成一片。同年六月，中央南满、东满党的负责同志及抗联第一、第二军的主要领导人召集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南满省委，并将第一、第二军合编为抗联第一路军。八月，第一路军总司令部成立，南满省委书记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

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

抗联第一路军所辖第一、第二军，后来又分编为三个方面军，分别以周旭东、金日成、曹亚范为一、二、三方面军军长，陈翰章为独立师师长。总兵力达一万余人。为配合关内抗战以及与热河方面的八路军打通联系，抗联第一路军曾两度西征，由于敌人统治过严，始终未能完成这个计划。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根据抗联部队缩编的方针，第一路军缩编为一、四、七支队，在魏拯民领导下，以长白山林区为游击根据地，坚持长期苦斗。后又转移到中苏边境，直至抗日战争结束。

抗联第二路军是由东北抗日联军第四、五、七、八、十等军合编而成。抗联第四军是一九三五年九月成立的，初为人民革命军，一九三六年一月正式改称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后为李延平）；五军前身是以宁安游击队为基础扩编的，人民革命军第五军，一九三六年一月改称，军长周保中（后为柴世荣）；七军是以四军第二师为基础改编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该师联络虎林一带的山林队，合编成立了东北抗联第七军，由陈荣玖任军长；八军是由依兰县土龙山一带的农民暴动武装所组成。一九三六年九月成立，谢文东（后叛变）为军长，刘曙华为政委；十军是由原活动于舒兰县一带的义勇军组成的，一九三六年冬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军，汪雅臣任军长。以上各军均为三个师建制，总兵力共约二万余人。

一九三七年间，抗联第四、五、七、八、十等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使北满、东满以至南满的广大游击区连成一片。同年底，周保中同志代表吉东省委在饶河召开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把四、五、七、八、十各军合编为抗联第二路军。一九三八

年三月，第二路军在宝清黎树沟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委，崔石泉任参谋长。

一九三九年冬，第二路军在周保中领导下，缩编为二、五、八支队，由王汝起、柴世荣、汪雅臣任支队长，赵尚志为第二路军副指挥。在难苦的环境中继续战斗。

抗联第三路军由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各军合编而成。第三军是一九三六年八月由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的，赵尚志任军长，刘昆任政委，冯仲云任政治主任；第六军由汤原一带的反日游击队和县内义勇军各部队合编而来的，一九三六年一月改称抗联第六军，军长夏云阶（夏牺牲后为戴洪滨），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第九军是由旧吉林军、自卫军残部改编的，军长李华堂（后叛变），政委李熙山；第十一军是由祁宝堂（后改名祁致中）任军长，金昌国任政委。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根据整个华北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第三、六、九、十一等军编为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赵尚志（赵未到任，由李兆麟任其职），政委冯仲云，总参谋长许亨植（即李熙山），总兵力达一万五千五百余人。

一九三九年冬，第三路军在李兆麟、冯仲云的领导下，缩编为第三、六、九、十二支队，分别以王明贵、张光迪、隋广胜、陈绍滨为支队长，赵敬夫、于天放、许亨植为支队政委，在黑龙江平原地区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四） 华南抗日游击队

一九三八年秋，广东人民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相继成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

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雷州半岛）人民抗日游击队，统称华南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艰苦的斗争中大量歼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迄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据不完全统计，对敌作战近三千次，歼敌二万二千多人，创建了拥有三百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部队扩大到二万多人。

东江纵队一九三八年，曾生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就活动在东江一带。当时我党在东莞已掌握了伪县政府属下的一个常备壮丁队，一个以学生、工人组成的模范壮丁队和乡村党员组织的五个游击小组；在宝安县有前线工作小组开展农村工作和做国民党六十三军的政治工作；在增城有杨步尧、阮海天掌握的一个自卫团一个中队的武器，计有三百多人。后来曾生都挺进广九路两侧抗敌，与宝安、东莞等地王作尧领导下的游击队联合起来了。一九四〇年九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部编为第三大队，曾生为大队长；王部编为第五大队，王作尧为大队长。广东省委派（尹）林平同志担任了两个大队的政委。一九四二年初，成立军政委员会，以林平为书记，曾生、王作尧、梁鸿钧、林锵云、杨康华、罗范群为委员，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敌后斗争。同时，这两支队伍正式成立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对内以梁鸿钧为总队长，林平为政委，王作尧为参谋长，杨康华为政治部主任。对外为避免过早暴露我党力量，则以曾生、王作尧为名。部队整编成五个大队，东莞大队，大队长曾生兼，政委陈志强；宝安大队，大队长曾鸿文，政委向鼎华；惠阳大队，大队长彭沃，政委谭天度；港九大队，大队长蔡国梁，政委陈达明；主力大队，大队长王作尧，政委卢伟良。为策略起见，政治委员对外称政训员。一九四三年二月，决定对外仍称广东人民抗日游

击队。总队长曾生，副总队长王作尧，参谋长梁鸿钧，副政委兼主任虞焕章，副主任李东明。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东江抗日游击纵队通电全国，发表宣言，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正式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共八千五百人。第一支队，支队长卢伟良，政委陈达明；第二支队，支队长蔡国梁，政委张持平；第三支队，支队长彭沃，政委陈志强；独立第一大队，大队长鲁峰，政委高杨；独立第二大队，大队长肖光生，政委练铤（？）；独立第三大队，大队长阮海天，政委韩继先；独立第四大队，大队长刘培，政委曾源；武装工作队，队长鄢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又建立了新鹤支队和交明大队。纵队成立后，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曾生、林平、王作尧到路东区；梁鸿钧、杨康华在路西区。一九四五年七月，根据广东省委决定，由王作尧、林锵云、杨康华为首成立粤北指挥部，指挥西北支、北支、三支、五支等部队；由周伯鸣、陈达明、陈其达、饶璜湘为首成立江北指挥部，负责指挥海（城）、龙（门）、博（罗）、番（禺）的部队，以卢伟如、黄宇、叶峰为首成立江南指挥部，负责指挥一支、二支以及活动于东江南岸的部队，以黄布、卢伟良、卢克敏为首成立东进指挥部，对敌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一九四六年六月与国民党达成协议，部队北撤山东。

琼崖纵队抗日胜争爆发后，战斗在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改编为“广东琼崖抗日自卫队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刘振汉（国民党所派）为队副。下辖三个中队，四百余人。第一中队，中队长黄大犹，副中队长符荣鼎；

第二中队，中队长黄天辅；第三中队，中队长吴克之，副中队长吴定中。

一九三九年四月，成立了琼崖人民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总队副符振中，政训主任李黎明，参谋主任吴健。下辖六个大队，三千五百人。第一大队，大队长黄大犹，政训员符哥洛；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克之，大队副林诗耀，政训员李汉；第三大队，大队长马白山，大队副李定兰（又说符英华），政训员陈石（又说张兴）；第四大队，大队长张开泰，政训员林树兰；第五大队，大队长符英华，政训员刘安全；特务大队（由第一大队的第一中队和第二大队的第六中队组成），大队长朱克平，政训员符荣鼎。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对粤委发出关于琼崖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目前琼崖部队只有千人，人数太少，应大力发展，在一年内，至少要扩大到一万人枪。要把琼岛创造成为党在南方有广大影响的根据地。二月，纵队部进入美合山，创建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三万五千人。一九四〇年秋，为了统一和加强各地部队的领导，总队又一次进行整编，改为“琼崖人民抗日自卫团独立第一总队”，建立了政治委员制。总队长兼政委冯白驹，副总队长庄田，参谋长李振亚，政治部主任王业喜。将第一、二大队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吴克之，政委陈乃石，政治处主任陈石；将第三、五大队编为第二支队，支队长马白山，副支队长符振中，政委符哥洛，主任马秋江；第三支队，支队长张开泰，政委陈武英，主任祝菊芬；第四支队，支队长马白山，政委符荣鼎，主任吴文龙；挺进支队（一九四五年一月由第一、二、四等三个支队的重点大队组成），支队长李振亚，副支队长张世英，政委

符荣鼎，主任林明；特务大队，大队长朱克平，政委吴文龙。

一九四四年春，取消广东省琼崖民众抗日游击队“独立第一总队”的番号，改为“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抗日战争胜利时，部队发展到七千多人。

珠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抗战初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群众在中共广东中区特委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一九三九年冬，建立了番（禺）顺（德）和中山两支骨干武装。同时，将林锵云领导的部队，编入在我党影响下的抗日武装——吴勤指挥的广州市区游击队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成为这个支队的独立第一中队，中队长林锵云。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广游二支队司令员吴勤被杀害。六月间，林锵云担任广游二支队代司令员，并发表通电。一九四三年春，根据广东省委和广东省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林锵云为珠江部队指挥部司令员，罗范群为政治委员，谢立全为副司令员，谢斌为参谋长，刘向东为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部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中路游击队秘密成立指挥部，政委严峰（即罗范群），指挥官林锵云，副指挥谢立全，政治部主任由副主任刘潜迅代。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平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称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三个独立营，大队人员共九百余。

一九四四年秋，为了坚持和扩大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打通大陆南北的企图，中央指令珠江纵队向粤桂边区挺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为适应形势发展，便于领导，广东省委决定把珠江三角洲与粤中地区分开，成立珠江纵队和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政委梁嘉，副司令员谢海龙，参

谋长周伯明，政治部主任何向东。下辖两个支队及若干大队，第一支队，代理支队长欧初，政委梁奇达；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政委刘向东；独立大队，大队长梅亦辰。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员梁鸿钧，政委罗范群，参谋长谢立全，政治部主任刘铁山。下辖四个团，一团团长黄江平，政委谭桂明；二团团长卢德耀，政委陈江；三团团长黄仕聪，政委陈旺；四团团长陈中坚，政委李进阶。后来又成立了两个团，五团团长陈中坚，政委郑锦波；六团团长黄昌禧，政委郑宏章。

韩江纵队潮汕地区的武装斗争，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组织和开展起来。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揭阳武工队与普灵武工队会师于大南山，成立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林美南为党代表，王武为大队长，曾广为政委。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汪硕；第二中队，队长杜石。六月，部队扩编为两个大队，以原第一中队为基础编为第一大队，大队长王武，政委曾广，大队副汪硕；以原第二中队为基础编为第二大队，大队长陈×，政委林川，大队副杜明凤。

七月中旬，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林美南、谢育才为负责人。下辖两个支队，一个独立大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林川；独立大队，大队长汪硕，政委曾广。九月底，为了扩大力量，坚持斗争，将独立大队扩编为第三支队，支队长古关贤，政委曾广。十二月，成立军政委员会，以林美南为书记，曾广、林川、古关贤、李良、汪硕为委员。部队整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汪硕，政委张开明；第二大队，大队长李良；第三大队，大队长陈列夫。

一九四六年二月，部队以潮汕人民游击队名义出现，以古关

贤为纵队长，林川为政委，汪硕为纵队副。五月，广东省委决定韩纵抽调一部分干部参加东纵北撤，其余干部则留在大南山、大北山地区坚持艰苦的斗争。

南路人民解放军抗战爆发后，南路人民抗日斗争经历了曲线的道路。一九四三年重建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深泥塘自卫队、界炮联防队、乐民自卫队、海康三区自卫队、遂溪二区联防队、卜剿游击队与山里自卫队等。

一九四四年成立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二大队，以唐才猷、支仁山二同志分任大队长。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成立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周楠为司令员兼政委，李筱峰为参谋长，温焯华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唐才猷，政委陈恩；第二支队，支队长黄景文，兼政委温焯华。至一九四五年二月，扩大并建立了遂西北、遂南解放区，三月，建立了廉西解放区，四月，建立了廉南与海康边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五月，南路党决定将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称为南路人民解放军。下辖五个团，第一团，团长黄景文；第二团，团长兼政委支仁山；第三团，团长莫卫，政委唐标；第四团，团长兼政委陈醒亚；第五团，团长张如和。一九四六年，部队转入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帮助越南建立与训练人民武装。